九王夺嫡

郑小悠　橘玄雅　夏天　著

夺嫡之路，步步惊心！
且看雍正如何谋取最高权力！

依据被尘封的核心档案

还原康熙末年的“内卷化”储位之争
曝光夺嫡诸子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一个组织如何确保最高权力实现平稳交接？
怎样将出身背景、才能资历、人脉资源合理组合，使其发挥最大价值？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九王夺嫡

郑小悠
橘玄雅
夏天
著

夺嫡之路，步步惊心！
且看雍正如何谋取最高权力！

依据被尘封的核心档案

还原康熙末年的“内卷化”储位之争
曝光夺嫡诸子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一个组织如何确保最高权力实现平稳交接？
怎样将出身背景、才能资历、人脉资源合理组合，使其发挥最大价值？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九王夺嫡

郑小悠 橘玄雅 夏天 著

夺嫡之路，步步惊心！
且看雍正如何谋取最高权力！

依据被尘封的核心档案

还原康熙末年的“内卷化”储位之争
曝光夺嫡诸子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一个组织如何确保最高权力实现平稳交接？
怎样将出身背景、才能资历、人脉资源合理组合，使其发挥最大价值？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九王夺嫡

郑小悠
橘玄雅
夏天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王夺嫡／郑小悠，橘玄雅，夏天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4

ISBN 978-7-203-11743-8

I．①九…　II．①郑…②橘…③夏…　III．①中国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IV．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44197号

九王夺嫡

著　　者：郑小悠　橘玄雅　夏天

责任编辑：王新斐

复　　审：贾娟

终　　审：梁晋华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10-62142290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sxskcb@163.com（发行部）　sxskcb@163.com（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厂：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21年4月　第1版

印　　次：2021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11743-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圣祖仁皇帝朝服像



二阿哥允礽常服像



三阿哥允祉朝服像



四阿哥胤禛常服像



八阿哥允禩常服像



九阿哥允禟常服像



十阿哥允□常服像



十三阿哥允祥朝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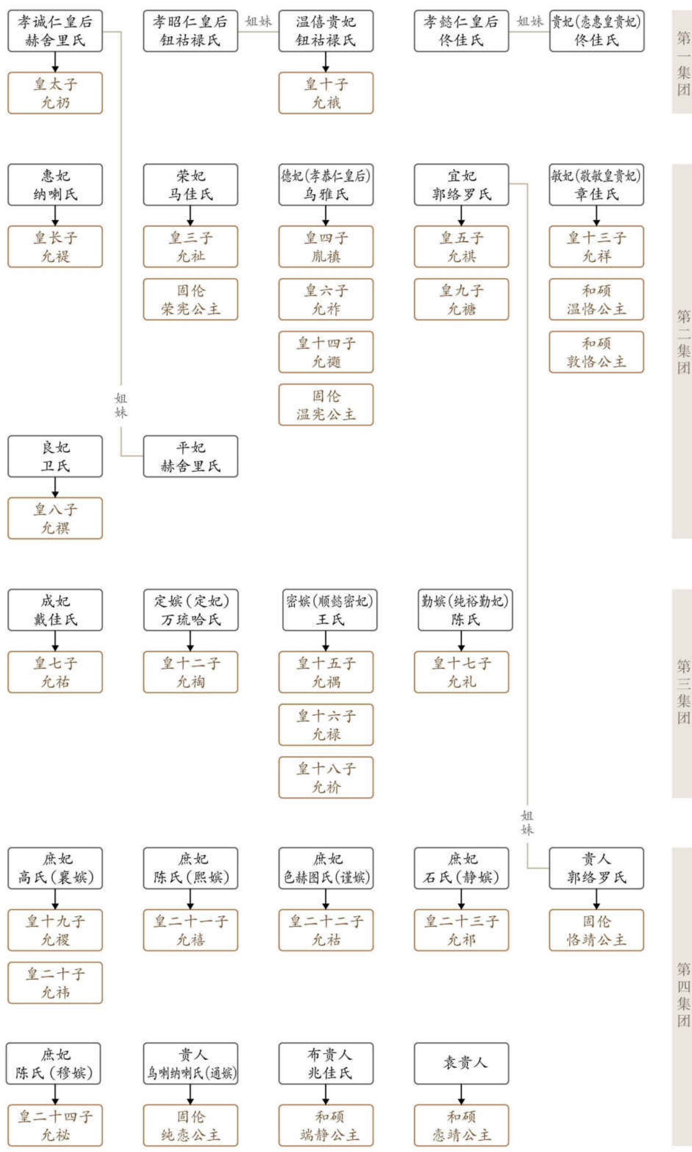


十四阿哥允禵常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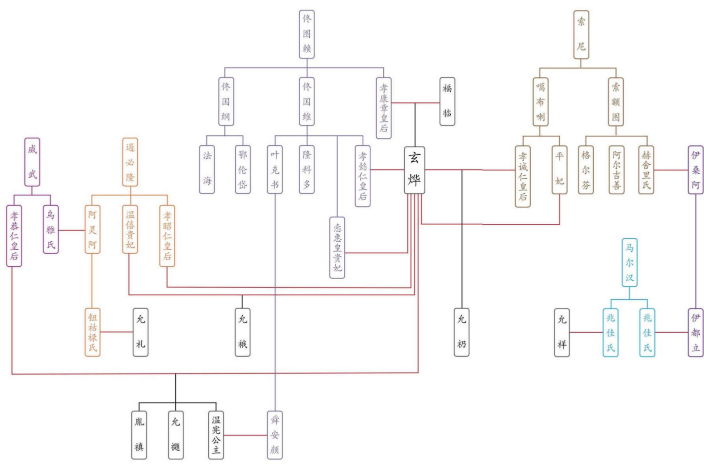


世宗宪皇帝朝服像

康熙帝后宫集团等级示意图（部分）



康熙帝四任皇后家族主要成员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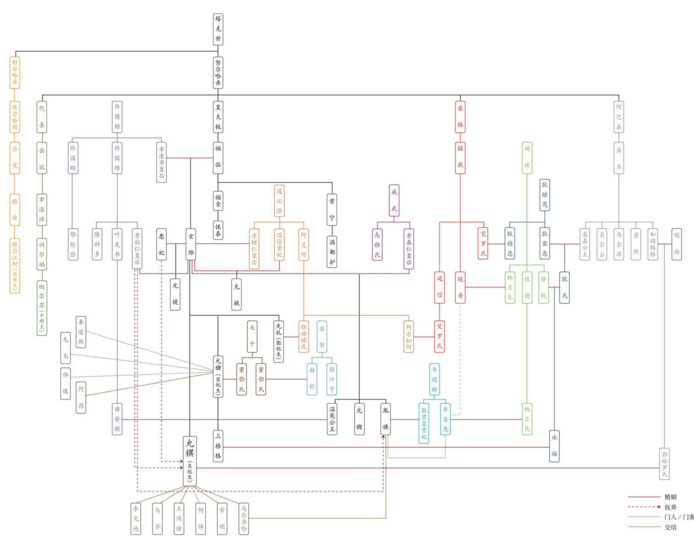


康熙末年胤禛集团主要成员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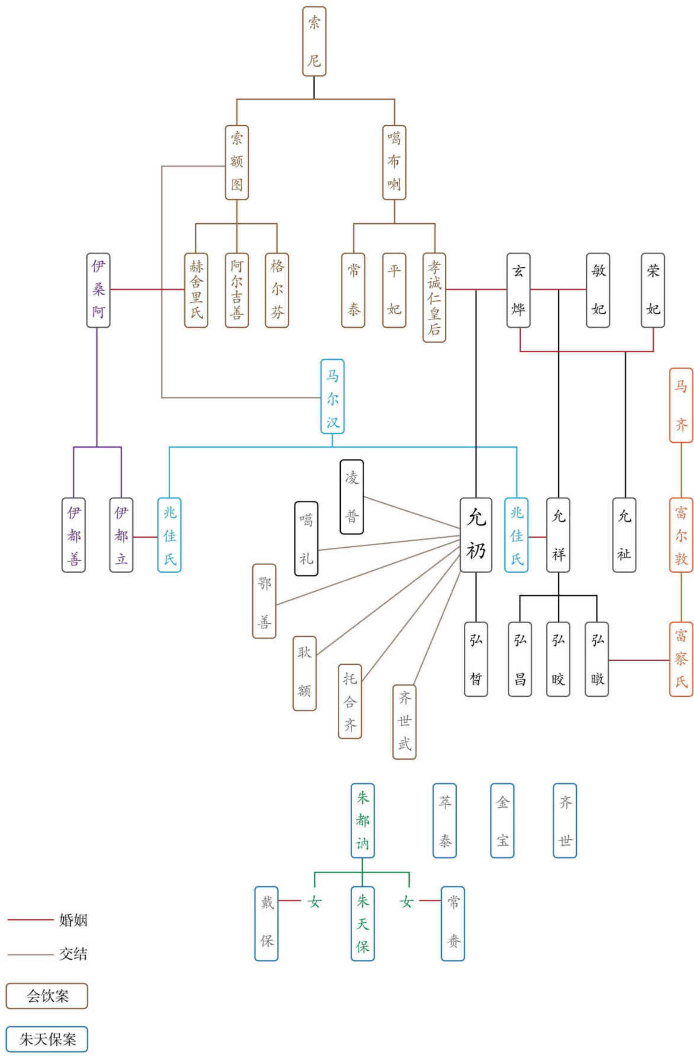
佟国维
隆科多
孝懿仁皇后
玄烨
敏妃
孝恭仁皇后
年遐龄
马尔汉
年羹尧
敦肃皇贵妃
胤禛
允祥
兆佳氏
兆佳氏
伊都立
年熙
和惠公主
二格格
福增额
蔡珽
傅敏
傅鼐
戴铎
沈竹

婚姻
抚养
门人／门客

允禩集团主要成员关系图



允礽集团主要成员关系图



序言

近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用史学研究的材料解读方式去写大众感兴趣的人与事，打破人们在观察历史时程序化、脸谱化的思维桎梏，是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最直接愿望。事实上，历史文化读物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高，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必然形成的现象。第一，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白领阶层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意识越来越强。读历史就是读当下，读古人就是读自己，这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第二，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不断发散，从民间到官方，从影视剧到综艺节目，形式已经非常立体多元，受到影响的群体也已经非常庞大。基于我们无与伦比的人口基数，哪怕只有很小比例的好学读者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了基本感性认识后，产生系统学习相关知识的兴趣，对于出版业而言，其绝对数量也已经非常可观，市场由此得以形成。第三，专业的乃至一流的历史学者应该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更多地参与到知识普惠当中，而非自以为是地保持清高（邓小南，2011），或是受困于既有的学术范式，将历史写作技术化、工具化，甚至将大众史观启蒙的阵地拱手让位于一些不宜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这样的观点已经为很多学院派的专家所接纳。一些著名学者，包括我在北大历史学系读书时的师长们，都开始主动写作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历史作品，并通过丰富的在线、线下活动进行推广，得到读者的接纳与信赖。一流学者的参与提高了历史普及读物的公信力和整体格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不过，即便有看起来比较适宜的出版环境，让我拿准主意，敲定本书的选题，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康雍之际皇位争夺故事”这一拥有近百年学术研究史，兼具大众化、开放性的话题进行再创作，就作者而言，很可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选择。首先，缺乏设身处地的感知力，对史料的评估与解读可能出现偏差。宫廷政治是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人情冷暖、利害得失，固然有跨越时代和阶级的相通之处，但也

必定会出现“皇帝用金锄头耕地”一类的笑话而不自知。其次，已有研究太多，写出新意极难。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郭润涛教授就对我反复告诫：从来没人研究的题目不能选，那很可能是个“伪问题”；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的题目也要慎选，因为所需的阅读量太大，而自我发挥的空间太小。再者，对于一个已经大大跨出学界范畴，形成高热度的社会性话题，如何在专业视角与公众认知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对作者的叙事能力和技巧也构成极大挑战。有鉴于此，虽然我对这一话题一直抱有兴趣，自谓有所心得，又蒙我的博士指导老师之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加意推荐，汉唐阳光尚红科总经理多年督催，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正式落笔。直到我的两位挚友——对满文档案和爱新觉罗家族史、清代宫廷史颇有研究的橘玄雅，以及特别擅长梳理人物关系、在康雍史事方面对我颇有启发的夏天——加盟赞襄，我才感到稍有底气，同意一试。

橘玄雅凭借出色的满文功底和检索“想象力”，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了多件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极重要档案。在大体搜集好材料、理清了思路之后，本书的写作时间被我安排在2020年夏秋之际。2020年的诡谲毋庸置疑，全世界被疫情搅得兵荒马乱，无数人既定的生活轨迹被打破，命运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游离而去。作为一个对任何事都容易“多想”的读书人，我也难免受到焦虑情绪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强制自己完成写作任务，是比较有效的排遣方式，写到得意处，甚至可以作为一种成本很低的娱乐活动。

言归正传。本书在开篇部分先简要概括康熙后期激烈储位斗争的成因，继而从参与夺嫡的“九王”其人入手，由人论事，以免重复。再用一些篇幅探讨康熙皇帝临终前后诸事，特别是雍正帝为自己辩冤时的叙事逻辑。最后介绍夺嫡诸王的命运遭际与“后夺嫡时代”的政治遗产。因为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头绪复杂，所以特别附上人际关系图和夺嫡大事记，作为更直观的说明。

本书正文及附录，均由本人执笔；橘玄雅在搜集文献，特别是搜集、翻译满文档案方面做出极重要贡献；学术史的梳理、互联网上“九王”粉丝动向的观察，以及全书人物关系图的制作则由夏天负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成于众人之手”的原创作品抱有天然的抵触，但本书

的写作、出版之顺利，让我体会到诚恳而高效的合作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感谢两位合作者毫无保留的信任，特别是橘玄雅，那些还没有受到学界关注的核心档案，本可以由他自行留用、撰写文章，现在竟允许我通过自己的意旨加以解读，这样的情谊，比新书出版本身，更令人温暖愉悦。

郑小悠

2021年1月13日于国家图书馆

目录

序言
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
康熙时代的后宫格局
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
夺嫡者群像
- 允礽
  - 上
  - 下
- 允祥
- 允禔
- 允祀
- 允禟与允□
- 允禵
- 允祉
- 胤禛
  - 上
  - 下

康熙帝去世的那一天
- 上
- 下

一代英主的立储拖延症
后夺嫡时代
- 一
- 二
- 三
- 四

雍正王朝的压力与动力
后记　众说纷纭论夺嫡
附录1　夺嫡大事记
附录2　康熙序齿皇子情况表

附录3　阿其那（允禩）大罪四十款
附录4　塞思黑（允禟）大罪二十八款
附录5　允禵大罪十四款
附录6　允祉大罪十款
参考文献

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

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是个格外热门的话题。雍正帝即位伊始，就有他得位不正的小道消息在京师内外口口相传，随后流布全国，引发了骇人听闻的曾静案。乾隆帝即位以后，将乃父亲自编撰的辩白奇书《大义觉迷录》毁版禁绝，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在文深网密的清朝中期，理所当然变成禁忌。直至清末，特别是革命排满宣传风起云涌之后，雍正皇帝以暴君形象重新作为市井的谈资，野史笔记、小道消息、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说法千奇百怪，观点五花八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史学家孟森先生提出“清初三大疑案”的概念，“世宗入承大统”是其中之一。孟森先生以《东华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为基础史料，结合传统考据与近代史论研究的方法，得出雍正帝并非康熙帝所定继承人的结论，并将这一问题正式引入到学术研究的范畴，后起学者争相参与讨论，学林、大众双轨并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家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雍正皇帝》走红海峡两岸，数年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更是获得空前的收视率。小说和电视剧虽以雍正时代为主要着眼点，但描写、演绎最精彩的部分，却是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这当然与文学、影视作品需要的戏剧张力有关。小说将这段历史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九王夺嫡”，并赋予几个主要人物以鲜活的形象，令读者印象深刻，形成人人争说的热闹场面。随后的二十年里，一系列康、雍题材的小说、影视剧蜂拥而至，无不受到二月河作品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大众传播，为我们今天再谈起这个话题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凡说起一个人物的名字而不必多加解释，简直是历史普及读物写作的最理想状态。

在小说里，二月河将康熙帝的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三子允祥、皇十四子允禵这九位皇子划在夺嫡范围之内，这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九位皇子参与夺嫡，足见康熙末年储位之争的激烈与复

杂，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即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亦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国古代从较早时候起就发展出了诸子均分遗产的继承制度，和西方主流的单子（长子）继承制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民间，兄长之于弟弟在财产继承方面没有什么优势，相反，很多中小地主或自耕农家庭是由长兄负责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供养资质较好的弟弟读书科举。乾隆年间的名臣、大学士陈宏谋自幼受教于兄长陈宏诚，宏谋晚年在乾隆帝跟前深情回忆兄长对自己的教养之恩，乾隆皇帝受到感动，特赐“友恭笃庆”匾额作为表彰。稍晚时候的另一位重臣，刑部尚书、直隶总督胡季堂因为感激长嫂的抚养之恩，为兄嫂申请封典，而这种封典一般只能赠予大臣的父母。

在民间，因为兄弟之间分工合理、互相帮衬而兴家旺族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在帝王家，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悲剧却时有发生，万一出现个把兄友弟恭的例子，就会被史家形容为“不啻布衣昆季”。意思是说，皇家兄弟居然也有老百姓那样的手足之情，真是不可思议！

有读者可能会说：皇家子弟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当个有钱、有闲、有地位的“皇二代”，那是一般人做梦也想不来的美事，何必拼死拼活去做皇帝这个高危职业？事实上，对于皇子来说，清闲不是你想躲就能躲，是要满足很多主客观条件的。

首先，从主观上来说，皇子想当富贵闲人，必须要心态好、胆子小，另外还要性格软弱、文不成武不就。心态好而能力强，那是不行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生在权力中心，没有争权的欲望，却有行权的能力，别人也不会放心。就算贤如周公，也要恐惧流言之后。

第二，不能和那些过分显赫的、有野心的人搭上关系，其中包括自己的生母、妻子、叔伯兄弟、舅父姑父、亲朋好友、重臣大将，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等。刘邦的小儿子赵王刘如意被杀时还是个小孩子，能有什么罪过？不过因为母亲戚夫人是刘邦的宠妃，得罪了吕后，就被连累而死。至于中晚唐那些被宦官废立的皇帝，更不是一般窝囊，任由奴仆摆弄来摆弄去，甚至谋害致死。对皇室子弟来说，被裹挟害死和自己胆大作死，虽然出发点不一样，结局却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条件一和条

件二在某些程度上其实是矛盾的。一般来说，容易被各方势力裹挟的人，普遍性格柔弱、缺乏自主的能力，甚至干脆就是幼儿，而个性刚强、能力出众的人虽然不会被利益集团选中，但是容易遭到执政者的猜忌和嫉妒。

第三，皇室子弟想做富贵闲人，还得赶上承平之世才有可行性。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不但百姓没有好日子过，这些天潢贵胄也是一样。赶到北宋靖康、明末甲申这样的王朝覆灭之际，前朝宗室往往都是被一锅端的命。碰上孙吴、西晋、刘宋这样一家一姓频见兵戎的时代，想凭着不主动、不参与而独善其身，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第四，是要当朝皇帝或是执政者存心厚道，最起码讲究个表面上的敦睦之情；另外国家制度健全，生杀赏罚有依据可言。万一命苦，碰上吕后、武则天、金熙宗、海陵王这样专杀宗室，想杀就杀的独裁者，怕都难逃一劫。

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尽可能避免兄弟相残，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中国人就确立了比较完备的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试图保证最高统治权交替的稳定性。即在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首先依长幼顺序，立嫡妻所生之子为继承人，如嫡妻无所出，则立众妾所生的最年长之子为继承人，其他条件不予考虑。几千年来，制度虽然还是那个制度，但执行情况实在不容乐观。

首先，嫡、长的身份是生而成之，贤愚强弱都不确定。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如果太成问题，就算合法性足够强，即位后也难以控制局面，最典型的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另外，有的合法继承人虽然本身素质还说得过去，但与挑战者相比则显得不足，唐朝的李建成、明朝的建文帝就是这种类型。

其次，嫡子的身份是其母决定的，长子的身份是出生顺序决定的，如果嫡子母亲早死或者后位不稳，长子生母并非宠妃或者半路失宠，继承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尤其是后者，案例比比皆是。就算在嫡长子继承制执行得比较好的明代，备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差点儿帮他的儿子福王夺位成功。

第三，嫡长子继承制规定的是现任君主有儿子的情况，如果君主没有儿子，或是儿子死在他前面，顺利择储的难度系数就会陡然增加。到底是立弟、立侄还是立孙？是考虑血缘关系远近，还是考虑国有长君、贤君？想要平稳过渡，各方满意，着实不易。

第四，宗法制是中原王朝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本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建立了稳定政权后，未尝不想确立可持续的皇位继承秩序，但大多会经历非常惨烈的斗争过程，常有终其一朝而不能平息者。

清朝的满洲统治者在入关前也没有“嫡长子继承”一说，而是采取汗（帝）位的推举制，即最高统治者生前不立储君，最高统治者去世后，由诸贝勒从其兄弟子侄中择优推举新汗（帝）。这一制度既与辽、金、元等前代北方民族政权的汗（帝）位继承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又以后金（清）的八贝勒共治、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为基础。

努尔哈赤以武功起家于白山黑水之间，兄弟子侄多是能征善战的虎狼之士。起兵后期，努尔哈赤对女真氏族社会的狩猎组织牛录加以改造，创建“四旗”，后改为“八旗”，将“一国之众”尽行编入八旗，再将八旗兵民作为私产，分别赐给子侄，自己作为大汗，凌驾其上。八旗旗主之间互无统属，且对本旗部属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努尔哈赤在世时，本有以亲生之子作为权力继承人的意图，故先与立有大功的弟弟舒尔哈齐决裂，将其幽死于禁所；但在随后的数年中，被努尔哈赤属意接班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也先后获罪于父，褚英被杀，代善丧失了继承汗位的资格。褚英、代善两兄弟的失势，都与诸弟、各旗贵族大臣的反对、攻讦有关，努尔哈赤据此判断，由现任大汗指定最高权力继承人的办法，与八旗共治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相悖，无论自己指定哪个儿子为继承人，其威望、权力，都不足以驾驭同辈的旗主贝勒们，很容易造成自己尸骨未寒，子侄们就兵戎相见、自毁基业的局面。

所以代善的继承人地位被废后，努尔哈赤就明确表示：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等人为八和硕贝勒。为汗者接受所给予的八旗人众，食

其贡献，但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若某和硕贝勒有违法乱政之行，其余诸贝勒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该杀则杀之。和硕贝勒之贤能者，汗不得出于一己之私怨任意罢黜，如有此举，诸贝勒可共止之。[1]

以上九人均为努尔哈赤的子、侄、孙，其中多铎与多尔衮年纪尚小，是二人同掌一旗。这番话明确了新汗和八和硕贝勒的共治格局，特别是贝勒们对汗的监督权力。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更提出后金新汗由八和硕贝勒中产生，八和硕贝勒具有选举、更换新汗的权力，正式将自己的择储权交给八和硕贝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以集体决策的方式选立新汗。

努尔哈赤去世后，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且擅长在诸贝勒中抑强扶弱、积攒人望的皇太极脱颖而出，被推举为新汗。当然，推举过程暗流涌动，也充斥着复杂的政治较量和血腥气味——譬如镶蓝旗旗主阿敏就对新汗不甚服气，有“出居外藩”的分裂主义倾向；另外，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贝勒之母大妃乌拉纳喇氏被迫殉葬，导致三兄弟丧失了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不过抛开这些不谈，后金政权的第一次最高权力交接，毕竟在大体和平的氛围中顺利完成，更重要的是，皇太极，这个爱新觉罗家族第二代中见识最高远、心性最沉毅、智勇最平衡的杰出人物被推上了最适合他的政治舞台，让一个草创政权走上发展壮大的快车道。

皇太极在兄弟子侄中当然不具备努尔哈赤那样的绝对权威，所以执政以后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就是突出汗（皇）权，抑制八和硕贝勒。他先后使用强力手段，剥夺了堂兄阿敏和兄长莽古尔泰的权力，确立了汗（皇帝）的南面独尊地位。皇太极宠爱宸妃博尔济吉特氏，希望立她所生的皇子为储嗣，改变八旗旗主们集体推举新汗的旧制。不过此子早殇，不数年宸妃亦死，皇太极全力指挥对明战争，未及再对继承人一事做整体制度设计。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突然病故，新君仍要由高级贵族集体推举产生。

不同于皇太极嗣位时相对的“一枝独秀”，这次最高权力交接中，皇太极的嫡长子豪格与皇弟多尔衮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最终在以孝庄太后为代表的崇德后宫，以及皇太极自将的两黄旗大臣代表索尼、鳌拜等人的坚持下，豪格、多尔衮各让一步，折中改立年仅六岁的皇子福临为

新君，以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在这场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斗争中，作为皇帝“家臣”的两黄旗大臣，竟公然抗衡作为旗主的多尔衮三兄弟，坚持“立帝子”成功，这在努尔哈赤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崇德年间压抑诸王、推崇皇权之举已大有成效的表现。当然，凭借过人的才能和实力，多尔衮的地位迅速攀升，特别是挥师入关成功后，俨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多尔衮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豪格，虽然在入关战争中建立了殊勋，但仍遭到残酷的政治清洗。

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和生存挑战，对关外的后金（清）政权来说，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的继承策略无疑效率最高，努尔哈赤诸子中最有才略的皇太极、多尔衮，先后在恰当的时机执掌政权，是后金（清）政权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当然，最大的风险也伴随而来，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使统治集团的内部角逐剑拔弩张，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失意者的报复与胜利者的高压，一旦处理不当，内乱与分裂就足以毁掉一个初兴的政权。所以在幸运地闯过这一关，把打江山变成坐江山后，满洲统治者也开始考虑皇权交接的稳定性问题。为了突显皇权力量，柔化宗族关系，避免再出现叔侄兄弟打成一团的局面，也为了遵守儒家秩序，强调政权在汉地的合法性，康熙皇帝在与吴三桂作战最为焦灼的时间点上，果断册立年幼的嫡子允礽为皇太子，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

然而在其他皇子长大成人之后，康熙帝才发现，立嫡长子为太子等着接班这件事，和满洲旧制严重水土不服。太子允礽虽然资质不坏，但也没有明显优于其他皇子。其他皇子了解本民族历史，也不认可皇太子的天然优越性。于是在众皇子陆续成年之后，八旗重臣、外戚勋贵，各拉一派，各执一词，让太子的地位危机重重。而生活在精神重压下的太子一旦有所动作，当然更不能为父亲和诸兄弟所容。两立两废之后，太子允礽被淘汰出局。而一旦储位空置，其他皇子各显身手，兄弟关系就彻底变成丛林法则，皇位继承退回到了入关前的混乱局面。康熙帝在这一问题上的汉化追求以失败告终，清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刚一开始就走到了尽头。

[1]原文出自《满洲旧档》，转引自冈田英弘《清太宗继位考实》，《故宫文献》第3卷第2期。

康熙时代的后宫格局

历代王朝的夺嫡斗争往往和复杂的后宫矛盾有关，那么康熙年间的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先来简单交代几句。

清王朝入关前的后宫制度比较简单，汗的妻妾大致分为三等，即正妻、侧妻和妾婢。北方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均具有多妻制传统，这与汉民族长久以来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有所不同。贵族首领除了有一名地位最高的妻子外，还拥有数量不等的、与正妻地位相近的妻子，其所生子女也享受与嫡出子女大致相同的待遇。至于妾婢的地位则明显低于前者，其所生子女也无法与前者的子女相提并论。明初皇室受蒙元影响，也有过类似做法。比如朱元璋为他的次子秦王朱樉娶元末名将王保保之妹为妃，娶开国功臣、卫国公邓愈之女为次妃，可见次妃的地位之高。

顺治年间的宫廷制度同入关前有较强的延续性，但也开始刻意参照中原王朝旧制。特别是在高阶妻妾方面，将原有的妻、侧妻，定为皇后以下有二妃、九嫔之阶。其中东宫皇妃本来是著名的孔四贞，西宫皇妃即后来的孝献皇后董鄂氏，至于“九嫔”人选则候旨未备。后来，孔四贞因故没有进入清宫，东宫皇妃缺位，使得原本的“二妃”体制发生变化；董鄂妃先被封为贤妃，因为顺治帝一度有令其取皇后而代之的想法，故特仿明制封为皇贵妃。皇贵妃由此成为单独的宫廷等级，并具有“副后”的尊崇地位。

除了皇后、皇贵妃、妃，以及并未实授其人的嫔等级外，顺治宫中还有为数众多的未经册封的嫔御，按照关外的传统，称为福晋、小福晋、格格之类，在汉文史籍中则统称为“庶妃”。与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宫廷妾婢的家世卑微不同，顺治年间的“庶妃”中，很多人出身于蒙古贵族或满汉中高级官员之家，只是由于宫廷制度尚在草创阶段，顺治皇帝又早亡，没来得及获得封号。于是到康熙年间，为了使本朝更像一个儒家等差秩序下的正经王朝而非草台班子，康熙皇帝逐步设计出一套比

较规范，也更贴近汉制的后宫体系。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后宫等级大致稳定在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七个等级，统称后宫“主位”。其中嫔及以上主位有正式的名号和人数限制，在《会典》中有明确的册封仪式、舆服制度，按照现在的话说，可以算作皇帝有“编制”的妻妾；贵人及以下则不具有这样的礼仪身份，人数上也较为随意，可以算作嫔妃的后备。

后宫制度基本确定后，清代的妃嫔晋封以雍、乾时期为界，前后有较明显的差异。特别是乾隆朝以后，后宫的晋升主要以是否获得皇帝的宠爱，特别是能否生育子女为主导。生育子女，尤其是子女能存活到成年的后宫女性，多能在生前获得较高的名号，譬如妃、贵妃之类。而康熙年间，妃嫔的晋升则主要以其出身为依据，其他条件只作为加分因素。康熙帝的后宫在妃和贵妃之间设有鸿沟，能进入贵妃及以上等级的女性均出身于三个大贵族之家，其他嫔妃即便受到宠爱，或是为他生育了五六个子女，最高也只停留在妃这一等级。特别是后期，一些资历较浅的汉人女性，虽然生育子女，却长期置于贵人、常在等低位，不能实现母以子贵。

这一现象大概可以从两方面解读。首先是康熙皇帝个人，他广义上的嫔妃有五十多人，是清代之最，所以不能说他不好色。但好色归好色，在给职位给待遇问题上，他又非常克制，完全不因为内宠而破坏规则和等级秩序。和历朝历代很多纵容宠妃骄奢、干政的皇帝比，康熙帝算得上头脑清楚，以礼止情。

第二，康熙朝后宫女性地位的获得，最看重家世背景而非其他，这是康熙朝八旗统治集团内部还有较强贵族共治色彩的表现。皇帝需要给大贵族以相当的尊重，让这些家族的女性成员占据后宫的高级职位，凌驾于其他妃嫔之上。而乾隆以后的皇帝则不大需要顾虑这些。乾隆朝贵妃以上的高级主位中，出身内务府包衣，乃至汉人平民家庭的比例很高，皇帝以己之好恶授予后宫名位，这和康熙年间的宫廷秩序有根本性差别。

康熙皇帝的五十多名后妃中，生前即获得贵妃以上名位的共有五人，可以算是后宫中的第一集团。她们分别是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孝诚

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及其妹温僖贵妃；康熙皇帝的表妹、国舅佟国维之女孝懿仁皇后佟佳氏，及其妹佟贵妃。另外，孝诚仁皇后也有一妹入宫为妃，因为去世较早，没有晋封更高级的位号。第一集团的贵族女性们大多早亡，且留下的成年子女很少，只有原配孝诚仁皇后生下皇太子允礽、温僖贵妃生下皇十子允□。这两个出身最好的儿子，都受到康熙帝的格外优待。嫡子允礽幼年就被册立为太子，允□虽然资质不高，却超越多名兄长，较早就被封以王爵。除了三大家族的姐妹外，康熙帝还有几位出身于蒙古贵族或外八旗中高级官员家庭的妃嫔，由于她们均未生育子女，在此亦不赘述。

康熙后宫的第二集团是那些生育重要皇子，生前经过册封，或是生前未及册封，但实际享受相应待遇，死后进行了追封的妃。第二集团中最重要的是惠妃纳喇氏、宜妃郭络罗氏、德妃乌雅氏、荣妃马佳氏这四位入宫较早、生育子女较多、寿命较长的妃子。四妃出身相近，都来自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其中惠妃、荣妃资历最老，康熙初年即入侍宫廷；德妃、宜妃稍逊，分别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和十六年入宫。“九王”中有五人是四妃所生，其中惠妃生皇长子允禔，宜妃生皇九子允禟，德妃生雍正帝胤禛和皇十四子允禵，荣妃生皇三子允祉。

有学者在研究中称，雍正帝因为生母地位卑微，形成了自卑的性格，对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产生很大影响。事实上，雍正帝生母德妃虽然谈不上家世显赫，却是康熙帝生育子女最多的资深宠妃。雍正帝在生母这一重要竞争权重上，只逊于太子允礽和皇十子允□，在“九王”中处于中等，在康熙帝的所有皇子中处于中上等，实在到不了因出身低微而自卑的地步。

“九王”中的皇十三子允祥是敏妃章佳氏所生。敏妃亦出身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入宫时间比四妃晚一些，却是康熙中期的宠妃。只是因为去世较早未及册封，故在死后被追封为妃。

皇八子允禩是良妃卫氏所生，良妃与德妃同年入宫，但封嫔、封妃的时间都远远晚于德妃，可见受重视程度有所不及。康熙末年，因为康熙帝与允禩反目，他曾大骂良妃为“辛者库贱妇”，羞辱其母子。按照八旗户籍制度，旗人有内外之分。外八旗的学名叫作旗分佐领下人，分为

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由皇帝直辖，理论上地位更高一些；下五旗分属诸王，地位较上三旗稍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有比较完整的人身独立性，相当于汉人的编户齐民。与上三旗旗分佐领下人相对的是上三旗包衣旗人，由内务府统一管理，这些人带有很强的私属性质，是皇帝的家内奴仆，有为主人服各类劳役的义务。所以在清宫选秀女时，外八旗女子入宫后可以直接成为后妃，而隶属内务府包衣旗籍的女孩子大多只能从宫女做起，受皇帝宠幸后，再晋升为低级嫔御。至于内务府旗人内部，地位还有所分别，良妃出身的内务府管领下人（俗称辛者库人），在内务府中又是较低等的户籍，地位不如德妃、宜妃等内务府佐领下人。不过，良妃父兄虽然户籍等次较低，但本身仍是内务府的中级官员，其隶属辛者库户籍一节，在康熙帝宫廷中也并非独有，所谓“出身微贱”，只是相对而言。

总而言之，康熙时期的后宫，有明显的阶级固化倾向，这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康熙皇帝个人的处事风格有关。贵妃以上是“天生而成”，出身普通或卑微的女性，哪怕个人资质再好、生育子女再多，也没有希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当然也没办法在皇位斗争中为儿子提供助力。因此，康熙帝的后妃人数虽多，宫廷秩序却颇为井然。除了第一集团生育的太子和皇十子外，其他皇子想要在政治上争得一席之地，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

康熙一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进入兄弟排行的（清朝官方称为“序齿”）有二十四个。这二十四兄弟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比最小的年长四十四岁。康熙中后期参与储位争夺的都是排序比较靠前的皇子，其中年纪最轻的皇十四子允禵，在康熙去世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

前面我们提到，康熙皇帝虽然后妃数量众多，但宫廷秩序风平浪静，几乎没有宫廷斗争的迹象。皇子们之间爆发激烈的夺嫡大战，与各自生母关系不大。兄弟阋墙，问题主要出在爹身上——康熙皇帝的皇子教育很有问题。

康熙教子的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一是满汉杂糅、首崇满洲；二是重智育、体育，轻德育。

先来说说第一点。康熙是个汉文化水平很高的皇帝，经学、史学、诗文、书法，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放在同时代汉族士大夫堆里也不显得寒碜。另外，他为人厚道、勤政爱民，放在汉民族历代帝王序列里比较，无论个人道德还是为君施政，也都属上乘。不过在骨子里，康熙帝是一个非常“满洲”的人，甚至不仅仅是“满洲”，还加入了很多“蒙古”味道。毕竟清初宫廷里有很浓厚的蒙古文化氛围，康熙帝自幼也是由他的祖母、蒙古人孝庄文皇后抚养长大，所以康熙皇帝的性格里，颇有游牧民族那种大而化之、不堪琐屑的特点。

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里，在统一战争、疆域、民族、外交问题上都有很多突破，历史贡献较大。但在内政，特别是制度建设上，发展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延续了明末的状态。直到他的儿子雍正皇帝上台，才进行了比较精致的制度改革，让政府的运作看起来规范了一大截。这样的区别与历史发展的大势、规律有关，也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个人性格密切相关。康熙喜欢纵马塞外、亲临战阵，喜欢和蒙古各部首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很能获得这些人的认同感，促成他们的“归化”。

而雍正帝就喜欢坐在养心殿的小房子里琢磨人心、规范秩序，连去承德避暑山庄转一圈都没有兴趣，更不要说亲自跑到大漠里动刀动枪了。

因此，康熙皇帝在教育儿子时，虽然也非常重视他们的汉文化学习，为他们延请大儒，让他们起早贪黑背经史、练书法，但更重要的是，康熙要求诸皇子坚决把住“首崇满洲”的底线，希望他们不要过多地沾染“汉俗”。并称：“设使皇太子入于汉习，皇太子不能尽为子之孝，朕亦不能尽为父之慈矣。至于见侍诸子内，或有一人日后入于汉习，朕定不宽宥。且太祖皇帝、太宗皇帝时成法具在，自难稍为姑息也。”[1]

“首崇满洲”的表象是让儿子们学满语、练骑射，更深层次上则是让他们像本家前辈——清初功勋诸王一样，参与最高级别的朝政、军事，各自拥有部属、袍泽、文学侍从。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女真民族父子兄弟打天下，关外时期八旗共治、贵族军事民主的遗风。在汉文化主导的君主专制体制下，让一群地位相当的皇家子弟集体学习执政带兵，公然和朝臣密切往来，这是何等危险的做法！上一次敢这样做事的朱元璋，就害苦了自己的长孙朱允炆。

前面提到过，康熙皇帝在三藩之乱最危险的时候，一改满洲旧制，册立只有两岁的嫡子为皇太子，是为了表明自己承当华夏正朔、遵守儒家传统的姿态。但在立太子之后，他却没有施行与嫡长子继承制相匹配的皇室子弟管理制度，而是延续关外传统，让一群读书习武、心高胆大的庶子在政治、军事上各显其能。比如他曾让皇长子在西征准噶尔的作战中担任副统帅，亲征时让多名皇子随军行动；自己出巡离京，不但让皇太子监国，还让诸皇子轮班在京处理政务；给年长皇子分封爵位、分配佐领和属人，让他们视朝廷职官为部曲、奴仆，有了培植个人势力的野心；为皇子迎娶八旗巨族或实权派高官之女，导致他们的姻亲关系盘根错节；命皇子审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大案、主持重要的礼仪活动，乃至宿卫禁城，管理内务府、八旗事务，等等。当然，康熙帝任用皇子参与军国大事，本有强干弱枝，打压下五旗诸王势力的意图，但没想到，给他制造麻烦最多的，正是这些野心勃勃、羽翼丰满的亲生儿子。

早立嗣、立嫡长，是汉族王朝千百年来从血路中杀出的统治经验，核心追求是政权交替的稳定、皇室内部的平衡。而追求稳定平衡，必然

要放弃效率，即那些不被作为继承人的皇子绝不能拥有权力与野心。哪怕天生聪明俊秀，也不能培养他们的政治军事经验，更不能给他们笼络私人提供机会，最多引导其向文学艺术上发展爱好而已。历代王朝的皇室子弟，往往呈现“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的历史规律，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制度的副产品。康熙帝既想利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好处，又试图用满洲传统弥补其不足，这样矛盾的思路和做法，必然导致混乱局面的产生。

再来说说重智育、体育，轻德育的问题。康熙帝对太子和诸皇子的文化、体育学习抓得很紧，常常亲自考试，奖优罚劣。皇子们四五岁开始读书，每天先背经书，然后学习满文，再习字、习射，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即便成婚分家之后，也要勤学不辍，随时接受父亲抽查考核。例如皇八子允禩的书法不好，他分府后，康熙仍然让他每天写十篇大字，进呈御览。在这样的严格教育下，康熙帝的好几位皇子都有过人资质，不但上马伏虎、下笔成章，且对宗教、艺术、西方科学抱有相当程度的兴趣和了解，这一点在很多西洋传教士和朝鲜使臣的记录中都能看到。

但另一方面，康熙皇帝又对诸皇子，特别是皇太子非常娇惯，这可能跟他幼年失去母亲的补偿心态有关。康熙本人十分节俭朴素，宫室、器用、饮食都不讲究，但皇太子生活奢侈腐败，居所的布置比乃父寝宫还要华丽得多。对于太子这一明显违背储君之德的习惯，康熙不但不予以批评，反而主动助长，他曾任命太子奶妈的丈夫担任内务府总管，便于太子随时向内务府索要用度，这俨然是父母明知道孩子败家，还把存折、房产证往他手里塞的做法。至于诸皇子，贪财好货、凌逼弱小也是普遍做法，康熙帝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基本不予限制，更不追究。雍正帝上台之后曾经自揭己短地说：朕在做皇子的时候，虽然也有夺人利己的举动，但是总不至于伤害人家的性命，而我的兄弟们杀人伤人，恶行累累，跟他们一比，我就算好的了。

另外，太子和诸皇子的性格大多骄横暴躁，甚至动辄打骂王公大臣，特别是太子允礽，竟连亲伯父裕亲王福全和各位亲兄弟、堂兄弟，也以“不可道之言詈之”。这样的行事作风，既有满洲家臣政治传统的因素，又有康熙帝糟糕榜样的影响。康熙帝曾当着一众皇子的面责打皇子

的老师、进士出身的满人大臣徐元梦，虽口称崇儒，却无尊师重教之实，助长了诸皇子奴视群僚、妄自尊大的气焰。

总而言之，康熙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逻辑，鼓励诸子参与政治、军事活动，并为其培植私人势力提供方便，已经犯了大忌。如果能导之以德、匡之以正，使其性情温良谦恭一些，大约还能稍有缓和。但他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对诸子百般溺爱，任其骄纵，为之灌输强调君臣间的主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夺嫡”局面的出现，自然不可避免了。

[1]《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38—1639页。

夺嫡者群像

允礽

上

下面，我们来为康熙帝的这些不肖之子分人头、分派系，做个文字画像。

首先，我们来说说夺嫡的靶子——皇太子允礽。允礽生母是康熙帝的原配皇后赫舍里氏，康熙与赫舍里氏的结合是一桩改变康熙初年权力格局的政治联姻，很多电视剧都对此津津乐道。赫舍里皇后祖上的发迹很有特色，她的家族是后金时代不多见的以文化而非军功起家的满洲人。她的曾祖辈是海西女真哈达部的部民，因为能熟练运用满、蒙、汉语言，所以被称为“巴克什”（博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近侍文官和翻译官，对后金政权的制度、文化建设有重要影响。然而满洲入关前后，文治的地位远没有军功来得重要，虽然赫舍里氏第二代掌门人索尼也曾以侍卫身份斩将杀敌，但该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仍然不能和满洲传统的部族首领，如四辅臣之一的苏克萨哈家族，以及努尔哈赤集团的第一流军功贵族，如遏必隆、鳌拜家族相比。索尼本人能在顺治驾崩后获得首席辅政大臣的殊荣，是因为他的家族总能对皇室内斗中的胜利者保持忠诚：比如在皇太极系和多尔衮系的殊死争夺中忠贞不贰，力保顺治帝稳坐金銮殿；又在顺治帝与孝庄太后的母子纠葛中坚定地站在太后一边，用一道近乎“鞭尸”式的遗诏，切断顺治帝一意力推的汉化进程。

即便如此，在康熙帝选皇后时，首辅孙女的门第还是大为人所诟病。鳌拜等反对者拿得出手的理由是，爱新觉罗氏的天子，应该迎娶像蒙古科尔沁亲王那样级别的国主之女，才差可匹配；索尼一家不过是“满洲属下人”，他的孙女出身太低，不配做皇后。当然，身份的问题可能只

是个说辞，索尼的孙女成了皇后，四辅政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就有了明显的差别，这是其他三位大臣难以接受的。鳌拜和索尼的个人权力斗争，代表着八旗最核心军功集团对相对边缘势力的不屑与打压，而孝庄太后强立赫舍里氏为皇后，目的就是利用忠顺而力量较弱的索尼，抑制骄悍而实力最强的鳌拜，这也是清朝君主在八旗内部通过扶弱抑强而推崇皇权的惯用办法。

康熙初年处理鳌拜逆案的相关档案中，曾经提到在康熙帝初定迎娶赫舍里氏为皇后时，辅政大臣有“我们朋友之女，恨不能封为皇后”之语。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我们朋友之女”指的是遏必隆之女、康熙的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进而认为钮祜禄氏是与赫舍里氏竞争皇后失败，才以妃子的身份同时入宫。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鳌拜逆案的档案原文为：“据遏必隆供：奉有太皇太后之旨，谕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将噶布喇之女已封皇后。苏克萨哈、鳌拜说：‘噶布喇之女既封皇后，必动干戈。属下满洲人之女，岂可封为皇后。’我说：‘封为皇后系太皇太后所定之事，我等何以管得。我们朋友之女，恨不能封为皇后。’苏克萨哈、鳌拜二人不允，即行商量启奏太皇太后……”由此可知，“我们朋友之女”是出自遏必隆之口，这显然不是针对自己的女儿而言。另外，根据康熙朝内务府《奏销档》，康熙帝的第二任皇后生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康熙四年皇帝大婚时她还是六岁的孩子，作为皇后候选人的可能性很小。

赫舍里皇后和康熙皇帝虽然是政治联姻，但少年夫妻，感情还是很不错的。可惜红颜薄命，康熙十三年（1674年），她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允礽时因为难产而死，年仅二十二岁。赫舍里氏的门第是靠皇后撑上去的，皇后死得太早，皇帝当然还要另立新后，如此一来，这个家族将丧失康熙朝最重要外戚席位的独占权。所以，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皇后的叔父、康熙帝翦除鳌拜的急先锋索额图，利用三藩乱起，朝廷急于宣誓政权合法性的机会，力主册立皇后留下的独子允礽为皇太子，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拼命把允礽拢在手心，作为家族未来的依靠。而康熙皇帝也怜爱嫡子没有亲娘，乐意为他找个靠山，遂长期默认他与索额图一门的超常规交往。

比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随驾的太子

允礽途经德州时生了病，皇帝即刻下旨，命本来在京留守的索额图赶到山东，侍奉太子。索额图到德州后，一直纵马到太子的行宫中门方才下马。这时的允礽已经三十出头，并非年幼稚子，而索额图作为太子保护人的身份，仍然是公开而无所避讳的。

换言之，允礽自一落生，就与母家的外戚赫舍里氏形成了捆绑格局。可惜，索额图只是一时的权臣，在讲究功勋、门第的八旗内部成色不足。和索额图走得太近，得不到满洲核心军功集团的支持，使太子在八旗勋贵内部的影响力天然不足。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以康熙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第三任皇后佟佳氏家族成员为代表的八旗勋贵，成为反太子集团的主力成员。他们力挺生母出身较低、没有外戚势力的皇八子允禩入主东宫，重复着汉初功臣集团扫灭诸吕，迎立汉文帝的历史故事。

除了在八旗勋贵中缺乏支持者外，允礽在新兴的旗人文官阶层和汉大臣中也不讨好。赫舍里氏家族虽然是满人第一批汉化者，以皇帝的秘书、翻译起家，但到康熙年间，因为地位上升太快，转型以外戚角色立朝，反而和旗人官僚阶层以及汉大臣群体失去了紧密联系，造成了既没够着顶级勋贵集团，又和原生团队脱节的高不成低不就局面。而顶替赫舍里家族，成为汉人士大夫之友的，就是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父亲——大学士明珠。

明珠姓叶赫纳喇氏，也出自汉化程度较高的海西女真，且是高贵的“国主之裔”——爱新觉罗家族的死敌叶赫贝勒金台石是他的亲祖父。明珠原本隶属内务府包衣籍贯[1]，并长期担任内务府大臣，是皇家近臣，与皇帝之间有自然而然的信任感。更重要的是他勤学多思，能够“博览古籍，畅晓朝典”，而且情商极高，待人“柔言甘语，百计款曲”，在清初的满人权贵里独树一帜。作为康熙中期政坛双雄，明珠与索额图二人常年争斗，势同水火，当时的汉人官员多围绕在明珠及其子性德、揆叙身边，故与索额图较为疏远，连带着和太子也缺乏亲近感。康熙年间的汉臣虽然在重要国事的决策上缺乏公开的话语权，但作为皇帝的私人智囊和宫廷活动的记录者，献计献策、鼓吹宣扬是他们的长项，太子缺少这一群体的支持，储君的德行威望乏人树立，也是很大的缺陷。

除了被赫舍里家族的天然劣势限制外，允礽本人的性格也难以在父

亲、兄弟和错综复杂的宗室、朝臣关系中获得平衡。允礽自幼受到高水准的教育，读书、骑射，乃至临时代父皇处理政务，表现都不坏，但他的性情并非沉潜隐忍、广结善缘一路，而是继承了清初满人贵族的火暴脾气，容易为事所激，与人形成强烈对抗的状态。康熙一废太子后，曾经下达长篇谕旨，历数允礽的罪过，因为言辞过于激愤，其中内容在载入《实录》时，被删去不少。所幸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当时聆听上谕诸大臣的满文回奏奏疏，可以从内容上复原康熙帝的谕旨原文。其中有这样一个段落，康熙帝说："胤礽曾殴打平王（平郡王纳尔苏）、海善贝勒、普奇公，亦曾踢踹四阿哥晕厥落阶，再至诸大臣、官员及军中之人，无不遭其凌虐。朕深悉此事，却未就此问询诸大臣、侍卫、部院衙门之官员，唯因倘若稍加论及，其人便更遭（允礽）毒打，众人皆惧，而不敢奏与朕躬。"[2]

清初皇子多骄纵不法，打骂臣僚并不鲜见，乾隆初年，已经完全没有即位可能的皇弟和亲王弘昼尚且公然殴打军机大臣讷亲，何况允礽身为储君。但允礽所殴之人，囊括了自己的亲弟弟，以及郡王、贝勒这样的高爵宗室，与被殴者本人结成仇怨，在皇室和八旗内部树敌过多，就在所难免了。太子被废后，有意争储的皇子们虽然暗自较劲，表面上却往往摆出礼贤下士、善待群僚的低姿态，其中当有以允礽为鉴的成分。

总而言之，太子册立以后，地位虽然远超诸皇子，但除了得到康熙帝的特殊宠爱之外，朝中只有索额图一派对他绝对支持，而与其他重要势力都较为疏远。也正因为感到孤立，又习惯了居高临下，难以像其他皇子那样放下身段与王公近侍结交，太子对索额图势力的依赖就愈加强烈，形成恶性循环。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索额图罢相，两年后虽然复起，但只是担任武职，参与外交、军事活动，对日常政务的干预减少，在朝的影响力看似稍有削弱。不过，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康熙皇帝随后又任命索额图的女婿伊桑阿担任大学士、内阁首辅达十五年之久，索系实力仍相当可观。

康熙帝与太子的互不信任始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用康熙帝的话说："朕初次中路出师，留皇太子办理朝事，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

及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衰，置数人于法。”[3]所谓“出师宁夏”，即第三次亲征准噶尔事。这年（1697年）九月，皇帝下旨处死了太子嬖幸的三个年轻侍从，罪名是他们“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想必引起了太子的紧张。次年三月，康熙帝大封十五岁以上诸皇子，其中皇长子、三子受封郡王，四子、五子、七子、八子受封贝勒。按照清代制度，诸皇子封有爵位，即开府宫外，领有属人，这让他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父皇的监督，也有了向皇太子发起挑战的私人班底。随着诸皇子势力的不断扩张，索额图和太子的危机感越来越强，并开始公然表现出不满，甚至有所动作。

索额图其人虽然是索尼之子、太子的外叔祖，但其生母只是因罪被处死的婢妾，所以幼年备受父兄的嫌憎冷落，全凭个人才干成为统领朝班的权臣。因为这个先天的不足，使得索额图即便位极人臣，也没有机会承袭父亲的公爵，如果只是辅佐康熙帝做个太平宰相，哪怕权势再盛，也会一代而终，既不能成为家族的代表，也不能使本支子孙世世代代保有高级贵族的身份。北京小西天索家坟地区曾发掘出索额图七岁幼女之墓，墓室富丽堂皇，随葬大量珍宝。根据墓志显示，索额图对此女十分疼爱，着意培养，或许希望她有朝一日也能追随堂姐孝诚仁皇后，成为康熙帝的嫔妃，甚至入主中宫，让索额图本人成为国丈“承恩公”，扬眉吐气。可惜爱女早亡，美梦成空，索额图要想得到公爵爵位，非有拥立新君之功不可。

是以在康熙帝对太子渐露不满，开始培养其他皇子的问题上，索额图比太子本人更加敏感、焦虑、怨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索额图被自己家的奴仆告发，康熙帝匿而不宣，但私下里应对索额图本人进行了严厉的警告，索额图无奈“以老乞休”，并获得准允。至于告发的内容，据康熙帝后来透露，不外乎是说索额图和一些对朝局不满的亲信一起，议论国是，多有怨恨皇帝之言。这些人的口气很大，常以威势胁迫满汉官员，并声称如有不从，即能杀人。事实上，索额图一众口气大、能量大，可以胁迫他人，根子本不在索额图身上，而在索氏与太子的特殊关系。只要太子顺利登基，索额图就是被判个终身监禁也必有出头之日，何况区区“乞休”？因此，康熙帝的警告不但没能遏制索氏的“怨妄”，反而对其造成极大刺激——皇帝还不到五十岁，春秋正盛，太子年

轻，能等得起，已经六十出头的索额图可等不起了！

康熙四十一年冬天，太子在德州患病，康熙帝毕竟心疼儿子，所以急召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索额图前来侍奉，自己带着大部分随行皇子、官员先行回京。太子与索额图单独相处了一个月时间，不但行为上肆无忌惮，毫不顾及君臣之礼，且其谈话内容很可能涉及是否提前夺权的问题。只是事机不密，消息很快传到康熙帝御前。半年后的康熙四十二年五月，索额图突然被下旨拘禁。康熙帝斥责他的上谕中有“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一句，将二人的关系置于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极度紧张状态。当然，碍于太子尚在其位，康熙帝并没有把话挑明，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被废后，才说出“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的骇人之语。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在塞外巡幸的康熙帝听说索额图虽然被关在宗人府监狱里，但气焰仍然很盛，不但有人为他通风报信打听消息，他的一些家奴还试图组织营救，万一再牵扯太子参与在内，必然引起朝局的剧烈动荡。是以康熙帝紧急给在京的皇三子允祉、皇八子允禩发出手谕，让他们连夜密审索额图以及那些涉嫌为他传递消息之人，审讯情况不得让任何人知晓。经允祉、允禩审明，索额图并无反狱、作乱动向后，康熙帝稍稍放下心来。很快，索额图秘密死在囚禁处所，对外表现得无声无息。

因为在政治斗争中站队正确而崛起的赫舍里氏家族，终于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一败涂地。太子允礽虽然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了康熙帝的刻意保护，而未被公开责难半分，但在朝中的威信却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参与密审索额图的八阿哥允禩，想必也从那些手书密谕中，感受到父皇对太子的猜嫌防备，继而热血沸腾，涌起取而代之之心。更重要的是，缺少了索额图的支持，太子便没有了主心骨，更加无力抵挡来自父亲的疑忌与反对势力的冲击，他精神高度紧张，行事色厉内荏，对王公大臣、近侍随从动辄打骂，屡屡做出不合身份的举动，为后来的一废再废埋下伏笔。

下

康熙四十七年，是康熙皇帝一生由强而衰的转折点，标志即是九月的废太子事件。这一年年初，康熙皇帝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听星家术士所言，认为当年要有重要的事情发生，并且把这个担心告诉了太子。这年六月，打着“朱三太子”旗号的江苏太仓反清首领念一和尚被处死，允礽安慰康熙帝，说所谓的大事，大约就应在这件事上，而康熙帝认为这件事恐怕还不算大。从康熙帝将此事对允礽说，以及允礽用“朱三太子”之事应对来看，想必这个预兆，是与储君有关之事。可知在废太子之前，父子二人除了实质上的猜忌、矛盾外，还有些冥冥之中的不祥预感，一些原本可以缓一缓、理性处理的冲突，被掺杂进许多更情绪化、宿命论的因素。

当年七月，康熙帝像往常一样，带着多名皇子巡幸塞外，除了年纪尚小的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几个皇子外，年纪较长、在皇子中较有分量的就是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十三子允祥三人。事实上，从康熙四十四年、四十五年起，皇帝出巡时，这三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三人中，允礽、允祥关系密切，而允禔则一直对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用颇有军旅经验的皇长子允禔随身宿卫，自有挟制太子之意，而以精明细致，与太子关系最好的允祥随驾，想必又有挟制允禔之意。

这次行围途中，年仅七岁的十八阿哥允祄突然高热不退，爱子心切的康熙皇帝忧心忡忡，不但从京师急召太医前来，还将小皇子搬到寝帐范围内，亲自照顾。不过人间的悲伤喜乐并不相通，即便父子也是如此。康熙皇帝为了小儿子的病寝食不安，太子对这个幼弟却无动于衷。其实，以现代人的想法来看，年龄相差近三十岁，日常接触又很少的异母兄弟，感情淡些，也在情理之中。但康熙皇帝是个对亲人，比如祖母、嫡母、妻妾、兄弟、子女都有情尽情，无情也能尽礼的伦理完人。自己做得好，对别人，特别是对儿子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作为一个手足众多的太子，不能与君父共情，甚至漠视弟弟的病痛、生死，这在本就心存芥蒂的康熙皇帝看来，是非常糟糕的表现——我今尚在，你都不愿意对一个毫无威胁的稚子表现出些许的关怀，有朝一日我不在了，你对那些年长的，和你有矛盾有冲突的兄弟，又会是怎样无情呢？于是在十八阿哥生病期间，康熙皇帝对太子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八月底九月初，十八阿哥的病情加剧，康熙帝的情绪越发糟糕，想必又对太子有所

指责，不定还说了一些狠话，或是负气疏远。而太子的压力也积累到了爆发的边缘，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找不到与父亲的正常沟通渠道，又急于了解父亲的真实想法和活动轨迹。于是，著名的“帐殿夜警”事件发生了。

“帐殿夜警”一词出自康熙朝汉人重臣、大学士李光地的《李文贞公年谱》。《年谱》在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条内记载：“时口外回銮，于道，帐殿夜警，传闻汹汹。”[4]后来，李光地所说的“帐殿夜警”一词，被用来总结康熙帝一废太子时的情形。

清代皇帝巡幸塞外，途中休息、住宿，不一定都能赶到行宫所在，需要建一些临时的营地。其中短暂休息所建，称为“停跸顿营”，又叫作“尖营”，就是俗话说的“打尖”。而住宿过夜所建的，则称为“驻跸大营”，样式较尖营要复杂得多。乾隆二十年（1755年）定制，大营内方外圆，内城包括皇帝所居黄幔城，御幄居中而建，外加黄网城，并设连帐一百七十五座、门三座，建八旗旗纛、宿卫营帐。外城设连帐二百五十四座、门四座，八旗按方位建纛。外城以东设内阁六部等衙门的办公营帐。康熙年间的御营或许没有乾隆时的繁复，但格局也大体不差。康熙帝在初四日的上谕中怒斥太子，“伊每夜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布城即指黄幔城。其时已值深秋，塞外夜寒，风疾草劲，兼有虫鸣兽吼，太子夜间越过重重宿卫，将黄幔城扒开一个裂缝，向内窥视皇帝寝室的动静。想象一下场景，确实有些惊悚可怖。

九月初三日晚上，康熙皇帝知道了太子窥视幔城的事，他的反应极为激烈。加上此前索额图意欲谋反的举动，康熙皇帝将太子的行为一下子就想到了最坏处，认为他要为索额图报仇，将有谋君弑父之举。康熙帝次日对大臣们说：“伊每晚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朕昨晚知悉，本欲持枪刺伊，终未忍心。”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将太子废黜，康熙帝亲笔写了一封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称太后生病，请圣驾速归。[5]康熙帝对太后，也就是他的嫡母，一向非常尊重，此时竟然要以太后生病为借口而不顾忌讳，可见对事情的预判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他同时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阿哥允祉、七阿哥允祐、十阿哥允□马上起身，赶到行宫来，“不可耽延片刻”，另由八阿哥允禩与四阿哥胤禛在京留守办事。[6]

至于是什么人在九月初三日向康熙帝报告了允礽裂帐窥视一事，当然以皇长子允禔的可能性最大。另外，按照后来雍正皇帝所说，允禔借此机会，还顺便“陷害”了与太子关系最好的允祥，以致康熙帝对允祥的观感一落千丈。具体怎样“陷害”，没有史料记载，也难以说得清楚。

九月初四日，十八阿哥一命呜呼，康熙皇帝的情绪也彻底崩溃了，他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把以简亲王雅尔江阿为首的随驾王公、大臣、侍卫、官员召集到黄幔城前，又把太子允礽捉拿前来，命其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历数太子的罪过。比如骄奢淫逸、凌虐群臣、蒙蔽圣聪、漠视兄弟，乃至生而克母等，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倾囊而出，说到痛心处，这位半世英明的皇帝，甚至左右开弓，当众连续抽自己的嘴巴，继而扑倒在地，语不成声。

那么太子到底是否真要夺权篡位，乃至谋害父皇呢？从康熙帝事后一个月就急着为太子开脱遮掩，不到半年就复立的做法看，起码没有明显的证据可证明太子在主观上有弑逆的意图。他或许是患了妄想症之类被古人称为“疯疾”的精神类疾病，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正常人眼中的怪异举动，譬如裂帐窥视之类。几天后，皇长子允禔让喇嘛魇镇太子的事情被揭发出来，允礽的发病之由自然就有了着落。

一废太子后，朝局陷入空前的纠缠动荡，皇长子允禔、皇八子允禩的野心先后暴露，王公贵戚们争先恐后的表态站队，险些造成君臣、父子之间的决裂。这让康熙皇帝倍感惊疑与失落。很快，他就对自己一时冲动、废弃太子的举动表现出了悔意，将太子的无礼举动归结为患病、被魇镇等客观原因，甚至提及孝庄太后和太子的生母，打出亲情牌。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熙帝召满洲文武大臣入宫，提起自己近日梦到太皇太后，老人家因为废太子的事沉闷不乐，而且远远坐着，不和自己说话；另外，还梦到了太子的生母、元后赫舍里氏，她也为太子的事在梦中向自己抱屈喊冤。康熙帝以此向群臣透露自己恢复允礽储君的心意，为自己一废太子打圆场。最终，凭着强大的皇权和崇高的威望，康熙帝压服异议，乾纲独断，在一废太子半年后，第二次立允礽为皇太子。在复立太子之前，他让允礽向群臣保证，往后一定痛改前非，且绝不计较众人集体保立允禩之事。

事实上，让太子发誓不记仇报复，希望复立太子后群臣不恐慌焦虑，这完全是老皇帝自欺欺人的美好愿望，不但太子和群臣无法做到，就是他自己也办不到。一废前那些压抑在表面和平之下的矛盾尚且不能不把人逼得发狂，何况经过一通撕破脸的大闹，想要尽弃前嫌，是绝无可能的。果然，复立太子后的两三年里，此前就反对太子、支持允禩的王公大臣们不肯罢休，仍然四处游说，试图再次掀翻东宫。相应的，太子对父亲、兄弟的防备越来越深，和那些重要的八旗亲贵越走越远，自然而然也越来越依赖自己的小圈子——包括那些地位卑微、令贵族和士大夫看不起的侍从、太监、弄臣。这样的做法，让即便没有前嫌的人也觉得他看起来缺乏储君的德行与威望，几乎是无可救药了。

勉强支撑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所谓的“托合齐结党会饮”一案被反太子势力揭举出来，成为太子二次被废的导火索。托合齐（史籍中亦作陶和气）并非出身满洲高级贵族，却因为颇有才干而官至步军统领。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负责京师治安，掌握九门兵权，是极为紧要的职位。康熙帝对托合齐非常信任，经常通过他的耳目了解京师内外情形和王公大臣隐私，其职事类似于明代的锦衣卫。托合齐位高权重，又喜欢呼朋唤友，他常常组织宴会，邀请各色人物到家里饮酒看戏，所谓“会饮”，就是这个意思。

到康熙五十年，托合齐大人的不定期饭局突然被人举报，举报人是安郡王马尔浑的弟弟、八阿哥允禩福晋的亲舅舅、镇国公景熙。举报理由是托合齐宴会中有一位叫雅图的常客，他虽然官居都统，却是安王府的属人，安郡王马尔浑在康熙四十八年底去世，按照满洲礼制，身为王府属人，不论官做得多大，都应该为府主守孝服丧，如今安郡王丧期未满，雅图就屡次跑到托合齐家饮酒作乐，殊属不敬，请皇上查实治罪。举报的切入点小而巧妙，看似只涉及雅图一个人，且是安王府的面子问题，却触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后果，直接将太子允礽第二次拉下马。考虑到安王府与八阿哥允禩的特殊关系，这次举报的针对性可见一斑。

因为雅图这一个小小的线索，很快，托合齐的饭局朋友圈浮出水面，其成员之多、构成之复杂，让康熙帝陡然提高警惕。首先，托合齐朋友圈里有一众身居要职的满洲大臣，除他本人外，还有刑部尚书齐世武，兵部尚书耿额，都统鄂善、雅图、杨岱、苏满、班第，副都统石文

桂、丁皂保、绰奇等人；其次，有不少现任或前任宰辅的公子，如现任大学士温达之子查尔钦、勒尔钦，原任大学士伊桑阿（索额图之婿）之子伊都善、伊都立，原任大学士王熙之子王克昌，原任大学士宋德宜之子宋骏业；当然更让康熙帝难堪的，是托合齐的座上常客中，还有自己最亲近、最得用的太监总管梁九功，以及内廷太监于奕、李环等人。[7]

这些人中，齐世武、耿额、鄂善几个，都是索额图在世时的老牌党羽，因为康熙帝处理“索案”时顾虑太子颜面，将打击面控制在很小的范围，所以并未株连到他们头上。这些人大多不是满洲世家贵族出身，而是通过夤缘索氏，或者皇帝的特别赏识，一步步坐到高位，这与托合齐本人的情况比较接近，所以相交过于他人。很快，齐世武等人就与托合齐摊牌，自称是“为皇太子效力行走之人”，希望托合齐也能为太子办事。[8]大约思量老皇帝年迈多病，自己担任这个“特务头子”的差事日久，实在得罪人多，不如早做打算，以为日后荣显留出地步。是以太子复立不久，托合齐就俨然以太子党新领袖自居，他频繁邀请上述人等到家里赴宴聚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显然，太子允礽试图以这个圈子为核心，在后索额图时代，发展起一批效忠自己的力量。

不过，仔细分析托合齐饭局的主要成员，其担任高级军政职务者并无显赫出身，宰辅公子们又多年轻无权，虽然不乏托合齐和梁九功这样特别关键的人物，但整体硬实力仍不能与允禩所代表的高级宗亲、外戚、勋贵集团相抗衡。更兼事机不密，尚未形成气候，就被镇国公景熙揭发了出来。

太子通过索额图旧部重新结党，频繁聚会，特别是由控御九门兵权和群臣隐私的托合齐牵头组织，甚至连掌握皇帝全部生活轨迹的太监总管梁九功也参与其中，这样的调查结果摆在康熙皇帝面前，其震撼与紧张完全可以想见——梁九功、托合齐的背叛，意味着皇帝和群臣的一举一动可能完全被太子掌握，如果太子有所异动，后果不堪设想。

事情查清后，康熙帝仍不欲大肆声张，另借一件受贿案，对托合齐会饮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予以重处，其中托合齐、齐世武、耿额都定为绞监候。没过多久，托合齐在狱中病死，向有宽大之名的康熙帝对这位背叛自己的宠臣余恨难消，下旨将其挫骨扬灰；至于那位自十二三岁就入

宫侍奉康熙帝的大总管梁九功，则被革职抄家，囚禁于畅春园西苑，在雍正帝即位后自缢身亡。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底，太子允礽再次被拘执废黜，康熙帝在二废太子的上谕中说："但自释放皇太子以来，数年之间，朕之心思用尽，容颜清减，众皆缄默，曾无一人如此劝解者。朕今处置已毕，奏此劝解之言何用？前次废置，朕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9]对他来说，太子再次被废，几乎是一种解脱了。传教士马国贤在个人著作中写道：

>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当我们到达畅春园时，惊恐地发现在那座有着宏伟宫殿的花园里，八至十名官员以及两位太监跪在地上，光着头，双手被捆在背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皇帝的儿子们站成一排，光着头，双手被捆在胸前。过了片刻，康熙帝从一顶四周并不封闭的轿子里走出，来到正在受罚的皇子们面前，立即发出如猛虎一般的怒吼。他对皇太子予以一通斥责后，决定将皇太子及其家人们一起软禁在皇太子宫内。接着，在一份公开的宣言中，宣布废黜这个不幸的皇子，理由是他有谋反的嫌疑……

太子允礽是个悲剧人物，是满洲传统和汉家宗法冲突与磨合过程中的牺牲品。他落地即丧母，既缺少母爱的照料与抚慰，与父亲之间的芥蒂也无人能够磨合调解。他夹在英明敏感的君父、虎视眈眈的兄弟、派系林立的朝贵、野心勃勃的外戚和取媚求荣的小人们之间，既高高在上，又孤立无援。他在位时，也曾经被描述成英武高才的准圣主，而一朝被废，却被亲生父亲形容成骄奢淫乱的疯子和野心家，其中的宫闱秘辛、是非曲直，都失去了付诸史笔的可能。所幸，允礽的晚境并不算坏。嗣位的雍正皇帝虽然有"弑兄屠弟"的恶名，但对这位曾经把他踢昏过去的二哥却很厚道，比如保证他的生活待遇直到善终，追赠他为亲王，给他的子女授予高级爵位，等等。这样的结局，在历代废帝、废太子中已经很难得了。究其原因，一则出于纲常伦理的目的。允礽毕竟是当过三十多年太子的人，兄弟间久有君臣之别，如今成了翻不了天的死老虎，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显得新君大度、孝友，恪守尊尊亲亲的礼制。二来只怕还有现实利益的考量。允礽和他背后的索额图势力虽然在

康熙中后期受到多次打击，但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所代表的支系，只是在康熙末年暗暗潜伏下来，转到雍正年间，反而变得极为活跃。这个重要人物又是谁呢？

允祥

康熙诸皇子里，与废太子允礽关系亲近的是皇三子允祉和皇十三子允祥，但程度有很大不同。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太子允礽在热河被废，康熙帝马上将留守北京的允祉召到行宫询问废太子的情况，为了免人议论，他特意下旨为允祉撇清嫌疑说：“三贝勒允祉平日与允礽甚相亲睦，所以召允祉来者，因有所质问，并非欲拘执之也。伊虽与允礽相睦，未尝怂恿为恶，且屡曾谏止允礽，允礽不听。此等情节，朕无不悉知。”[10]此后诸子夺嫡，允礽立而又废，康熙帝对允祉始终信任，从未把他视作太子一党打入另册。

至于允祥，和允祉的性质就大不同了。一废太子时，允祥也在随驾热河的队伍当中。九月初四日，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满文上谕中，同时恶狠狠地提到了对他核心党羽的处置办法，说：“现其（允礽）党羽内，杂搜信息及畏威而附和者亦多，皆从宽不究，此外，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二格、苏尔特、哈什太，皆着立行正法，富尔敦，着交予其父马齐，拴九条铁索，于家中圈禁。十三阿哥，朕另有处置。”[11]将十三阿哥与索额图的两个儿子，以及被处死、被九条铁索圈禁在家的太子党羽并列在一起，可见允祥是太子党的核心成员，甚至被怀疑参与谋划了太子的某些“为恶”行为，只是因为皇子的特殊身份，或者证据不足之类的原因，需要“另外处置”。即便如此，允祥作为一废太子关键人物的事实也暴露无遗了。

有学者在研究中将允祥归为反太子一党，甚至认为他是大阿哥允禔的助手，共同起到制约、打压太子的作用。其推测逻辑是允祥后来成为雍正一朝的政治赢家，所以不可能与太子关系密切。而根据这道满文上谕则可以确认，允祥在太子出事的第一时间就被列入了处理名单，大阿哥陷害太子之事被揭出，则是在半个多月以后，被关押治罪更要到当年的十月底。因此允祥绝不可能是大阿哥一党，雍正帝后来所说的允祥与太子要好，而遭到大阿哥打击，当属实情。

二月河先生笔下的允祥是个光彩照人的重要人物，在小说里，他的

母亲是高贵的蒙古公主，为雪家仇国恨嫁给康熙皇帝，又因为忘不掉与汉人落魄书生的刻骨爱情，在生下允祥后落发出家。有了这段前由，允祥从小被兄弟们欺凌歧视，靠着四哥胤禛的保护才长大成人，他知兵善战，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侠王，后来受废太子牵连被康熙皇帝圈禁十年，但始终对胤禛忠心耿耿，在关键时刻率兵拥戴其登上皇位。

历史上允祥的形象与作为和小说中的差距很大。允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比太子小十二岁，比四哥胤禛小八岁。生母章佳氏是内务府包衣出身的满洲人，以宫女身份入宫后，至少获得了嫔的位分[12]，是康熙帝中期的宠妃。她先后生育了一子二女，可惜在康熙三十八年英年早逝，被追封为敏妃。章佳氏去世后，康熙帝并未将她照例葬入安葬后宫嫔妃的“公墓”——妃园寝，而是临时安放在自己帝陵的琉璃花门之内[13]，或欲令其附葬地宫，或有另设制度的打算，却没有见诸施行。雍正帝即位之初，曾发出一道奇怪的上谕说：“昔日皇考建设妃园寝，为妃母等殡所，唯敏妃母一位，皇考曾降谕旨暂安于陵寝琉璃花门之内宝城近处，俟入宝城。今钦遵皇考原旨，奉敏妃母安于宝城内。在宝城内安奉者，只有敏妃母一位，应追封为皇考皇贵妃。”有学者认为，敏妃生前的位分并不十分显赫，不具有附葬帝陵的资格，想必已经在妃园寝内下葬多年，雍正帝是为了额外抬高允祥的身份，才假托康熙帝遗命，将其生母跨越两级追赠皇贵妃，并从妃园寝移葬景陵。事实上，从现存的档案来看，敏妃去世后确实安葬在景陵内部，之所以没有进入地宫，很可能是康熙帝尚有顾虑，不方便一步到位。雍正帝的做法，并非特意违背父命来示好弟弟，而是真正的顺水人情，满足父亲优待宠妃的遗愿。

章佳氏去世时允祥只有十二岁，可以算是幼年失恃，但绝非二月河笔下的受尽欺凌。康熙帝爱其母而及其子，对允祥十分偏爱，加意培养。在一废太子之前，康熙每次东巡、南巡、木兰秋围都把允祥带在身边，且常常只带太子与允祥两个儿子出行，这是诸皇子中绝无仅有的。此外，康熙帝还多次让不到二十岁的允祥单独祭祀盛京、泰山，对他的重视程度很高。允祥本人也聪明勤奋、文武双全，年纪轻轻就在诸皇子中显示出卓尔不群的能力。皇八子允禩的亲信何焯曾在信中提道：十三殿下是皇帝所钟爱者，日后必然前途无量。

青少年时代的允祥是乃父的重点培养对象，培养目的当然是为了让他日后能够亲近、辅佐太子。允祥成婚时，康熙帝为他择娶的是兵部尚书马尔汉之女兆佳氏。马尔汉因随索额图出使俄罗斯勘定边界而获高升，又与索额图的女婿、大学士伊桑阿是儿女亲家，无论婚宦，都称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索党”。允祥成婚时，索额图已经失宠败亡，皇帝与太子之间也产生了不小的隔阂，康熙此时为允祥选择这样的岳家，或许有希望他接手索额图势力范围、调和父兄之间关系的意思。从允祥和太子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以及允祥本人生母早亡，没有其他倚仗的背景条件来看，这样的安排本来无懈可击。然而天意弄人，允祥对太子的辅佐失败透顶，反倒是日后辅佐四兄雍正皇帝颇为成功。

也正是因为雍正年间的成功，使得允祥在康熙年间的大量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被销毁。雍正帝即位以后最爱翻旧账，自己的反对派但凡在康熙年间犯了一点错误，都被添油加醋抖搂出来，反复念叨。对于后代的研究者、观察者来说，通过理性判断抽离那些油啊、醋啊，事情的大致脉络自然能有所呈现。然而允祥这样信息被批量销毁的情况，要比添油加醋麻烦得多了。当然，统治者再狡猾，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很多信息从正式、公开的记录上抹去，在私密、零散的档案中未必没有蛛丝马迹。比如本节开篇所说，允祥在一废太子时，被列在太子党核心党羽的名单里，雍正年间修纂的康熙《实录》删去了这一重要信息，却见于聆听上谕诸大臣的满文回奏里。另外，在当月十八日，内务府向皇帝询问，要将皇太子处的包衣大（管领）、饭茶上人（即管理饮食的负责人），以及十三阿哥处的饭茶上人如何安置？得旨：将包衣大、饭茶上人均行退去，交给他们各自的佐领、管领当差行走。[14]换言之，一废太子之后，允祥和允礽一样，都被剥夺了部分侍从人员，甚至可能处于被限制自由的状态。直到康熙四十八年太子复位，允祥才短暂现身于出巡队伍中，然后又随着太子的二次被废沉寂下去，很少现身公开的官方文件。

曾经风光无限的十三皇子在康熙末年虽然还保持着自由身，纵未像二月河小说里写的那样圈禁十年，生活过得却也很不如意。康熙四十八年复立太子之际，皇帝大封诸子，除了已经囚禁的皇长子允禔外，十四阿哥以前的皇子人人有份儿，最不济也获得了贝子爵位，只有允祥一人

向隅，仍旧是平头阿哥。没有爵位就谈不上相应的俸禄、待遇，但允祥当时已经是有多位妻妾、子女的人了，虽然住在宫中，也要有不少开销。即便如此，康熙帝也未对允祥的待遇做出长期打算，而是在内务府每年的催问之下，例行公事给出个“暂由宫中支给一年”的指示，直至康熙一朝结束。雍正帝即位后，封允祥为亲王，曾想一口气赏赐给他安家费二十三万两白银，并声称其“家计空乏”，大概就是针对他在康熙末年这一窘迫尴尬的经济状况而言。

饶是如此冷待，还不能让康熙皇帝消火。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也就是皇太子复立期间，在允祉、允祥、允禵三位皇子的满文请安奏折上，康熙皇帝忽加批示：“胤祥非系甚勤习忠孝之人，尔等若将其放纵，必在一处踉跄，不可不防。”[15]这一条评语话说得很重，表现了康熙帝对允祥很强烈的防备之心，且在几位皇子中公开传达，让他们一同防备允祥，实在不留情面，几乎给允祥的政治生涯判了死刑。允祥年轻时精于骑射，有单骑射虎的光彩战绩，估计身体素质不错，却在康熙末年患上“鹤膝风”顽疾，腿部生长毒疮。雍正即位后，允祥也经年抱病，身体时好时坏，并在雍正八年（1730年）声势正盛时英年早逝，想必和乃父的态度变化及多年的抑郁心情有很大关系。

至于允祥到底在一废太子期间做了什么，由于缺乏直接材料，已经很难确证。从最终结果来看，不外乎两种可能：第一，他按照康熙的意思，亲近、辅佐太子，成为太子最信任的兄弟，但是发现太子有越轨之举时，既不规劝，又不向皇帝检举，甚至为其谋划，或者亲身参与，导致事态恶化；第二，允祥是康熙皇帝的爱子，且当时只有二十二岁，康熙帝对太子芥蒂颇深，有所防备，但对他则不必过于拘泥，难免会说一些更直白、私密的话，允祥与太子交好，不排除有泄密的举动，被证实之后，失爱于乃父。雍正帝即位以后，对允祥特加重用，大臣中有人颇持微词。雍正帝替弟弟辩护说：“若言怡王，自幼强健聪慧，人才优良，父皇优加恩宠，此举国皆知。怡王并非胆大妄为之人，从无非分之念。怡王对皇父尽以子道，对二阿哥尽以臣道，由于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妒忌陷害，因而受株连于二阿哥。”[16]从雍正年间的执政情况来看，允祥心思周密，执行力很强，这一点连雍正帝也很信服，更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所不具备的。是以在一废太子前，允祥虽然年轻，却能成为太子

的左膀右臂乃至核心智囊，康熙帝恼恨太子而归咎于允祥，认为他没有导兄为善，且表里不一，辜负了自己刻意栽培的厚望。

那么是否允祥恃宠而生自立之心，引起康熙帝防备呢？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一来允祥当时的年纪很轻，序齿靠后，没有外戚倚仗，人际关系都依托于太子一系，摆脱太子图谋自立的实力远远不足，稍有自知之明，即不会做此妄想，雍正帝所谓“怡王并非胆大妄为之人，从无非分之念”，即是此意；二来就性格与能力的类型看，允祥也更适合，且甘居于辅弼的位置，能与多疑雄猜的雍正帝全始全终八年之久，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允祥与太子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我们无法判断。至于康熙末年，他又怎么从铁杆太子党，变成了四兄胤禛的亲密战友，就更让人难以揣摩了。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后，雍正帝写了大量怀念乃弟的上谕、祭文，其中多处提到，他与允祥自幼感情就很深，比如：“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贤弟克尽恭兄之道，朕兄深笃友弟之情，天伦至乐，宛如昨日事也。”不过，二人的年龄差距有八岁之多，成长、读书都不在同一个周期，也没有同宫居住的经历。至于教授算学，也不能作为感情最好的充分条件。同样是跟着胤禛学算学，被康熙帝养在宫中、待如亲子的侄儿保泰就和八阿哥允禩关系最好，雍正年间成为重要的打击对象。事实上，一废太子以前的允祥是康熙帝的爱子、太子的亲信，而胤禛的地位则相对边缘，尤其与太子的关系不佳，甚至遭其荼毒，被踢昏后从台阶上跌落下去。是以二人早年的密切交往从何而来，是否真如雍正帝说得那样亲密笃厚且具有排他性，其实很难估量。不过，允祥年纪稍长后，二人一起随父出巡的次数确乎不少，由此增进感情倒在情理之中。再或允祥早年虽是被刻意培养的太子亲信，但与胤禛缘法相投，甚至在太子面前曾为四兄关说，缓和二人的矛盾，遂令胤禛感念，也未可知。

到一废太子之后，二人频繁交往的记录确实多了起来。允祥去世后，雍正帝“检点箧笥，得王诗三十二首，编为一帙”。这些诗都是康熙末年允祥“就正”“寄怀”四兄的诗句，胤禛“爱而藏之，不令弃置”，一直保存在身边。另外胤禛是佛教信徒，曾将自己对佛学的研究刊刻成集，

名《御选语录》，内中即收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与十三弟允祥谈禅论道的长篇大作，大意是劝导生活不如意的弟弟勘破眼前的困扰，去寻得精神和肉体的永恒。再如胤禛第五子弘昼回忆说，康熙五十八年自己生了重病，十三叔父为之奔走医药，使其得以保全性命，父皇对此十分感激，命自己称叔父为父。可见在康熙末年，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非常深入的地步，只是碍于康熙帝对皇子结党的痛恨与防备，而将交往保持在低调，甚至秘密的状态，不太为一般的王公大臣知晓。所以雍正帝即位后，对二人在康熙末年的密切关系常常根据需要或承认，或否认：想突出允祥地位时即承认，想强调自己孤立不党时则否认，翻云覆雨，无一定之说。

雍正皇帝即位以后，马上封允祥为怡亲王，并在其还无所建树时，就密诏其爵位世袭罔替，成为清朝第一个没有军功的“铁帽子王”。雍正初年，允祥与廉亲王允禩、国舅隆科多、大学士马齐一起总理事务，代表雍正帝掌握朝中的财政大权，并执掌禁卫。其信用之专、恩赏之厚，都远远超过同侪的皇子、诸王。此后数年，更是权势日盛，死后配享太庙，甚至恢复本名，不必避“胤”字讳。

从备受冷落，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胤禛对前太子党核心人物允祥如此厚爱、重用，而毫不以其康熙年间所犯的政治错误为芥蒂，是仅仅出于纯粹的手足之情，还是别有利益考量，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我们也难以判断。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进入雍正年间以后，允祥与残存的前太子党成员之间并无避嫌的表现，仍然保持密切关系。比如他的嫡长子和嫡长女，都与太子党成员的子女联姻。其中嫡长子弘暾被雍正帝指婚，娶大学士马齐的孙女富察氏为妻，而富察氏的父亲富尔敦，就是一废太子时被罚“拴九条铁索，于家中圈禁”之人。他嫡长女的公爹伊都立是康熙年间首辅伊桑阿之子，即索额图的外孙。伊都立是科举出身的世家公子，在康熙末年受到连累，沉沦下僚，雍正即位以后则飞黄腾达，官至总督。他在雍正初年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表现活跃，是最早公开参劾允禟、年羹尧的封疆大吏，能对皇帝的心意揣摩得如此精准，若非“朝中有人”，怕是难以做到。此外，允祥的儿子弘昌、弘晈，都与允礽的长子理亲王弘晳交情甚好，两家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乾隆初年，甚至被乾隆帝视为“结党”。

显然，允祥在雍正年间仍然作为前太子党在朝中的代表，这是雍正皇帝默许乃至支持的。雍正帝对诸兄弟、宗室诸王、八旗勋旧大加涤荡、清算，却对太子诸子、索氏后人宽厚相待，甚至加以重用，未尝没有允祥的情面在其中。

允禔

讲完太子阵营中人，我们再来看看几位谋夺太子之位的皇子。皇子中第一个冲出来和太子决一雌雄的是太子的大哥——皇长子允禔。既然规矩是立嫡立长，在允禔看来，老父总共就一个嫡子，嫡子有个闪失，理所当然就轮到他这个长子。何况他的母亲惠妃在康熙帝的后宫中年纪长、位分尊，始终稳居第二集团前列。

允禔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比太子允礽大两岁。按照大排行，他本来是康熙帝的第五个儿子，因为四个哥哥都早夭，就被列为皇长子。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嫡子允礽被立为皇太子，幼年兄弟骤然有了君臣分际，允禔当时只有三岁多，也谈不上失落与否，但随着年纪增长，自然就能感觉出自己和太子在各方面待遇的巨大差别。按照儒家伦理，兄弟之间讲究长幼之序，兄尊而弟卑。太子之于皇三子及以下的诸位皇子，既是兄，又是储君，二尊合一，就算他凡事居高临下，大家从道德、感情上也还容易接受。而太子之于允禔，于国是储君，于家却是弟弟，再拿起大来，可就不好相处了。偏偏太子的性格很高傲，允禔更是刚强，仅从这一点上讲，二人的关系可想而知。

允禔的个人资质看起来还不错，在清宫多年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就说过："（皇长子）是个美男子，才华横溢，并具有其他种种美德。"更兼他是长子，容易获得父亲的器重，所以康熙帝很早就对他刻意培养，委以重任，尤其是在军事方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年仅十八岁的允禔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战，任副将军，参与战事指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允禔又随康熙帝亲征准部，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前面我们提到，康熙帝对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华夏政权的重要政治制度领会不深，在已经立嫡的情况下继续培养庶子参与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这会导致庶子们野心膨胀、结交势力，对政权的稳定交接十分不利。野心膨胀的现象在两次参与重要军事行动的允禔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结交势力，他却没有做到。这也体现出允禔其人虽然表面上有些才干，比如掌握了较好的军事技能，等等，但整体而言是个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手腕的一勇之夫，有夺嫡的野

心，没有夺嫡的策略。

允禔首次出战准噶尔，身份是副将军，当时的三军主帅是他的亲伯父裕亲王福全。允禔如果是个少年老成的谋略家，在学习指挥、勇敢临敌的同时，就要借此机会笼络军中将士之心，特别是伯父之心，以为日后留出地步。可惜，允禔此行，不但未见结交什么可靠之人为生死袍泽，反而和秉性忠厚老实的伯父闹了很大矛盾：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出兵，不到一个月，就和裕亲王“不相和谐，妄生事端”，并且“私行陈奏”，就是背地里向父皇告伯父的黑状。幸而康熙帝行事公正，并不偏信儿子，得知情况后，不顾自己丢脸，将允禔强行撤回北京，事后又百般弥合，才避免伯侄二人的矛盾完全公开化。裕亲王福全是康熙帝唯一的兄长，很受皇帝的敬爱，他喜欢皇八子允禩，就让允禩在父亲的心目中大大加分。年轻的允禔有机会与伯父成为工作搭档，却不能给讲话如此有分量的人物留下谦虚好学的好印象，反而闹得不可开交。可见他在笼络人心，特别是笼络关键人物之心的问题上，缺乏基本认识，身边也没有明理而有权威的人对他进行有效的帮助教导。

在很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允禔都是在康熙时期的名臣、大学士明珠的鼎力支持下与太子、索额图针锋相对，争夺储位，明珠一般被描述为惠妃的亲兄弟、允禔的亲舅舅。毕竟具有这种至亲长辈的身份，才能够操控局面，且有拼了老命不要，为外甥谋夺储位的合理性。事实上，明珠与允禔之母惠妃不但不是兄妹，甚至连亲属关系都没有。按照清代《玉牒》记载，惠妃姓纳喇氏，其父名索尔和，曾担任司库，最高的官职是郎中。明珠族中有一堂兄弟名索尔和，此人起家官即为郎中，后来承袭家里的世管佐领和二等男爵，并且升任吏部侍郎，在顺治十一年就病故了，从未当过司库之类的杂佐官，年纪也对应不上。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记载内务府正黄旗包衣中有一人名索尔和，姓乌拉纳喇氏，以郎中终其身，各种信息均与惠妃父亲的记录相当。可知惠妃是包衣出身的乌拉纳喇氏，其父是内务府中下级官员，与明珠家族没有什么关系。

康熙中前期，政府中的实际掌权者是索额图、明珠二人，索额图身为国戚，而明珠足智多谋，二人权势旗鼓相当。康熙早早立嫡，明珠有意见，当是实情。但豁出身家性命不要，为一个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皇

长子公然谋废太子，以明珠之老奸巨猾，是绝不会做的。此外，太子与允禔等人矛盾激化，当在康熙三十七年以后，此时距明珠罢相已经十年，他虽然仍在幕后充当康熙帝的亲密政治顾问，但挑起朝局巨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第一次大封皇子，其中封王的只有两人：皇长子允禔封为直郡王、皇三子允祉封为诚郡王，其余成年皇子则封为贝勒。一年后，允祉因为敏妃丧事受到处分，降为贝勒，只余允禔一人仍居王爵。允禔的自信心再次爆棚了，虽然除了自己的属人之外，他并没有获得朝中哪些重要势力的格外支持，但他坚信，只要拿下太子，空出的储位非他莫属。

一废太子前，康熙帝对允禔的心思已有察觉。他一方面深知这个大儿子心浮气躁，不能立为太子；另一方面因为允禔与太子矛盾激烈，又是兄长，有重大军事行动的实战经验，而不得不利用他对蠢蠢欲动的太子起到制衡、威慑作用。所以每次出巡，康熙帝总是同时带着允礽、允禔两个人，以备事起突然，可以让他们针尖对麦芒，相互制约。一个以舐犊情深、勤于教子著称的父亲，年事渐高，防子之心却到了这个地步，也实在令人唏嘘。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的热河之夜，嫡子与长子终于兵戎相见。塞外深秋，太子骤然被废，允禔带兵护驾，老皇帝当着随行王公百官之面痛哭流涕，历数太子的不孝与失德，哭到伤心处竟然扑倒在地，左右开弓抽打自己的脸颊。即便在这样失态悲愤的状态下，康熙帝仍然不忘公开表示："朕将朕躬安危托付与直王守护，但绝无废胤礽而立直王为皇太子之意。直王为阿玛之事忠心行走，然性情暴躁愚昧。直王，朕实无立为皇太子之意。"[17]这一番说法，真如当头一盆冷水，把一腔火热等着入主东宫的允禔浇了个透心凉。

这样剧烈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康熙帝对他既利用，又轻视，乃至一句话断绝他东宫之路的做法，让本来就性情暴躁的允禔彻底心态失衡，并把一腔怨气都撒在失去自由的废太子允礽身上。他一边在康熙帝面前念叨允礽的种种不是，说：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如果父皇顾念父子之情，不愿意脏了自己的手，我愿意替父皇杀掉他；一边借看守允礽

之便，苛刻虐待，将其身边做事的所有匠人都撤去不用，又对他们加以苦刑，以致匠人们不堪受刑而逃走，甚至上吊自杀。他还派出身边的太监、护卫四处打探消息，上蹿下跳，十分强横。此外，按照雍正帝即位后的说法，允禔在康熙帝面前构陷与允礽交好且同在热河随扈的十三皇子允祥，导致允祥在父皇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大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实录》在收入九月初四日废太子上谕时，只保留了康熙皇帝批评允禔暴躁愚鲁，宣布不会立他为皇太子的内容，而把赞扬他对父皇一心一意、忠诚任事的表述删去，将其塑造为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

允禔在诸兄弟中与允禩关系较好，或许因为允禩曾被交给允禔的生母惠妃抚养过一段时间，且是康熙诸子中少见的外表柔善、谦逊之人，肯于在允禔面前做小伏低，能够和刚猛傲慢的长兄和睦。允禔在得知自己储位无望后，直接向康熙帝举荐允禩为皇太子，并称一个叫张明德的看相人曾经说过，允禩以后必然大贵。允禩虽然夙有夺嫡之心，但惯以宽厚稳重示人，并没有引起父皇的格外警觉，一废太子时，他本人在京留守，亦无甚嫌疑可言。哪里料到一向结好的长兄如此莽撞，竟然在这样敏感的时刻，直绰绰保举自己为太子，且说出背地里请相士看相的事，令康熙皇帝一下意识到诸皇子潜蓄阴谋、结党夺嫡的严重性，将本来印象不错的允禩一齐痛骂，斥为“党羽”。

对这个看相人张明德，康熙帝马上下旨，让人仔细查访，哪想到一下就牵连出一件不得了的大案。说来宗室里许多人都憎恨太子允礽，甚至有谋杀他的打算。张明德是当时北京城中颇有名气的异能之士，据说不但会看相、算命，还认识十几个神出鬼没的武林高手。这些江湖上的朋友各有奇能，若是打将起来，能抵杀几百人，飞将起来，深沟高垒不在话下。那位曾经被太子殴打过的镇国公普奇请张明德给自己看相，愤愤说起当今太子骄奢暴戾，大失人心，不如联合反对者把他干掉。张明德是惯靠危言耸听说大话骗钱的人，听了这些话，便记在心上。

在宗室王公圈子里厮混了一段时间后，张明德经普奇等人介绍，开始结识那些不安于位的皇子们。他先去八贝勒府为允禩看相，奉承允禩有大贵之相，并说起自己有纠合高手刺杀皇太子的本领。允禩本有夺嫡之念，不能不为所动，但毕竟事关重大，就与关系最好的九阿哥允禟和十四阿哥允禵商议。允禟等人认为时机未到，不能轻举妄动，遂将张明

德逐出八贝勒府。在允禩这里没有讨到好处的张明德很快引起大阿哥允禔的重视，显然，他对太子的恨意比允禩要大，胆子也要大得多。允禔通过顺承郡王布穆巴将张明德接入府中，叫他相约一干江湖朋友，在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聚集北京，刺杀太子。孰料太子九月被废，所谓的刺杀活动当然不能再按原计划施行。鉴于张明德在北京的活动范围很大，结交人员复杂，允禔生怕自己参与其间的事被别人举发，所以干脆向父皇提到允禩看相一事，想着无论允禩能否立为新太子，都先把自己开脱出来。[18]哪知康熙帝对此事极为重视，非要一查到底不可，是以允禔的所作所为很快暴露出来，并让老父感到他是个随时可能铤而走险的亡命徒，必须严加禁锢，以备不虞。

总而言之，一废太子之后，本来在诸皇子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允禔，把自己的愚昧粗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满洲政权尚在关外时的那些场景：皇太极去世后，合法性最强的皇子豪格与实力最强的皇弟多尔衮争夺大位，多尔衮假意推托谦让，母弟多铎却看着着急，当众断喝：你不当我当！允禔这一手“我当不了让老八当”，和多铎真有异曲同工之粗豪，关外遗风毕见。

一废太子后，允禔这一番喊打喊杀、上蹿下跳，以及允禩夺嫡野心的暴露，对康熙帝的触动是很剧烈的。这让被允礽气得头昏脑胀的老皇帝猛然惊醒，意识到：太子不安于接班人的位置，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废太子后，诸皇子群雄逐鹿、谋夺接班人的位置，恐怕是对自己更大的威胁。另外，冷静下来的康熙帝开始尝试设身处地想到太子的难处：面对这些虎狼之子，自己尚且芒刺在背，何况是年轻的夹在父皇和兄弟们之间的允礽呢？他的压抑与失态是否因被人逼迫、陷害，乃至诅咒？

正在这时候，与废太子允礽交好的皇三子允祉又送来一颗重磅炸弹，即允禔命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一干人等在王府作法，魇镇诅咒废太子允礽。在康熙帝派人查证的过程中，不但“挖出镇魇物件十余处”，还牵连出一串咒魇事件，其中一个叫布彦图的当事者，因为要举发此事，竟被杀人灭口，其性质之恶劣可见一斑。允祉的举报给急欲稳定废太子后朝局人心的康熙皇帝找了台阶，他马上认定巫术诅咒属实，太子是因为被诅咒才神志恍惚、行为错乱，并非本性败坏不可救药，这就为复立太子找到了理由。

巴汉格隆诅咒太子案发后，康熙帝下旨将允禔革去王爵，在家拘禁。但一开始的看管并不十分严格，且允禔府中藏有大量武器，府前又有集市，往来人员混杂，多有为其传递消息之人。被拘禁的允禔也患上了太子在木兰围场那样的“疯疾”，暴躁癫狂，犹如走投无路的困兽。雍正帝即位以后，还曾回忆过这段往事，说“从前大阿哥畏人杀之，每夜各门加锁”，可见其精神处在何种惊恐焦灼的状态。然而困兽之斗，尤其骇人，当时京城传言纷纷，有说允禔恨极了九门提督托合齐，要派人杀他，又有允禔的亲信扬言：“若我阿哥以二寸纸写文给托合齐，他岂敢不深夜打开城门？”[19]康熙四十八年四月，考虑到允禔性情暴戾，胆大包天，一旦皇帝出巡在外，说不定会挟持内宫太监，假传太后懿旨或是皇帝密旨，跑出府来，闹个天翻地覆，其余皇子都是他的弟弟，未必能够阻拦控制得了，是以康熙帝不敢对他再抱有任何改过自新的幻想，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告诫诸皇子，永远不许将其放出。至此，曾经风光无限的皇长子允禔成为九王中最早失去人身自由的一个。

允禩

如果说允禔、允祥是在夺嫡斗争中第一批失去机会的皇子，那么皇八子允禩大概可以算是第二批，这和他们在此前的受重视程度大致成正相关。允禔和允祥是一废太子之前最受重视的皇子，离权力核心最近，行事最显眼、张扬，受到的打击也最早、最大，一个终身监禁，一个弃置无爵十几年。相对这两人而言，允禩在一废太子以前的活跃程度要弱一些，或者说是公开的活跃程度弱一些，他在私下里是非常活跃的。

允禩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太子小七岁，比四兄胤禛小三岁。他的生母卫氏出身较低，是内务府管领下人的女儿。卫氏在康熙十四年通过内务府选秀入宫，和她同一天入宫的还有雍正皇帝的生母乌雅氏，以及十二皇子允祹的生母万琉哈氏。乌雅氏生育三子三女，康熙十八年封为嫔，二十年就晋位为妃。与乌雅氏相比，卫氏只生育了允禩一个儿子，康熙二十八年与资历浅得多的允祥生母章佳氏一起受封为嫔，康熙五十年去世前才晋封为妃。

允禩幼年抚育于惠妃宫中，稍大后又短期养在康熙帝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并非由生母抚养长大。然而，或许由于母亲名位的缘故，允禩很早就懂得收敛性情，表现出温和平易、与人为善的一面，乃至身为皇子，还有惧内之名，这和太子、允禔等人的张扬、乖戾、生活骄奢形成对比，很能得到长辈的喜欢，同辈、晚辈的拥戴。比如他的养母惠妃，虽然别有亲子允禔，但显然对允禩的关爱更甚。允禔被囚禁时，惠妃“亦奏称其不孝，请置之于法”，无论是真心还是忍痛，毕竟做出了支持康熙帝决策的表态。到康熙五十三年，康熙帝因为“毙鹰事件”痛责允禩，父子之间几乎恩断义绝，而此时的惠妃，或为保护养子起见，与皇帝发生激烈争执，以致外省督抚都有所耳闻。[20]康熙帝唯一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也赏识这个侄儿的为人，向康熙帝称赞其“心性好，不务矜夸”。

此外，康熙帝第二、第三任皇后家族的重要成员都是允禩的支持者。阿灵阿是康熙年间的重臣，除了承袭父亲遏必隆的一等公爵外，还

担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都统、理藩院尚书，是八旗勋贵集团和外戚集团在朝中的核心人物。阿灵阿的两个姐妹分别是康熙皇帝的皇后、贵妃，妻子是德妃的亲妹妹，女儿又嫁给十七阿哥允礼，所以对诸皇子而言，他不但是十阿哥的舅父，还是四阿哥、十四阿哥的姨父，十七阿哥的岳父。不过在一废太子后，他没有选择任何一个与自己亲缘关系较近的皇子拥戴为储君，反而选择了毫无关系的八阿哥允禩。再如佟氏家族的长房长子鄂伦岱性情强横，对自己的父亲佟国纲都敢忤逆顶撞，却也肯买允禩的账。

至于亲兄弟中如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等人，也都是允禩的铁杆支持者，不但心甘情愿为他送钱、送物，还在他受到康熙帝切责时表示愿意与之同死，足见其受拥戴程度之高。

年轻的允禩之所以能在众多兄弟中引人注目，并不在于他的文韬武略有多么出众，而在于性格好、情商高，对重要的人际关系都能用心维护，往往一番话说下来，就让人有推心置腹之感。在太子地位稳固、诸兄弟相安无事的阶段，他这样的气质和为人，当然也会给康熙皇帝留下不错的印象。康熙三十七年，十七岁的允禩被封为贝勒，是受封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在一废太子的紧要关头，康熙帝又临时命令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主持宫廷事务，对他的能力，特别是忠诚度，给予了很大信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莽的皇长子允禔突然向父亲提出，如果自己不能做皇太子，那么允禩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之前有个相士张明德就说过，允禩有大贵之相。这样的说法，让康熙帝“为之惊异”，他可能从没有想过，这个不嫡不长、以贤德著称的八儿子，竟然在背地里有这样的野心和能量，不但窥伺东宫，还能让比自己年长八九岁、性格暴烈的长兄甘居其下。如此心机，足以让已经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康熙帝又一次不寒而栗：这些不肖之子，到底还有多少阴私勾当把朕蒙在鼓里呢？气急之下，他下令将允禩锁拿处置，不料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公然出列为之辩护。康熙帝再度失态，拔剑要杀允禵，一时间父子兄弟乱作一团，压抑多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了。康熙帝无可奈何地向群臣感慨：如果这样下去，等朕死后，诸皇子一定会把朕的尸体扔在乾清宫不管，各自束甲相争去了。

因为废太子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故，康熙四十七年入冬后，老皇帝生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他开始考虑再次立储的问题，一则压制蠢蠢欲动的诸子，二来以备自己身体的不测。从当时康熙帝的口风来看，他已经将允礽的悖逆之举，归结为允禔的魇镇谋害，撇清了允礽的主观故意性，还把对允礽有所威胁的允禔、允禩双双革爵关押起来，为复立允礽扫清障碍。不过此时的康熙帝已经意识到，由皇帝一人决断，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做法，纯粹出于华夏王朝的政治传统，与满洲旧制难以兼容，以致诸子争锋，朝局动荡，不但立了三十多年的太子丧失人心、坐不住位子，就连自己也英名不保、老脸丢尽。这一回，计划着吸取前次教训的康熙帝，居然要把立储形式退回到满洲的部落军事民主制阶段，而且民主范围更大——令满汉大臣齐集公所，从诸皇子中保举一人为皇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康熙帝下旨，令满汉大臣等会同详议，推举除大阿哥之外的一名皇子为皇太子。“众议谁属，朕即从之。若议时互相瞻顾，别有探听，俱属不可。”为了确保所立者是允礽，康熙还特意做了一些安排，比如要求对嫡长子即位抱有执念的汉大臣多参加讨论，另外不许怨恨太子的大学士马齐在其中干预。值得一提的是，马齐和太子允礽的关系本来不错，他曾参与索额图主持的中俄议界之事，又在康熙帝三征准噶尔时留京辅佐太子。之前讲过，“帐殿夜警”事发后，其子富尔敦被作为太子死党抓了起来，交予马齐本人拴上九条铁索圈禁家中。估计为了自保或是救子，马齐在此后与太子反目，开始转向允禔、允禩等人。康熙帝后来当众斥骂马齐祖辈卖主求荣，通过陷害本旗贝勒投靠上三旗，即是对其家族“老毛病”的羞辱。

群臣接旨后，先是惶恐一番，说：如此大事，非人臣所当言，我们岂能推举太子？还是请皇上乾纲独断为是。皇帝不听，坚持让群臣保举。结果，一张写着“八阿哥”三字的纸条交到了跑进跑出传旨的太监总管梁九功、李玉手上。康熙帝看后很不满意，又命梁、李二人告诉开会的群臣：立皇太子乃是大事，八阿哥年轻不更事，生母出身低微，本人又刚刚获罪，你们仔细考虑好了再奏！大臣们仿佛故意与皇帝抬杠，又说：皇子们都是天资聪明之人，但是臣等居于外廷，如何能够深悉？知子莫若父，既然皇上您不满意我们推荐的人，那还是您怎么说，我们就

怎么听吧！康熙帝不肯罢休，又命众人各自推荐皇子人选，每人单写在一张纸上，再署上自己的名字进呈。然而皇帝显然高估了个人意志对群臣的影响，无论他怎样暗示，甚至改变选举形式，民主集会的结果都没有变化——满汉大臣众议咸同，愿意保举还被关押着的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

这样的结果，对在位近五十年，自以为对朝廷局面如臂使指的康熙皇帝会产生怎样的打击，读者自可想见。自己培植、任用的满朝文武，居然为了一个年轻、没有功绩、母家卑微的允禩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惜悖逆自己的圣意，这是多么令人恐惧而且不可思议的事啊！只是当时的康熙帝正在病中，根本无力，甚至也不敢对满汉群臣进行大范围追究。眼看暗示没有用处，选举更行不通，康熙帝只有打出孝庄太后和允礽生母赫舍里氏这两张亲情牌，亮明自己仍旧属意允礽的态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皇权终归是皇权，一旦公开摊牌，群臣唯有俯首听命，此前“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的客气话，也只好硬吞下去。

转过年来，到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下旬，康熙皇帝的身体状况有所转好，想起去年冬天的事情，未免气不打一处来。愤懑之下，康熙帝不遗余力地要找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元凶”，以证明群臣保举允禩，并非出于公心，而是“元凶”们串联作弊，群臣望风附和的结果。于是他下旨质问当日参加保举的大臣：朕让你们保举太子，你们一窝蜂地保举允禩，这一定是你们平时谋划结党所致，你们现在自己交代，当日最先提出保举允禩的是谁？群臣中为首的领侍卫内大臣巴浑德回奏说：当时臣等分文武两班序坐，大家都说要保允禩，所以就入奏了，并没有首先发言提议之人。康熙帝不屑一顾表示：哪有什么“所举皆同”之事，一定有人倡议组织，你们快快从实交代！皇帝穷究不舍，挨个问去，众大臣一时你推我，我推他，满人推汉人，官大的推官小的，只求先把自己摘出去。

康熙帝很怀疑是大学士马齐从中捣鬼，为此屡加逼问，汉大学士张玉书没有办法，只好说：“当天满汉群臣奉旨齐集，满大学士马齐和温达比臣来得早。臣问他们今天召集群臣是要议论什么事？马齐说是皇上下旨，命大家从诸皇子中推举一人为太子。臣又问那推举谁呢？马齐说大家都想推举允禩。后来果然很多人都说要推举允禩，所以臣等也就一起保奏允禩了。”在现场的马齐见康熙帝震怒，赶紧辩白，说：“张玉书记

错了，他当时问臣保举的是谁，臣回答的是‘尚未定，只是听说众人中有要保举八阿哥的’。张玉书和臣是同僚，他既然问，臣也不能不回答，但绝对没有让他保举允禩的意思。”几个人各执一词为自己辩护，情绪十分激动。按朝鲜人的说法，康熙和马齐一对奔六十岁的君相，如同小孩打架一般，康熙帝当众“殴曳马齐”，马齐毫不示弱，竟在皇帝面前“拂袖而去”。直气得康熙帝当天晚饭都难以下咽，第二天早饭也吃得很少。

现场开会的人闹成一团不说，连没来开会的，也牵扯进来。康熙帝的母舅加岳父佟国维当时已经退休，并不参与日常的政务活动，但他对重新推举太子一事也高度关注。当康熙帝透露出自己复立允礽为太子的意思时，这位支持允禩的国之大佬即表示反对，他上奏说：“皇上办事精明，天下人无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此事于圣躬关系甚大，若日后皇上易于措处，祈速赐睿断，或日后难于措处，亦祈速赐睿断，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其意直指康熙帝视储君之废立为儿戏，出尔反尔，若将大臣们并不拥戴的允礽复立，将要如何收场？佟国维这份带有警告性的奏疏，在群臣中引起很大反响，被允禩的支持者们称赞为“如此方谓之国舅大臣，不惧死亡，敢行陈奏”，他本人也被视为拥立允禩的大后台。康熙帝一向对佟国维非常尊敬，甚至有些迁就，但受到这样尖锐的指摘，不免气得手脚冰凉，大骂佟国维：“朕若诛尔，似类沽名。朕今断不诛尔，其坦怀勿惧，但不可卸责于朕躬。观尔迷妄之状，其亦被人镇魇欤？”

很快，佟国维、马齐，特别是马齐，成了康熙帝最大的出气筒。其中佟国维被训斥罢职，不许再参与政事；马齐被革职拘禁，他的两个弟弟李荣保、马武，前者枷责，后者革职，其余族人凡是有爵位或官职的，一律革退，处理相当严重。

事实上，在这次“民主推荐”活动前后，除佟国维、马齐两巨公外，还有许多王公大臣积极为允禩出头，包括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以及康熙帝第二任皇后的亲兄弟、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第三任皇后的堂兄、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侍郎揆叙，汉大臣户部尚书王鸿绪，等等。雍正帝即位后回忆说，这些人当年的串通办法，是由揆叙与廷臣暗通消息，每人在手心写一个“八”字，开会时互相告知，以张声势。

凡此种种，让饱有政治经验的康熙皇帝很快从极端愤怒惊惧中找回了足够的理性：这些允禩的铁杆支持者，都是自己的近亲、重臣，是政权班底的核心成员，如果处理太重，必将引起举朝恐慌，那样的话，别说允礽难以复立，自己的统治根基，也要被严重动摇了。经过反复考量，康熙帝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对允禩，一边强调他有罪，母家微贱，不能立为皇太子；一边免除了他邀请张明德看相，结党谋夺储位的罪过，恢复贝勒爵位。对允礽，则先让他向群臣保证，以后痛改前非，绝不记仇，而后宣布他身体痊愈，可以复立为太子。

复立后的允礽威望愈弱，不安全感愈强，在一片风声鹤唳中勉强支撑几年，到康熙五十一年十月，终于再度被废。太子再废，允禩信心十足，以为储君之位非己莫属。他甚至跑到康熙帝跟前试探说，现在这个时候，儿臣不知如何自处，宁愿称病不起。按照当时的情形，俯从众意，立允禩为太子，算是个人己两便的法子，也熄灭了其他皇子争储的野望。不过，一世好强的康熙大帝，绝不甘心被他的八儿子和大臣们一起裹挟就范，他宁愿储位虚悬，让众皇子群雄并起，也不肯让这个外饰宽仁、内藏险诈的“活王莽”允禩称心如意。

允禩满心热衷，康熙帝态度强硬，父子俩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甚至连允禩的生母卫氏也牵扯进去。康熙五十年，卫氏生了重病，这个既爱子又有很强自尊心的女性，因为丈夫多年来总拿自己出身低微来羞辱儿子，每每感到自责难堪。二废太子以后，眼看丈夫与自己的独生子几乎闹到决裂，儿子前途未卜、吉凶叵测，卫氏的痛苦越发难以排遣。是以生病之后，她拒绝延医服药，希望早日解脱，而免于继续成为允禩前途的拖累。在各自偏见已经彻底形成的情况下，卫氏的这一做法，不但不能促成父子双方和解，反而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对立。在父亲看来，母亲完全站在儿子的立场上，用死来情感绑架自己；在儿子看来，是父亲的轻蔑与绝情逼死了母亲，也将儿子彻底打入不孝不忠的道德深渊。于是，康熙帝为了证明自己并非绝情，在卫氏临死前晋封她为良妃，给予名分上的补偿；允禩为了证明自己至孝，则在母亲死后大悲大恸、大办丧事，“已及百日，尚令人扶掖而行”。

到康熙五十三年，康熙与允禩的关系彻底决裂了，标志性事件有两个。第一件是“毙鹰事件”。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巡行塞外，走

到密云县遥亭行宫时，刚刚从遵化祭奠完母亲良妃的允禩派了一名太监、一名亲随给父皇请安。按照惯例，允禩祭母，是奉旨而行，祭祀完毕，应该亲自赶到出巡路上的某一站候驾、复旨。但他仿佛不想见到自己的父亲，兀自去了昌平的汤泉行宫，说要在那里等候圣驾回京时再见。更糟糕的是，他派人给父皇送去的礼物——两只猎鹰，送到御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康熙帝自两废太子后，一直体弱多病，常常感叹残年不久，如今收到儿子这样的礼物，不能不以为是诅咒。他登时暴怒，自称到了心悸欲死的程度，并当即将允禩派来请安的太监、亲随抓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刑讯，让他们招出谁是自己主子一党。折腾了一通之后，康熙皇帝写信给在京的年长皇子们，大骂允禩：不过是我辛者库低贱的女人所生，从小就阴险主意大，他先如何悖逆谋害太子，然后再纠结党羽保举他为储君。现在我与他父子的恩义已绝，恐怕日后必有行同猪狗的阿哥，要为了拥戴他而逼我逊位。我现在写信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如何行事。允禩恨我刺骨，他的党羽也是如此。允礽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屡邀结人心，可见他的阴险，是允礽的百倍。[21]

第二是“雅齐布事件”，时间与“毙鹰事件”相近。雅齐布是允禩乳母的丈夫，清宫皇子与乳母关系最亲昵，乳母之夫自然也是皇子身边最得力信用之人。用康熙帝的话说，允禩最初与太子允礽结怨，就是因为这个雅齐布。当时雅齐布与御史雍泰有私人矛盾，所以向允禩告刁状，允禩年轻护短，打了雍泰一顿，太子和索额图将此事告知康熙帝，于是，雅齐布因教唆皇子为非而被赶出京城，发配到下嫁蒙古的八公主府上效力。后来雅齐布夫妇偷偷返回北京，在允禩的庇护下躲了起来。康熙帝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认为允禩已经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才敢公然抗旨，隐匿钦犯。他派人将雅齐布夫妇处死，又专门写下上谕交给诸皇子，说八阿哥“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断定以允禩的为人，日后一定会为了雅齐布向自己报仇。[22]

至此，康熙皇帝把话说绝，允禩入主东宫的路被彻底堵死了，除非他敢于发动政变，否则再也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那么康熙帝怎么就这样厌恶允禩，不肯给这个群臣拥戴的八王爷留一丁点儿机会呢？除了允禩本人出身低、野心大、争权夺位过于露骨之外，从更深一个层次来

看，当时的清王朝，仍然处在从贵族政治走向君主专制的进程当中，允禩如果坐上皇位，不利于这一进程的继续推进。事实上，从皇太极到顺治、康熙，清王朝的几代最高统治者一直致力于摆脱父子兄弟打天下、坐江山的贵族共治局面，他们想尽办法，用外戚勋贵分宗室手足的权，用旗人中下层的文化精英、精干奴仆分外戚勋贵的权，乃至用汉人分旗人的权。总之是要扶弱抑强，实现将各方势力统统置于君权控制之下的最终目标。康熙帝八岁登基，历尽数十年艰辛，自以为对朝局的掌控已经炉火纯青，如果让他在国本大事上仍然屈就于臣僚，特别是老牌八旗贵族势力，岂非将几代帝王化家为国、化主为君的努力付之一炬？

再从被推举者允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普通人，乃至官员、贵族而言，人缘好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君主来说，总是追求人人称颂，特别是贵族高官的普遍称颂，恐怕就不是一位称职的君主了。毕竟，想要获得哪个群体的称颂，就需要放弃一些原则，对其进行利益输送：想要贵族高官说好，那输送的无非就是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对允禩的这个致命弱点，康熙皇帝看得很透。他曾怒斥力保允禩的九阿哥允禟、十四阿哥允禵是梁山泊义气，预感到允禩如果谋得大位，接下来不过是一场宗室、权贵的分赃大会而已。

此外，从个人能力，哪怕是谋权夺位的能力来讲，允禩也确有不及之处。他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水浒传》中的宋公明，靠仁、义的“人设”收拢人心，而非作为政治家的硬实力——哪怕在自己的团队中，他也从来没有获得，甚至试图获得居中调遣、统一筹划的地位。在夺位期间，支持允禩的皇子、大臣们，比他更像一个主角，经常各行各的主意，表现异常活跃，还经常犯一些愚蠢、任性的低级错误激怒皇帝，累及允禩本人。另外，允禩的感情较为脆弱，顺遂时失于浮躁冒进，逆境一来却没有什么防守反击的好办法，与雍正帝动心忍性、稳扎稳打、做一事成一事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起家草莽，缺乏与群雄竞争的政治资本，所以要在乱世中独树“仁义”的人设，所谓“每与操反，事乃可成”，允禩以同样的策略挑战太子允礽，也获得了刘备那样的阶段性成功。但逐鹿中原、兴复汉室，光靠“人和”终究是不够的，允禩最终败在善用权谋诈术的雍正帝手里，倒也很符合历史规律。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允禩虽然在康熙五十三年就被批倒批臭，却并没有像皇长子允禔，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连爵位也没有被剥夺，照旧享受贝勒待遇，过得比皇十三子允祥宽裕体面得多。这大概是出于两点原因：第一，允禩虽然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毕竟有大量皇子王公、满汉重臣是其拥趸，对他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实属伤众之举，说不定还会激起变故，晚年的康熙万事求稳，不愿意再折腾了。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即在康熙帝看来，允禩虽然党羽众多，却不是个无法控制的人，而且自矜名誉，给予他自由也无甚妨碍，不像大阿哥允禔，暴戾好杀，若不严加看管，不定哪天就敢闹个天翻地覆。

雍正即位伊始，允禩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其支持者绝大多数仍担任要职，但在随后的两三年中，他们几乎没有对新君的统治造成任何实质性威胁，就被分化瓦解、定点清除了。从结果来看，与其说允禩是“八王党”的元首，主动的皇位竞争者，倒不如说他是因为看起来温和、容易挟制，成为被满汉大贵族、大官僚选中的利益代言人，半推半就被裹挟着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皇位之争。

至于雍正帝与八弟允禩的关系，其前后颇多变化，我们放在讲述胤禛的小节再谈。这里需要说的是，在允禩集团中，令胤禛最忌惮的绝非允禩本人，而是皇九子允禟。他计谋多端、善于经营，是允禩集团中摇羽毛扇的重要人物。此外，允禟处事之坚忍有为，也确乎比允禩更强一些。在雍正帝即位，允禩动遭羞辱、酗酒自弃的情况下，允禟仍然做出一些反击动作，令新君颇多顾忌。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终归也是无济于事的。

允禟与允䄉

八王党中的皇子成员，除了允禩本人外，还有皇长子允禔、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以及皇十四子允禵。允禔的情况我们已经交代过了，允禵在康熙末年晋级为直接竞争储位的重量级选手，需要单独拿出来讲讲。至于允禟、允䄉，则不足以自立，放在本节一起来讲。

允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比八哥允禩小两岁，比雍正皇帝小五岁。他与皇五子允祺是同母兄弟，生母郭络罗氏出身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康熙十六年入宫未几即封为宜嫔，康熙二十年晋封宜妃，是康熙中前期最受宠爱的妃嫔，在宫中颇有地位，甚至有些跋扈。雍正皇帝即位之初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足见其强势作风。

允禟虽然有个宠妃生母，另外骑射功夫不错，还对西洋学问颇有研究，却并非康熙皇帝十分看重、着力培养的皇子，康熙四十八年封爵时只封为贝子，与年纪较轻的十二阿哥、十四阿哥同列。允禟对此很不满意，常发些“你们看，我头上的翎子有什么好”“不过革此微末贝子尔”之类的牢骚。康熙帝不喜允禟，除了他后来极力保举允禩之外，大概还和他外貌不佳、机谋多智，又善于以财货收买人心的特点有关。

第一，康熙帝对人的外貌非常看重，他比较喜爱的皇子，大都有不错的仪表，如允禔、允礽，都被传教士称赞相貌英俊，而从现存画像上来看，早年很受宠爱的允祥，则与乃父的气质眉目最为接近。允禟的长相，被雍正帝称为“痴肥臃肿”，又说当年兄弟们在一起，都要拿他取笑。雍正帝对允禟恨之入骨，所以用了这样侮辱性的词汇，但结合允禟存世的画像来看，他的外貌也确乎算是粗壮一路，不及其他兄弟俊美优雅，留给父皇的天然观感不佳。

第二，八王党虽然以允禩为首，又有允禵后来居上，但说到心思机巧、反侦查能力强，却无人能与允禟相比。譬如一废太子后，他就撺掇性子直率的允禵当众顶撞老父，为允禩作保；二废太子后，更是不顾康熙帝严诫诸皇子结党的禁令，通过各种渠道，在允禩、允禵等人之间来回传递消息。雍正即位以后，对八王党进行持续打击，在他连番的羞

辱、贬斥之下，允禩、允禵坐以待毙，乃至终日醉于酒乡。而被远远打发到西宁军中居住的允禟则不肯就范，不但对负责监视他的年羹尧百般拉拢，与山陕客商做买卖，还在居所的后墙上凿窗开门，偷偷与西洋传教士往来计议、转移财产。他甚至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创造了拉丁文转写的满文，让亲信藏在衣袜里带回北京，交给在京的儿子作为新的联络办法，被雍正帝称为“敌国奸细之行”。

前文提到，康熙皇帝其人虽然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但骨子里仍然是个带有鲜明满洲，甚至蒙古色彩的北方民族君主。对于刚强、忠诚的人，即便有些鲁莽、暴躁，他也颇为喜爱。允祥、允禩之所以先受重视，后来被一棍子打倒，很大程度上是在老父面前暴露了自己心机深沉、表里不一的一面，让他觉得琢磨不透，甚至难以驾驭。允禟的智术厉害，连精明自用的雍正皇帝都非常忌惮，更不要说整体风格更为粗枝大叶的康熙皇帝。

第三，允禟善于利用权势谋取财富，不但本人家资巨富，连他的亲信太监何玉柱，资产也有数十万之多。允禟敛财的方式花样百出，比如违反禁令派家奴去东北地区刨挖人参，在灾年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粮食，向各地的督抚大员进行大额的索贿，乃至直接操纵官员选任：管理全国税关的户部贵州司官缺，向来是由他安排的。他的三女儿被康熙皇帝指婚给权臣明珠的孙子永福为妻，因为明珠家资巨富，允禟甚至与家奴合伙敲诈女婿永福及其弟永寿白银数十万两。清初的皇子王公权势显赫，行多不法，但像允禟这样无所不用其极，乃至谋财不避亲的，也着实不多见。

允禟爱财，却不是个守财奴，反而颇以“仗义疏财”示人，且施舍的对象不分高低贵贱。八王党中，允禩是有心做太子、当皇帝的人，自然要保持道德上的纯洁性，要以谦抑、清廉的形象示人，不能有过多贪财好货的举动，另外，允禩本身也不善经营，府邸开支常常入不敷出。所以无论是他自己开销，还是维持偌大政治集团的交往、发展，没有金钱开路，是万万不行的。因此，为八王党赚取活动经费的重任，就落到允禟、允禵身上，其中又以允禟为最。八王党内部，比如允禩日常与王公官员交际的钱，允禵出兵伊始打点部属的钱，成千上万，都出自允禟之手。此外，上到康熙身边的太监头目，下到民间走投无路的流浪汉，以

及做清客的江南文人，做买卖的行商坐贾，周旋于宫廷民间的西洋传教士，都是他送钱送物的对象。他的管家秦道然说他是“好将货财给人，借与人全不计较”。雍正帝则斥之为：“贿买恶棍，到处称誉。”哪怕到了雍正初年，允禟被隔绝在西宁一隅的小镇西大通，也一直没断了在甘肃、青海等地做买卖，他此行携带巨额金银，且出手十分大方，采买物品不计价格，听卖家索要。使得远近大小商人无不知道西大通来了九王爷，豪爽贤德，遂趋之若鹜，小城西大通一时间竟成了个商业中心。

允禟这样的行事做派，很有些晁保正、宋押司的风范，却不大像个高级贵族，乃至皇子。那些极力夸奖他的人，也大多不是权豪势要，毕竟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还是以政治追求为主，全以利结，不讲究点道德美感，并非根本之计。因此，虽然也有些人在康熙末年称赞允禟“气象大气”“有帝王体”“相貌大有福气，将来必定作皇太子”，但他终归还不能算作储位的有力竞争者，而只能作为八王党的财神爷。

允禟和八哥允禩的感情很好，在一废太子时就支持允禩夺嫡，甚至自掏腰包付允禩请术士看相的赏钱。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允禩与康熙皇帝决裂，备受打击，允禟仍对他不离不弃，直到康熙五十七年允禵出兵青海，态度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为允禵争取储君之位。比如允禵出发前，允禟就送去一万两白银，此后又多次送银到青海前线，总计有数万两之多。康熙六十年允禵从西北返回前，他还不计工本，将允禵的花园修葺一新；允禵再赴青海时，他又受其托付，代为观察康熙皇帝的身体状况而后传递消息。因为这一层交情，允禟扬扬得意，对人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然而康熙帝病重逝世过于突然，允禟还没来得及给允禵送出信去，雍亲王胤禛就已经捷足先登，坐上了皇位。允禟震惊之余，也只能徒呼无奈，感叹“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了”。

相比九阿哥允禟的足智多谋，十阿哥允□的个人能力就弱得多了，不过他天生自带一种优势，是其他皇子无法相比的。允□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比九哥允禟小两个月。他的生母钮祜禄氏出身满洲阀阅之家，是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康熙帝继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她于康熙十七年入宫，三年后即凭借出身优势获封贵妃，康熙三十三年英

年早逝，谥号“温僖”。所以在康熙的众多皇子中，从生母地位上看，允□仅次于嫡子允礽，居于第二；而从外戚门第、势力上看，恐怕还要比允礽更高一些。仅凭这一点，特别看重后妃门第的康熙帝就对允□格外优待。

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册封皇子，允□未满十五，没有受封。到康熙四十八年第二次册封时，则一举被封为敦郡王，爵位与七阿哥允祐相当，超过八阿哥、九阿哥两兄长的贝勒、贝子。当然，允□的出身高贵、优越感强，也更大程度上衬托了他的能力低下，但凡他文韬武略可以造就，就会成为储位的有力竞争者和大批权贵的拥戴对象，而非只作为八王党的二线角色。

允□的亲舅父阿灵阿，以及表弟阿尔松阿，都在八王党中占据核心位置。特别是阿灵阿，两次废太子后，都积极策动群臣拥立允禩为皇太子，与佟皇后的堂兄鄂伦岱并称“党首”。皇十七子允礼因为娶了阿灵阿的女儿为妻，也受到允禩等人的拉拢，从二废太子后就常被赠送礼物，彼此往来不断，允禩、允禟等聚会、交谈，对他也不大避讳。雍正帝即位伊始，也将允礼看作天然的允禩一党，准备打发他给康熙帝守灵。亏得当时的头号新贵怡亲王允祥出面作保，大约说他年纪尚轻，在其中也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建议皇帝还是广结善缘为主，不要把打击面搞得太大。雍正帝见纳其言，这才免去了允礼的祸事。允礼逃过一劫后，对雍正帝感激涕零，且急于自效，多次充当其打击兄弟的先锋，遂得转祸为荣，成为雍正朝中后期宗室中的实权人物。

允禵

在皇八子允禩一节中讲到，以允禩为首的八王集团，规模庞大、成员档次很高，几乎囊括了在朝各个利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但在这个集团中，允禩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和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康熙五十三年，发生了令康熙皇帝愤懑异常的“毙鹰事件”和雅齐布匿藏京师事件，允禩与老父的关系彻底闹僵了，如果集团成员们还死抱着允禩不放，就有造成君臣决裂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无论哪一方都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八王集团的主要成员，包括允禩自己在内，都做好了在本集团内另选一位代言人的打算。对他们来说，这是个经济实惠、可操作性强的办法，毕竟八王集团皇子众多，有内部调整的余地。

这个被新推出来的代言人就是十四阿哥允禵（本名胤祯，后避雍正皇帝讳被改名为允禵），是雍正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弟弟。他们的生母德妃乌雅氏，出身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在康熙十四年与允禩的生母良妃一起入宫，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先后生育了三子三女，与允祉生母荣妃并列康熙皇帝生育子女最多的后宫妃嫔。允禵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比同母兄长胤禛小十岁，比八哥允禩小七岁，是康熙帝参与储位争夺的诸皇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允禵年轻时是个直性子，高傲而率真，雍正皇帝多次批评他“狂妄”“糊涂”，但也承认他“至奸诈阴险之处，则与阿其那、允禟相去甚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性格，其实往往会讨得父母纯粹的喜爱，康熙帝早期对他的态度，想必不出于此。允禵与八哥允禩的关系很好，曾经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给陷入大麻烦的允禩保驾护航。比如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后，康熙帝当着诸皇子的面怒责允禩妄蓄异志，谋夺储位，还要将他锁拿问罪。这时候九阿哥允禟就撺掇身边只有二十岁的允禵，说咱们此时不表态更待何时？可是说话的允禟自己并没有站出来，倒是允禵挺身而出，顶撞正值暴怒的老父说：“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欲保之！”气得康熙帝拔剑而出，差点将他当场手刃。被轰出宫去之后，允禵还不罢休，准备相约众皇子一起为允禩保奏。他还让人准备了一副枷锁，跟在被锁起来的允禩身后，以示共患难之意；甚至随身携带毒

药，直到允禩被释放之日，才当众取出扔掉。所作所为，倒还真有几分梁山泊义气。不过，老皇帝一时生气，心里却没有真正对这个年少莽撞的儿子产生反感，此后，反而更加看重了。在康熙皇帝看来，年轻的十四阿哥仍然是个朴实、重感情的孩子，没有丢了满洲旧俗。是以随着允禩一党不断被打压，允禵本人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有地位上升的趋势，成为八王党中的新兴力量。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四月，清廷得到消息，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出骑兵，偷袭了已经被清军控制的哈密地区，被儿子们折腾得苦不堪言的康熙皇帝顿时来了精气神——打仗是他的长项，这可比处理家庭矛盾有成就感多了。可惜，这显然是老皇帝的一厢情愿，家庭矛盾发展到这个阶段，儿子们的钩心斗角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一看有仗打，大家就都想着去带兵，这可是展示才干、获得圣心的最好机会。首先有所动作的是被关在咸安宫的废太子允礽，他利用自己妻子生病的机会，通过太医贺孟頫带出一封明矾水写的密信，想让朝中大臣举荐他为大将军。当然，允礽的书信后来落入皇帝手中，他的大将军梦破灭了。但从允礽的汲汲以求也可以看出，这个职位对皇子们有重要意义。

不过，这一仗康熙皇帝并没有派皇子出战，他以吏部尚书富宁安为主将，很快就把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赶出哈密地区，并于当年九月拿下吐鲁番，兵锋直指乌鲁木齐。眼见正面作战不是清军的对手，策妄阿拉布坦派出一支六千人的偏师，由名将策零敦多布指挥，从伊犁奔袭西藏，击溃藏军以及蒙古和硕特部的军队，于康熙五十六年初抵达拉萨，杀掉了和硕特部领袖拉藏汗，灭亡了和硕特汗国，进而向东觊觎青海。康熙皇帝得知拉萨沦陷的消息后，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是从西北进兵，占领乌鲁木齐，威胁准噶尔在伊犁的大本营，迫使策零敦多布从西藏回师，以收围魏救赵之功；一是直接从青海出兵，攻入藏地，在青藏高原与策零敦多布正面作战。权衡之下，清廷选择了第二种作战方案。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侍卫色愣、西安将军额伦特先后率八旗、绿营兵共七千人进藏，然而由于指挥权不统一、后方粮饷接济不利，以及自然环境过于恶劣等问题，清军在乌苏河与准部对峙月余后，陷入弹尽粮绝、伤病无数的困境，最终突围未果，几乎全军覆没。其中西安将军额伦特战

死，侍卫色愣被俘身亡。

这场大败，给本来对进藏战争报有乐观期待的康熙皇帝以极大震动。虽然朝中多数大臣以及青海的和硕特各部台吉都认为藏地远且险，不宜用兵，但康熙皇帝坚持强调，如果任由准噶尔部长期占据西藏，控制达赖喇嘛，就会对整个蒙藏，乃至四川、云南地区造成影响，对清朝西北、西南边疆安全形成严重威胁。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要出动大军与准部再战，夺回西藏的控制权。

吸取了前次进藏孤军深入、轻敌冒进的教训，康熙帝这次在西南、西北的大片地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军事部署，其中入藏大军分南北两路进发，北路是主力，出青海；南路是偏师，出四川、云南。除此之外，康熙帝又从内外蒙古调动军队，充实驻扎在阿尔泰和巴尔库尔的清军大营，与进藏大军配合，随时准备袭击乌鲁木齐，令准噶尔部首尾不能相顾。如此之多的军队，包含京营八旗、驻防八旗、川陕绿营、内外蒙古、和硕特蒙古、西南各民族部落兵等诸多成分，如果没有统一的调度指挥、完备的后勤补给，就无法形成合力，很容易各行其是，乱作一团。而这样高规格的战争总指挥，按照清朝的传统，必须由高级宗室担任。

这样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年仅三十岁，此前从无实战经验的允禵身上。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皇十四子允禵以贝子身份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前往西宁的清军大营，指挥这一次的入藏战争。康熙皇帝下诏，令蒙藏各部配合允禵作战，诏书中写道："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朕深知其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赋予了允禵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限。

这次经过周密筹备的入藏战争，与前次结果大不相同。康熙五十九年，允禵将指挥部移到玉树木鲁乌苏渡口，居中坐镇，另由四川总督年羹尧在甘肃、四川等地筹集调动粮饷军需。清军以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两万余众，从青海进兵；以护军统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兵七千余人，从川西进兵。八月，噶尔弼率川军先行攻入拉萨，并迅速切断拉萨到青海的补给通道，在青海遭遇策零敦多布主力的延信

由此军心大振，也在同年九月开辟绝域，与川军会师拉萨，策零敦多布则率残部逃回伊犁。为了凝聚蒙藏各部民心，清军此次入藏，除了驱逐准噶尔势力之外，最重要的政治策略是拥立亲近清政府的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领袖。康熙五十九年底，随延信大军抵达拉萨的六世达赖格桑嘉措入主布达拉宫，完成坐床仪式，标志着由允禵担任总指挥的第二次入藏战争以胜利告终。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允禵凯旋，请示下一步作战方略，譬如是否继续西进，直取伊犁。康熙皇帝派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率大臣郊迎，给予他很高的礼遇。第二年四月，允禵受命重返西北军前，此时距康熙皇帝离世只有半年光景了。

至于为什么要派十四阿哥出任大将军，除了认为他“确系良将”“有带兵才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深意？特别是康熙六十年建功立业、凯旋还朝后，为什么要让他再赴军前？各方面出于不同的立场，说法当然不同。比如在八王党和一些中立人士，乃至不少朝鲜使臣和西洋传教士看来，让十四阿哥担任大将军，是锻炼他的能力、培养他的威望，以备储君之意，只要允禵一战成功，皇位非他莫属。所以允禵出征之际，一大批说得上话、说不上话的王公亲贵、八旗大臣、闲杂人等，纷纷将子弟送到军中做事，图个军功荣身、从龙在前。至于二次前往西北，则是想让他稳妥善后，乃至借机荡平准部，成一旷世大功。支持允禵争位的九阿哥允禟就很怕康熙把他留在北京，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说明他们把允禵重返西北看作进一步巩固威望、谋取储位的好机会，没有考虑老皇帝挨不到允禵功成班师的情况。

至于他的对手，比如后来的雍正皇帝，给出的解释则完全相反。雍正帝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说：“（皇考）令允禵出征西宁，置之远地，无知之人反谓试用允禵，将定储位，允禵遂妄生觊觎。盖亦思皇考年高体弱，置继统之子于数千里之远，有是理乎？”“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是说康熙帝之所以任命十四阿哥为大将军，是为了把他支远一点儿，免得他在北京跟允禩等人结党沆瀣；先帝他老人家在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情况下，将允禵再次派往西北，分明是给自

己腾地方，如果存心想立允禵，怎么会不让他留在身边、顺理成章地继承大位呢？

对于允禵的两次出征，我们首先还是要从战争本身的需要来加以分析。康熙皇帝发动第二次入藏战争，是基于第一次入藏战争的惨败结局，且是力排众议之举，其调动资源之多，将领配备级别之高，作战的困难、风险之大，并不下于康熙中期的两次亲征准噶尔。这样大规模的重要军事行动，在三军统帅——大将军的人选问题上，一定会慎之又慎，尽量择其善而能服众者。作为一个对政权具有高度责任心，对军事斗争具有丰富经验的君主，康熙皇帝总不至于把这样重要的职位当作朝廷政治斗争的垃圾站，安置自己厌弃的或是难以控制的皇子。从这个角度来看，雍正帝说任命允禵为大将军，首要目的是将其“置之远地”，未免太过狭隘。

康熙五十六年前后，清廷有资格充任大将军的高级宗室数量很少，诸皇子内允禔、允礽已遭囚禁，允禩、允祥都被认为并非忠诚之人，不可能领有重兵。其余年长皇子中五阿哥、七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几位，或平庸无才干，或身体欠佳不能耐劳，或一向不为父皇喜爱，均不具备带兵的资质。四阿哥胤禛不以骑射、军事见长，即位后从未前往木兰围猎即是明证。剩下的允祉、允禵两皇子虽然都是骑射高手，但年龄差达到十一岁，就身体条件而言，三十岁的允禵显然比人到中年的三哥看起来更能适应青藏高原的恶劣环境。更重要的是，允禵在入藏问题上与康熙帝的看法十分一致，没有群臣中普遍存在的畏敌情绪。到西宁后，他多次求战，并把自己的大营从西宁前移至位于玉树地区的木鲁乌苏渡口，靠前指挥。这样的忠勇表现，自然能够让康熙帝满意。

总而言之，在这场入藏战争中，允禵虽然没有亲临战阵，但他在协调各路将领、团结蒙藏部众、扶植达赖喇嘛、抚恤前次入藏阵亡将士等方面，都能贯彻康熙皇帝的指示精神，表现得合乎主帅身份，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雍正即位以后，屡次指责允禵作为大将军营私利己、苦累兵丁、侵扰地方、耗费帑银，种种劣行，简直一无是处。但这一切的指责，无论出于何种视角，对于打胜仗这件事本身而言，都是枝节问题，都不能抹杀这场艰苦卓绝的入藏战争是以全面胜利而告终的

基本事实，也自然不能抹杀允禵作为主帅的正面作用。

至于入藏战争胜利后，允禵再度被派回西北前线一事，如果也从战争的现实需要考虑，其实是不难理解的。青藏局面稳定后，康熙帝已经做好西进乌鲁木齐，乃至直捣伊犁的准备。康熙六十一年二月，驻扎阿尔泰的靖逆将军富宁安奏称："臣接准部咨，今岁大兵移驻乌鲁木齐地方，粮饷马畜能否备办？来年大兵进剿，马畜口粮能否接济？其阿尔泰遣往官兵一万二千名以及随役，自十月起支给粮米，若不敷用，应作何增运之处？令臣与总督年羹尧、巡抚绰奇会同定议具奏。"[23]可见西藏平定之后，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正在康熙皇帝和前线将领的谋划之中，允禵的皇子身份，以及他在入藏战争中的成功表现，使他成为下一场战争主帅的当然人选，回京请示进兵方略后，自然要重回前线。

至于康熙皇帝的身体状况，自一废太子之后，一直时好时坏。他虽然每每为儿子们的不省心而气衰心悸，自叹来日无多，但这样病恹恹十来年，想必也已经麻木适应了。单从这野心勃勃的战争布局来看，起码到康熙六十一年上半年，他还没有明显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以至于八月初还率领诸皇子巡幸塞外，九月下旬才回銮北京。

当然，我们说允禵两赴西北是择其善者，是战争形势的需要，而非被"置之远地"，这并不意味着出任大将军、获得战争胜利，就能与入主东宫、继承大位画等号。允禵做接班人的最大硬伤，是他的年纪太小，在众兄弟里排序过于靠后，顺带着爵位也不够显赫。前面在允禔一节中提到过，按照当时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兄弟之间讲究长幼之序，兄尊而弟卑。新君之于诸王，如果是君、兄合一，发号施令就显得顺理成章；相反，如果大家都是庶出，却以弟君兄，关系就难处得多，一个两个，或是素来和睦还则罢了，允禵在诸皇子中排行十四，前面健在的兄长还有十一位，且多已反目成仇、争斗半世。如果由允禵这样年纪小的皇子继承皇位，恐怕很难理顺与兄长们的关系。康熙帝在批评国舅佟国维谋立允禩为皇太子时说："此事关系甚重，今众人之心既如此忧虑不安，朕躬及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父子六人，亦必至于志意不舒，弗获安适也，诸小阿哥又无足论矣。"[24]谋立八阿哥，则较八阿哥年长之皇子心绪不安，而幼者无足论。行八者尚有此说，何况十四。

另外，允禵因为年纪小，获封爵位也较低，直至康熙皇帝去世，一直都是贝子，前面尚有亲王三位、郡王两位、贝勒一位。二废太子后，康熙帝曾斥责允禩："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25]可见在康熙皇帝的观念里，立储宜择高爵。如果他已经在内心认定允禵为继承人，即应在他立下战功后越过诸兄晋封王爵，以为预备，但事情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

至于允禵一直从属于八王集团，且始终服膺敬爱八哥允禩，恐怕也是他的竞争劣势——虽然立他为嗣不会遭到朝中最强大政治集团的反对，但他本人也难以摆脱这个集团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允禩的缺陷是一样的。只是他的性格更加纯粹直率，和父皇之间的芥蒂远没有允禩那样深。

支持"十四皇子继统说"的学者往往罗列允禵在西北时受到的生活关爱，作为他被默定为储君的证据。比如康熙帝曾将允禵的儿子带进宫中教养，亲自操持他子女的婚事；屡次在书信中谈及自己和其母德妃的身体状况，口气家常而温馨；赏赐他银两、生活用品、饮食，等等。事实上，排除诸王夺嫡、父子反目的特殊背景，康熙帝对子女、孙辈的慈爱之心、舐犊之情一直很强烈，给许多皇子们的书信里都有温情脉脉的表达，操办孙子孙女的婚事也不是一次两次，并非仅针对允禵一人。此外，允禵奉命西征，离家万里，生活条件远不及京师，且具有很大风险，做父亲的对他本人及其生母、子女多加关照，即便优于他人，也属情理之中。为人父母，哪个不是格外惦念不在身边的子女呢？如果将这些生活优待和情感交流一定说成是默定储君的表现，则未免过于牵强了。

那么允禵到底是不是康熙皇帝心目中的继任者？毕竟时至康熙六十一年，对皇位有觊觎之心、有竞争实力的皇子多已纷纷落马，允禵圣眷正盛，又立有大功，作为储位的候选人之一，还是具有资格的。至于最后能否胜出，则要在和其他候选人的对比中加以考量。

允祉

在前面一节介绍过，允禵虽然有大功在身，但他竞争储位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排行靠后、爵位偏低。换句话说，那排行靠前、爵位最尊的皇子，这方面优势就很明显了。康熙帝在位期间，有三位皇子爵尊亲王，即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皇五子恒亲王允祺，三人的生母地位相当，年纪也非常相近，差距都在一岁左右。就个人能力而言，三人中的恒亲王允祺明显弱势，倒不是他本身有什么问题，只是他自幼长在祖母孝惠皇太后宫中，这位太后是个朴实但没什么文化的蒙古老太太，所以带出来的孙子也憨厚而缺乏才干，特别是汉文化水平较低，只能自动退出与兄弟们的争储较量。

除去允祺之外，剩下的允祉、胤禛两位，都颇有过人之处。在反映康熙末年皇位之争的学术研究、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允祉往往被描述成与世无争的书生形象，着墨无多。事实上，他在康熙末年的地位着实不宜小觑，对储位也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允祉出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比太子允礽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马佳氏出身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康熙十六年封为荣嫔，康熙二十年晋封荣妃，一直在宫中保持着较高的地位。马佳氏共生育了六个子女，活到成年的只有小儿子允祉和他的姐姐固伦荣宪公主。允祉幼时被送到大臣家抚养，长到五六岁才回宫，这样的经历给后来的雍正皇帝落下口实，说他是“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将皇子放在宫外哺育，是清初宫廷生活的常态，康熙皇帝当皇子时就是如此，谈不上“厌贱”二字。

康熙皇帝看重年长皇子，对允祉也比较重视，让他随从出征，祭奠孔庙，并经常参加各类巡幸、围猎活动。允祉的资质很高，不但长于文学、书法，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被传教士白晋称为“有非常适合从事科学研究的才能”。此外，允祉的骑射水平也在诸皇子中名列前茅，《张诚日记》记载了允祉在多伦会盟时优异的骑射表现，称他是诸皇子中射箭命中率最高的选手。康熙皇帝很欣赏这

个儿子的才华，在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大封皇子时，将允祉封为诚郡王，与长兄允禔并驾齐驱，而高于四阿哥胤禛以下的弟弟们。

不过，允祉的才能更多体现于本身的学识与武艺，涉及人际关系上，则不擅长。首先，允祉有表达方面的缺陷。雍正帝说他“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又在他针对允禩等人之事紧急要求面奏时拒而不见，理由是“王口钝，着缮文具奏”。其间或有夸大羞辱之意，但也看得出，允祉从小就存在这一问题，到老也没能解决。大约也因为表达上的障碍，使得允祉的社交面比其他人要窄一些，也没能练就察言观色、八面玲珑的本事，一辈子很多次在人情世故上栽跟头。

康熙三十八年，刚当上一年郡王的允祉就触了个不大不小的霉头。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十三阿哥允祥的生母章佳氏病故。我们在前面提到，章佳氏是康熙中期的宠妃，她的早亡让康熙皇帝很是遗憾，除了马上追赠她“敏妃”的封号外，还准许允祥为生母素服三年，并将其棺椁安放在自己的陵寝内，或有令其附葬帝陵的打算。然而允祉作为已经封王的年长皇子，对这位年轻的庶母表现出了明显的轻慢，敏妃死后未及百日，他就自己在家里剃了头，违背服丧要求。康熙帝为此勃然大怒，斥责允祉“殊属无礼”，将他交给宗人府议罪；他的王府属官也因为“不行规谏”，被下旨锁拿问罪。最终，允祉的爵位从郡王被降为贝勒，王府长史、护卫等三人都被革职。对允祉来说，这个处分还是很重的，除了参与争储被夺爵圈禁外，康熙年间皇子因过降爵，也只有他这一例。

在服丧问题上降爵丢脸还不算是最严重的后果，一件更麻烦的事，是允祉就此与敏妃的亲生儿子、十三阿哥允祥结了仇。前面提到，允祉、允祥两个都与太子允礽关系不错，但在太子身边所起的作用却很不一样。允祉与太子在感情上“甚相亲睦”，但太子却不大听他的话，自己的一些机密事情也不邀他参与。这或许是因为他早已分府在外，和太子接触有限的缘故，也或许是二人年龄相近，终归稍存戒心。这一点连康熙皇帝也很了解，所以一废太子后，只是将允祉叫到热河问问情况就作罢了。倒是年纪小了十来岁的允祥成了太子党的核心成员，事后受到的牵连非常严重。用雍正帝的话说，允祥之所以被处理得很重，是因为与太子好，受到大阿哥的嫉妒陷害。大阿哥在皇子中年岁居长，屡次担当重任，竟然要去嫉妒以致打击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弟弟，可见允祥在太

子身边的地位确实非同寻常。而允祉、允祥两个对头在太子左右的相处模式，也显得十分微妙。

一废太子之后，允祉、允祥两个人走的路很不一样。前面曾提到，允祥被父皇打击之后，看起来非常沉沦，很少公开露面，但私下里渐渐与四哥胤禛走在一起，并在雍正皇帝登基后陡然大用，一飞冲天。允祉在一废太子后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状态。他先在八王党气焰最盛时，揭露了大阿哥指使喇嘛巴汉格隆魇镇太子一事，给康熙帝提供了太子冤枉，可以复立的借口；随后又与胤禛等一起为生病的父皇检视药方，左右侍奉，从而获得表扬。另外，在这段时间内，允祉的同母姐和硕荣宪公主表现突出，她从下嫁的蒙古巴林部回京，在老父身边“亲膳问安、晨昏不辍”，陪伴四十余日，令康熙皇帝很是感动，特旨晋封她为固伦公主，享受皇后之女才能获得的爵位。太子复立后，康熙帝第二次大封诸子，允祉被优封诚亲王，此后也再没和太子党扯上关系。到二废太子以后，由于排行第一、第二的皇子都被圈禁，允祉成为在朝皇子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的一个，其姐荣宪公主在诸皇女中也具有这样的身份。

成为实际上“皇长子”的允祉受重视程度很高，比如康熙帝开始频繁光临他的王府花园，和儿孙们一起游玩、宴会。据《实录》记载，从康熙五十一年到六十一年这十年间，皇帝临幸诚亲王花园共十八次，比排名第二的雍亲王胤禛多出七次。另外，允祉的嫡长子弘晟被封为世子，两个出嫁的女儿都被封为郡主，其中，第二个女儿本是庶出，但封爵却是嫡出的标准。在这一时期内，允祉还承担了不少国家重大文化项目的组织工作。早在康熙四十年，侍奉允祉读书的大学者陈梦雷就开始编纂超大规模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允祉在提供藏书、组织人力、筹集经费等方面给予了很多支持，担任着类似“监修”这样的角色。康熙五十二年，允祉又奉命在宫中开馆，率领翰林院庶吉士何国宗等人修辑天文、音乐、数学类丛书，他组织当时最优秀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参与这项活动，其间还曾派人赴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南、浙江七省测量北极高度及日影。到康熙五十三年，修成《律历渊源》一百卷，包括《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在科技史上具有很高价值。

允祉受到的赏识有目共睹，在储位迟迟不定的情况下，一些投机人

士就不免要打他的主意。康熙五十五年底，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说有一个叫孟光祖的人，自称是诚亲王差遣，到各省游历办事，让督抚们预备接待。说是预备接待，其实就是要钱要礼物的意思。因为涉及皇子派人结交外官，康熙皇帝的神经又紧绷起来，马上把这件事交给刑部审讯。才知道此人行踪已经遍布大江南北，涉及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多个省份。事后查明，孟光祖不过是镶蓝旗下的一个普通旗人，跟允祉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他逃旗而出，自称是诚亲王所差，沿途诈骗钱财。所到之处，有些督抚相信了他的话，送了他不少银子、绸缎、马匹，或者即便半信半疑，也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花钱买个安心。还有几个督抚虽然心知他更有可能是假冒的，没送什么值钱东西，但也不愿意举报揭穿，毕竟张扬出去，允祉脸上没有光彩，万一是真的，那就更结了死仇。所以孟光祖骗了一大圈，就只碰上赵弘燮这么一个胆大的，把他告到皇帝面前。康熙五十七年，孟光祖被处以斩刑，送他礼物的江西巡抚佟国勷革职，四川巡抚年羹尧作为清军入藏作战的后勤负责人被从宽处理，革职留任。

有读者可能会想，孟光祖是否本来就是允祉属下之人，被派往各地联络督抚，为允祉谋求人望，被揭穿之后，康熙皇帝不愿意连累儿子的名誉，才将板子全打在孟光祖身上，说他是冒充王差的诈骗犯。事实上，孟光祖这样的骗子在那个交通、通讯很不便利的时代并不是个例，比如雍正四年十二月，湖广总督傅敏上奏，说据本地一个基层武官报告，有一王姓人士，带着随从和几十匹骡子到了湖南境内衡山县，自称王大人，说是奉怡亲王之命查勘河道，要求当地接待。但是他随身没有携带任何公文，而且既然是查勘河道，也没有从陆路行进的道理。傅敏发现情况不对后，急忙向邻省发出协查通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带人在直隶境内搞水利营田，这是当时全国都知道的重大政务活动。直隶总督蔡珽命令直隶境内各河道文武官员，凡是怡亲王所到之处，要派官兵接待跟随，担任向导。但蔡珽的命令被下属保定营的官员理解错了，以为要将这道命令通传全国河道官员知晓，所以挨营传递下去，已经传了六七个省份。而这个王姓骗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就冒充亲王差遣四处诈骗，且自称“王大人”，故意与当时官方文书中对允祥、朱轼二人的合称“王、大人”相混淆，所以一直骗到湖南地界才被揭发出来。雍正皇帝在湖广总督的奏折上加以

朱批，写道："大笑话奇事！孟光祖之事不料复见于今日！着实严密稽查，务究明其来历根源可也。"[26]

雍正皇帝对孟光祖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比较清楚的，如此类比，显见孟光祖与这个王某一样，确实是个稍知官场运作规律，又很会钻空子的诈骗犯，而非允祉派去联络地方官的属人。不过，这些水平高、胆子大的骗子选中哪棵"大树"作为冒充对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雍正朝的骗子选中怡亲王允祥，是因为他主持水利事务，且大权在握，是外省督抚不敢轻易上奏议论的人。而康熙末年的骗子选中允祉，也自然因为他在诸皇子中地位特殊，是各地官员急于结交巴结的人。比如对四川巡抚年羹尧送给孟光祖礼物一事，他的门主雍亲王胤禛就非常气恼，斥责年羹尧："汝与孟光祖馈遗授受，不但众所共知，而且出自于汝家人之亲口以告我者，尚敢朦胧皇上，得以漏网？即此一事，即汝现在所以负皇上，而将来之所以必负我者也！"把一个上当受骗的事情上升到现在"负皇上"，将来"负我"的高度，足见胤禛对年羹尧结好允祉的表现是何等忌讳。

总而言之，无论年龄、爵位、个人资质，还是父子关系，二废太子后，允祉都是储位的有力竞争者。据《永宪录》记载，当时不少人认为诚亲王"依次当立，欲趋其门"。条件如此有利，允祉自己和身边的人对太子之位也不会没有期冀。雍正八年五月，允祉被他的四弟胤禛做了政治清算，革爵圈禁，其中有一条罪名是："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这件事情发生在康熙五十七年。当时康熙皇帝生了一场病，大学士、九卿等人以为找到了机会，再次奏请立储。康熙皇帝并没有明确回应立储的事，却提出：允礽当太子时的各项服用、仪仗，都是索额图所定，规格太高，很多都与朕所用相当，以致太子忘乎所以，生出觊觎之心。现在你们既然又提到立太子，那就先讨论一下，把太子的礼制标准往低里改改。从允祉后来的罪名看，他对大臣们的讨论结果很不满意，甚至忿然谩骂，如果这个罪名不是凭空捏造的话，确实能反映允祉当时的一些心态。

还有一件更诡谲的事，主角是允祉身边最重要的文学侍从陈梦雷。陈梦雷因为三藩之乱期间的"从逆"经历，一生都很不得志。康熙皇帝怜惜他的才华，让他在皇三子允祉身边课读，两人共事二十余年，费尽心

血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感情非常深厚。陈梦雷当然希望允祉能入主东宫，登上帝位，以使自己在晚年一展抱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陈梦雷找到一个叫周昌言的术士，为允祉拜斗祈福，保佑他沐帝欢心，继承大位，并把那些开过光的食物送给允祉本人食用。另外，陈梦雷和福建同乡、大学士李光地有仇，他让周昌言帮忙施法，魇镇李光地，想着如果灵验，就用同样的方法去魇镇已经被囚禁的大阿哥允禔和废太子允礽，以及对允祉有妨碍的其他皇子。毕竟允祉争储的优势在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依次当立”，如果允禔、允礽被放出，他的优势就自动丧失了。不过，因为魇镇李光地的法术并未奏效，诅咒皇子们的计划也就作罢。

更奇特的是，陈梦雷曾假托天意，自己制作了一个“天降大位”神牌，上面画了一个人像，旁边写着“天命在兹，慎密勿泄，敕陈梦雷供奉”字样。按常理来说，陈梦雷是允祉的亲信，他所供奉的“天降大位”之人，当然非允祉莫属。哪知这位因为朋友坑害而坎坷了一辈子的大学者，至此突然留了个心眼儿，他并没有把允祉的名字写在神牌上，而是“虚空供奉”——万一新皇帝不是允祉，也可以搪塞得过。及至康熙皇帝驾崩之日，四阿哥胤禛灵前即位，陈梦雷大约做官的心过切，一时竟鬼迷心窍，托人辗转告诉胤禛，说自己持有“天降大位”神牌，愿意献给新君，并做新朝辅佐之臣。

雍正皇帝何等精明之人，哪里是这几句漫无边际的话就能糊弄过去的？他马上把陈梦雷及其二子抓起来审问，并下旨说他“招摇无忌，不法甚多……若在诚亲王处，将来必致有累”，待审明之后，即发配黑龙江船厂。至于陈梦雷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倒是颇为欣赏，认为“洵为典籍之大观”。当然，这种好事再不能留于允祉和陈梦雷名下，雍正帝在上谕中，将《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功劳全归于康熙帝的“指示训诲、钦定条例”，并将尚未完结的后续工作转交给自己的宠臣蒋廷锡，使其代陈氏而竣全功。雍正八年，允祉获罪，陈梦雷这件难堪的旧事被彻底揭发出来，成为允祉的主要罪证。毕竟此事前后虽然由陈梦雷操持，允祉亦当持默许态度，不会毫不知情。[27]

允祉的弱项是在兄弟、宗室和满人贵族中缺乏依靠，他的福晋虽然出身显赫的董鄂氏家族，是雅克萨战役主将、公爵朋春之女，却与九阿

哥允禟的福晋是堂姐妹，所以董鄂氏家族的主要代表，如都统七十等人，大多倾向于九阿哥所在八王党势力，而没有押宝在允祉身上。再者，允祉虽然和太子允礽关系亲近，却并没有像允禵接盘八王党主力那样，获得太子党剩余力量的支持。前文提到，废太子的旧部在雍正年间与怡亲王允祥靠得很紧，不但没有被清洗，地位反而有所提高，而这种关系的建立，很可能在康熙末年就已经形成了。因为之前生母敏妃的事情，允祥是绝不会愿意允祉即位的，他竭力支持排行仅次于允祉的胤禛，未尝没有这样的考虑。而带着太子党的残余势力与四阿哥胤禛合股，让原本与太子关系亲近的允祉无所依靠，允祉、允祥的交恶，继敏妃丧礼剃头事件之后，又深了一层。

相对而言，允祉因为屡次主持重大文化工程，个人汉文化素养很高，在兄弟中的排序又符合汉族王朝“无嫡立长”传统，所以从策略上讲，他本可以更多争取汉大臣的支持。但一则汉大臣的实力不强，二来和满人贵族在立储问题上有派系争斗一样，汉大臣的心里也各有盘算。其中对允祉入主东宫最难以接受的当然是陈梦雷的死敌、大学士李光地。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康熙皇帝与八阿哥允禩决裂三年后，李光地仍然坚持“目下诸王，八王最贤”，对风头正盛的允祉不屑一顾。此时的李光地是朝中为数不多的老臣，门生故吏遍布内外，康熙皇帝年老恋旧，李光地是少数几个能和他说上私房话的人。因此李光地的反对态度，也可算是允祉前程的一个不利因素。

胤禛

上

在康熙末年的储位竞争中，胤禛的优势和允祉有相近之处，都是年龄长、爵位高。当然，胤禛终归是四阿哥，序齿上较允祉略逊一筹。但与允祉在宗室贵胄中真正的“光荣孤立”不同，胤禛一直在不动声色地打造自己的政治班底，只是选人在精不在多，保密工作又做得很好，不像允禩、允禵那样大张旗鼓，沸沸扬扬。

众所周知，胤禛政治班底的精英，除了自己的王府属下年羹尧外，还有十三阿哥允祥，以及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步军统领隆科多。但这样的因缘聚合，却颇让人摸不着头脑。前面已经提到，允祥本是太子允礽身边的重要人物，一废太子后由于失宠以及身体原因，沉寂十余年，可神不知鬼不觉，竟成了胤禛最可倚信的“贤弟”，这已经很令人费解了。至于隆科多，原本出身外戚名门“佟半朝”家族，父亲佟国维、堂兄鄂伦岱，都是允禩党的最核心人物，一废太子后，他本人也被康熙皇帝指名道姓斥为与大阿哥相善、欲立八阿哥之人，孰料最后反戈一击，成为拥立四阿哥胤禛的功臣，就更让人琢磨不透。

这样的困惑当作何解？恐怕还要先从胤禛早年的政治倾向与人际关系说起。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特别是一些零散的满文档案被挖掘出来，大量信息显示，一废太子前，胤禛的生活轨迹与社会关系和允禩集团高度相关；如果再大胆一点儿，甚至可以说，决定自立门户争夺储位之前的胤禛，就是允禩集团的外围成员。

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月，是德妃乌雅氏的第一个儿子，与十四阿哥允禵、皇九女温宪公主同母。德妃出身内务府中级官员家庭，门第和惠、宜、荣诸妃大致相当，但她的亲妹妹嫁给了康熙帝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的亲弟弟阿灵阿为妻，算是结了一门很高级的亲戚。另外，康熙皇帝看重与蒙古各部落的关系，亲生女儿大多外嫁蒙古王公，只有两人嫁给京中的世家子弟，其中就有德妃所生的皇九女。她在

康熙三十九年授封和硕温宪公主，与佟国维之孙舜安颜成婚，两年后去世。康熙四十八年，舜安颜因为党附八阿哥允禩被削去爵位，雍正二年去世。可见胤禛无论生母、妹妹，都与康熙帝两位继后的家族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而这两个家族，又是允禩一党的两大支柱。

至于胤禛与允禩、允禟的关系，学者杨珍早就心存困惑，不解他们早期的接触为何如此频繁。杨珍所举的例子包括：胤禛、允禩、允禟三人府邸相连，畅春园附近的别墅也连在一起，而与允祉等其他皇子的花园有一定距离。京邸是皇帝所赐，别墅是本人择地而建，二者都邻近，当是交往密切、走动频繁的表现。一废太子时，允禟曾劝胤禛为废太子代奏，胤禛纳而行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将允禩锁拿，允禟、允禵曾邀约四兄胤禛一起为其保奏。康熙五十年，允禩生母良妃去世后，允禟也曾叫着胤禛轮班给守丧的允禩送饭，参加他们大操大办的丧礼。

除了杨珍女史提到的几点，还有一些史料，也体现出胤禛与八王集团，特别是与允禩本人超乎寻常的关系。首先，胤禛生母乌雅氏与允禩生母卫氏、十二阿哥允祹生母万琉哈氏是同一天进宫的内务府秀女。[28]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这样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古人所谓同年、同窗、同寅，以及我们现代人特别看重的同级生、同年兵，都附带着比其他关系更深厚的私人感情。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远离父母亲人，进宫受人差遣使役，如果没有几个知心、可靠的小姐妹互相慰藉支持，怎么能在等级森严、错综复杂，又几乎没有退出机制的宫廷里生存、发展下去呢？与同年进宫的姐妹培养感情，建立同盟关系，是她们最直接的选择。

乌雅氏与卫氏的关系是很好的，这种关系也被自然而然地传递到了下一代。允禩和十四阿哥允禵结为死党有目共睹，而胤禛此后虽然与允禩闹翻，对良妃及其族人却颇为优待。雍正帝即位伊始，就将良妃的亲兄弟噶达珲及其全族“抬旗”，即放出内务府辛者库户籍，改编为外八旗的正蓝旗下世管佐领，佐领一职由良妃家族世袭。雍正皇帝即位后，给予三位母妃这样的待遇。一位是允祥的母亲敏妃，她已经享受了追封皇贵妃、附葬景陵的至高荣誉，合族抬旗不过顺水推舟。另外两位就是太后乌雅氏的“同级生”良妃与定妃。其时太后尚在世，想必这一层关系还

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雍正四年允禩获罪后，正蓝旗都统尹德上奏，询问其舅族要如何处理。雍正帝又借此大发牢骚，痛骂允禩。尹德后来引用了这段上谕，原文有："噶达珲原系包衣佐领之世仆，朕施恩将其抬出包衣佐领，入于旗分，用为包衣谙班，此等恩泽伊等如何不知？太后额涅、妃额涅系同日进宫，妃额涅亦朕之额涅矣，其（良妃）心亦大。"[29]雍正帝收到奏折后，特意将"太后和良妃同一天进宫，良妃母也是我的母亲"这层意思删去，不欲令人知之，但德妃、良妃两支的特殊关系已经大露端倪。良妃去世后，胤禛受邀轮班为守丧的允禩送饭，大约也出于这样的逻辑：母亲一辈子的好姐妹、老朋友去世了，作为儿子，难道不应该有过于他人的表示吗？

除了生母关系密切外，胤禛与允禩青少年时期还同居一宫，很可能还经同一位养母抚养过，即康熙帝的第三任皇后，时为皇贵妃的佟佳氏。雍正帝即位后，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并拉近与隆科多等佟氏子弟的关系，大肆宣传自己由佟皇后抚养长大，又在官方文书中将隆科多写为"舅舅隆科多"，俨然亲舅一般。当然，雍正帝所言也不算错，他确实由佟皇后抚养过，但佟皇后所养，却并非他一人。康熙二十八年，册立佟佳氏为皇后的诏书中写："（皇贵妃）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佟氏病故后的谕旨写："（大行皇后）抚育诸子，悉均慈爱"。到雍正即位，佟皇后抚育"诸子"的功劳就不见了，径直改为"慈抚朕躬，恩勤备至"，"慈抚朕躬，恩勤笃挚"。从现存的档案来看，康熙二十六年佟皇后所在的景仁宫位下有阿哥四人，康熙二十八年有五人，而直到康熙三十一年，也就是佟皇后去世三年之后，景仁宫仍然居住着大、小两位阿哥，其中大阿哥即胤禛，小阿哥即允禩。[30]此时的胤禛已经十四岁了，允禩也有十一岁，都是读书懂事的年纪，多年同居一宫，自然较他人更为亲近。前文提到，允禩幼年也曾被皇长子允禔的生母惠妃抚养，事实上，康熙的多位皇子都是先在惠妃的延禧宫中居住，年纪稍长后，改居佟皇后所在的景仁宫。这或许是因为惠妃年纪较长，宜乎照看幼儿；而佟皇后具有准嫡母身份，对学龄以上皇子教养更为有益。

胤禛与允禩早年同居一宫，感情不错，这是康熙皇帝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封爵分府，也将他们安排成了近邻。雍正帝即位后，潜邸雍亲王

府升格成雍和宫，需要改造扩建，结果一扩就把允禩的府邸扩了进来，至此，允禩才另搬到台基厂的新邸，结束了和四兄做邻居的历史。府邸、别墅毗邻，平日里接谈待客，就难以瞒过对方的耳目，雍正帝即位后，对允禩等人在康熙年间的社交情况了如指掌，即与此有莫大关系，再对他们实施打击，真是知己知彼，百发百中。

胤禛、允禩两兄弟格外亲厚的关系，在表面上至少维持到“毙鹰事件”以后，有两个例子可以直接说明。雍正四年正月，准备和允禩等人算总账的雍正皇帝抖出他的一件大事，说：“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事竣之后，朕将所有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遂一并焚之矣。此允禩亲向朕言者。”[31]所谓“二阿哥有事”，即指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之事，其时胤禛、允禩二人奉命在京留守，要随时与返京途中的父皇联络，汇报京内、宫中动向。其时允禩的受重视程度尚在兄长胤禛之上，且受命署理内务府总管，相关御批交其保存，应是出于此种原因。“前在遥亭时”，即康熙五十三年底的遥亭“毙鹰事件”，此后允禩彻底失宠。换言之，到康熙五十三年以后，允禩还肯将秘藏御批地点，以及烧毁笔札、御批之类毁灭证据的做法告诉胤禛，可见他对胤禛的信任度之高。

第二件发生于两年后的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据康熙《实录》记载，当时允禩染了伤寒症，病得不轻。康熙帝正在塞外巡幸，就命与允禩关系亲近的十四阿哥允禵和太医一起商酌调治。而对于随驾在身边的胤禛，康熙帝则告诉他应该派人去探病为是。又过了几天，胤禛奏陈，自己派去的人报告说八阿哥病得很重，表示想先赶回京去看看。康熙帝先是答应了胤禛的请求，却转而发去上谕说：“四阿哥随驾在外，惟伊一人。乃置扈驾之事，奏请先回，看视允禩。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允禩医药之事，即着四阿哥料理。”责备的口气颇为严厉，并怀疑他是允禩一党。

这件事情给胤禛的压力着实不小，精明如彼，当然马上转变态度。九月底，圣驾即将进京，而允禩养病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京郊别墅，也就是圣驾返回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按照当时的惯例，皇帝所居、所过的

地方，如果有得了大病的人，都要转移到其他地方，以免忌讳。于是康熙皇帝询问在京众皇子，允禩的病状如何，是否应该把他送回城里府邸。这下，之前被批评为了照顾允禩而置圣驾于不顾的胤禛赶紧率先表态，请求将允禩送回城里，其余皇子也随声附和。唯有皇九子允禟非常愤怒，激切阻拦，说八阿哥现在病得这样重，如果随意挪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来承当？并且要单独上奏争辩。康熙皇帝此时对允禩已经颇为绝情，就向诸皇子说：听说八阿哥病得很重，如果你们认为应该把他挪回京里，出了事，可不要推到朕身上。胤禛等人赶紧一面应承，一面就将允禩移回城内。

这件事情里胤禛的形象颇不体面，且与此后允禩的罪名前后矛盾。允禩的四十款大罪中，有一款是“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伤寒，正值圣祖仁皇帝自热河回銮，冀以病症幸邀宽宥，故托大病，恳求魏珠谎奏，将所停俸米赏给”。如果允禩是三分病七分装蒙蔽父皇，那胤禛在派人确认之后，还急着回京探望，岂不是他的同谋？那么这几条影响雍正皇帝形象的史料，为什么还存在于康熙《实录》内而未被删削，也没有把表述方式变得更有利于雍正帝呢？或许是纂修者更看重这件事里康熙帝对待允禩的决绝态度，而忽视了胤禛与允禩等人的泾渭之分。

其实雍正帝即位后，自己也公开透露过与允禩一党的特殊关系。比如他强调自己做皇子期间从来无意大位时，就提道：“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32]再如康熙朝后期有一旗人名叫马尔齐哈，他官职不高，但通晓医术，还能“指天文而妄谈祸福”，所以常年行走于皇子朝贵之间，是京中的红人。雍正即位以后，对他大加重用，半年之内，即由御史超擢刑部侍郎。马尔齐哈在奏折中跟皇帝高谈阔论，俨然老熟人的样子。然而仅仅过了半年，雍正二年五月，雍正帝就在多道谕旨中称他是廉亲王、苏努之党，并说：“七十、马尔齐哈、常明甚属夤缘恶乱之人，伊等俱系廉亲王党羽……从前朕在藩王时，马尔齐哈曾欲诱入伊党，朕坚拒之。”[33]胤禛堂堂皇子，与允禩从小住在一起，竟说自己要被一个地位不高的中间人诱入允禩一党，不但可笑，还颇为欲盖弥彰。是以这句话仅存于《起居注》内，而被《实录》删去。

这里需要再补充一点：康熙末年诸王夺嫡的氛围下，请医问药，是皇子们结交串通、拉人入伙的重要方式。对于这一点，胤禛运用得尤为

熟练。譬如经马尔齐哈介绍，他知道了同样通晓医理的汉军旗内阁学士蔡珽，很想延揽入彀。蔡珽起初以结交皇子有干禁令而拒绝见面，几经反复后，到康熙六十一年，才通过年羹尧之子年熙牵线，到热河狮子园与胤禛相见。再如胤禛、允祥的秘密往来，一个重要事件是康熙五十八年胤禛之子弘昼得了重病，允祥赠以良药，治好了弘昼的病。雍正帝在位时，他们兄弟二人也常常互相推荐医生、僧道、方剂，当是康熙末年交往方式的延续。

下

胤禛是个才智、悟性很高的人，除了骑射本领较弱外，他的学识、文章、书法都出类拔萃，还有相当不错的政治见解、执行能力，以及审美旨趣和佛学造诣。因此他自视甚高，对别人的态度往往敏感，评价往往刻薄，年轻时城府不深，喜怒无常，性格的负面因素就难免要表露出来。因此，与一起在景仁宫长大、人缘儿最好的八弟允禩相比，早年的胤禛实在不算讨人喜欢。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给十五岁以上的皇子封爵，其中皇长子、皇三子被封为郡王，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八阿哥四位皇子被封为贝勒。当时大臣们建议康熙帝仿照明朝的做法，将皇子都封为亲王。但康熙皇帝没有认可，说：太祖、太宗以来，皇子就并非一概封王，而是要视其贤者封之。当时像代善、多尔衮、多铎这样有才能有功劳的人才封为王，其他皇子或者封为贝勒、贝子、公爵，或者干脆不封。朕现在分封诸子，也要视其贤否而封，不能因为是自己儿子就有所偏私。大臣们以为他是谦虚客气，又说现在是承平之世，情况跟国初有所不同，皇子们“俱各贤明”，希望皇上还是一体封为亲王为好。康熙皇帝只好明说：“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七阿哥赋性鲁钝，朕意已决，尔等勿得再请，异日视伊等奋勉再为加封，未始不可。”[34]可见在这一时期，胤禛在康熙心目中是个有明显缺陷的人，在兄弟中的地位比允禔、允祉差了一截，位置相对边缘。

而对于允禩，康熙帝显然更重视一些。康熙四十二年，太子党的头号人物索额图被拘禁，康熙皇帝在巡行途中手书密旨，派人连夜交给三

阿哥允祉和八阿哥允禩，命他们二人秘密审理索额图，并抓捕其同党。这一年允禩只有二十二岁，能够接受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足见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时，康熙帝命允禩、胤禛二人留京办事，其中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名字也罕见地被列在了兄长胤禛之前。[35]

前面曾提到，除了康熙皇帝之外，无论宫中嫔妃，还是宗室、外戚、勋臣中的重要人物，大多瞩目允禩这个生母地位偏低，又没有同胞兄弟姐妹可倚仗的年轻皇子。年纪更小的允禟、允□、允禵和叔伯家的几位堂兄弟，更是奉之为首脑，连大阿哥允禔这样狂傲自大的人，意识到自己没有夺嫡机会之后，也愿意推举他为太子。与之相比，虽然胤禛的年龄更长、母亲名位更高、与几大家族的亲缘关系更密切，也常年和允禩等人在一个社交圈子里活动，却不能成为其中最受关注的人物。在一个群体里，身为兄长，倒居于次要地位，要捧着弟弟行事，允禔之于太子尚且不服气，又何况胤禛之于允禩呢？

虽然处境别扭、志不能伸，但心性高傲的胤禛却不得不和允禩等人抱团取暖——因为他不但缺乏父皇的宠爱，和太子允礽的关系更是糟糕，如果再不跟势力最大的“在野”兄弟们搞好关系，处境未免太艰难了。雍正帝即位以后，并不讳言他和太子的矛盾，比如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他向全体宗室发布上谕，特意表白自己在康熙年间从无党援，亦无仇隙，其中提道：“前犹有人疑朕与二阿哥不睦。夫二阿哥乃皇太子，国之储君也，二阿哥得罪之先，朕但尽弟臣之道，凡事敬谨。二阿哥所以反求隙者，因朕受皇考隆恩笃爱，意恐有妨于彼，遂至苦毒备加。然朕犹然照常致敬，尽己之道，行乎顺而已矣。”[36]当年十月又在斥责阿灵阿、揆叙的上谕中说：“二阿哥昔在东宫，即朕亦谨守弟臣之礼，但于其乖谬之处决不顺从，迹似强抗耳。阿灵阿等乘此之际，故为与朕和好之景，与众观之，而其一切行为皆似出朕所指使者。无知小人不明大义，竟疑朕与二阿哥为难，谓阿灵阿、揆叙皆附和于朕。”[37]

前一条所谓的“苦毒备加”，在一废太子后，简亲王雅尔江阿等人复述的康熙皇帝满文上谕里得到了印证。上谕中提到允礽凶恶暴躁，凌虐百官，殴打过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爵普奇，甚至还曾经将四阿哥胤禛踢踹昏迷，以至于从台阶上跌落了下去。康熙《实录》为尊者

讳，将踢昏四阿哥这一重要信息删去，但这样的爆炸性新闻，在当时人的记忆中一定印象深刻，所以雍正即位以后，亦不能完全否认，只好笼统言之，说自己曾遭到允礽“苦毒备加”，并将原因归结为“朕受皇考隆恩笃爱，意恐有妨于彼”。显然，这样的归因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两个月后再提到此事时，雍正帝的说法就变了，把“被苦毒”的原因改成自己不顺从允礽的乖谬行径，甚至“迹似强抗”。至于太子有什么样的乖谬行为，他又有怎样的强抗表现，我们现在也很难猜测了。

一废太子前，允礽与多数兄弟的关系都不好，但坐实了大打出手的，只有四阿哥胤禛。稍有自尊的成年人挨了别人的打，尚且愤恨不能释怀，何况贵为皇子、心气高傲的胤禛。再者，今日的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这一脚踢下去，两人就撕破了脸，结下了仇，对处在“弟臣”位置的胤禛来说，以后的生活哪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仅凭这一点，当时的反太子势力，就一定会引这位四贝勒为同道。所以按他自己的说法，像阿灵阿、揆叙这些允禩党的头面人物，都公然和他交好，那些背地里给太子使绊子的行为，仿佛都是他指使的一样。他想撇开这些人而独立不倚，不但形势不允许，也根本没人相信。只可惜，太子一朝被废，无论胤禛的亲弟弟允禵，亲姨父阿灵阿，养母、亲妹婿所在的佟氏一族，还是揆叙这些有影响力的朝廷重臣，竭力保举的新太子都是八阿哥允禩。胤禛白挨一脚、枉担虚名，却仍要以兄辅弟、寄人篱下，也真是令人气短。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巡行途中的康熙帝和太子允礽彻底闹崩了，太子被拘，一心谋夺储位的大阿哥允禔上蹿下跳、喊打喊杀，很快也被父皇怀疑、嫌弃了。与他相比，同样已经和太子矛盾公开化的胤禛表现得非常沉稳，成为一废太子的最大赢家。先是九月十六日，允礽被押解到京，胤禛奉命与允禔一起看守。当时，康熙皇帝对太子的恨意已经有所平息，更忧心东宫虚位后群雄并起的局面。胤禛及时揣摩到父皇微妙的思想变化，果断抛开与太子的旧怨，开始在康熙帝面前为允礽说好话，特别是顶住了允禔的压力，替允礽代奏了他绝无弑逆之心的话，给康熙宽恕允礽，继而复其太子之位找了最重要的台阶。再者，随着允禩请张明德看相事情的暴露，康熙帝对他谋为太子的野心感到警觉，准备将其锁拿问罪。作为允禩铁杆的允禟、允禵二人当众为之辩解，顶撞

父皇，事后又备下毒药，声称与其同死。与允禩等人关系密切的胤禛当时也被邀请参加这次“兄弟同死”的行为艺术，但他没有凑这个热闹，而是和允祉、允祺两个年长兄弟一起，为生病的康熙帝商酌医药，以尽孝道。

如此一番以德报怨、忠孝不党的表现，当然让康熙皇帝感到满意。胤禛也借此机会提出：皇父曾经批评臣“喜怒不定”，臣感到非常羞愧，现在臣年过三十，性情也定下来了，恳求皇父将这个考语免予记载。康熙皇帝随即批准，肯定其为人处事方面的进步。第二年，太子复立，胤禛也一雪首次封爵时的耻辱，和允祉、允祺一起被封为亲王，在爵位上稳居诸皇子中的第一梯队，并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康熙帝驾崩。

有了皇父的赏识和亲王爵位，胤禛当然更不情愿傍着允禩等人行事，是以二废太子前后，他的表现仍然稳健，以参悟佛法为辞，没有掺和到允禩、允禟，以及阿灵阿、鄂伦岱等人的夺嫡活动中去。康熙五十一年，胤禛两次邀请在京的高僧大德在王府集云堂举行禅七法会，并在二世章嘉活佛的指点下参悟重关，颇有进益。及至太子再度被废，胤禛忽地踏破重关，悟透因果，被章嘉活佛称为“得大自在矣”。二废太子后，群雄逐鹿的局面再度展开，以胤禛此时的心境、能力、条件，让他对储位不动心是不可能的。康熙五十二年，他收到那位著名的“谋士”——门人戴铎——的一封长信，鼓励他借太子二废之际力争储位，特别是要对康熙帝左右近信加意笼络，对本门之人举荐提拔，尽快培植个人势力，“否则稍微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对于戴铎的热心，此时的胤禛表现得还比较矜持，说：你的话虽然是金石之言，但我万万没有这个心，当皇帝是个苦差事，躲还躲不及，况且荣辱利害也不在此，你这样的想法说法，以后不要再有了，慎之慎之。

戴铎是个功名心极热的人，一意撺掇胤禛夺嫡。康熙五十四年，戴铎升任福建道员，胤禛托他带礼物送给闽浙总督满保，已有结交外吏之举。戴铎随后写信给胤禛，说自己在武夷山见到一名行踪怪异、言语奇特的道士，准备和他聊聊；又说自己功名甚淡，在福建水土不服，准备告病回京。胤禛这次的回信，口风与两年前就很不一样了。对戴铎辞官一事，他大不以为然，批评戴铎没有志气，“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

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说的是戴铎，何尝不是自况。至于异能道士一事，则批复：“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做闲中往来游戏。功名甚淡，非其时。古人云：炉中若无真种子，纵遇神仙也枉然。”皇子们求神问卜养术士，在康熙末年的语境里，无不是为了夺嫡之事，这一点无论胤禛还是戴铎，都是心照不宣，所谓“闲中往来游戏”，故作清高而已。至于功名甚淡，更非真淡，钗于奁内待时飞罢了。

果然，戴铎再次回信，说自己把胤禛的生辰八字交给道士，道士说“乃是一个万字”，自己闻之不胜欣悦，准备回京当面细说。另外，由于福建到北京很远，寄送的书信涉及关键言语，恐怕途中有变，不宜保密，所以特地做了一个装书的匣子，内有双层夹板，把信札放在底层，上面放书，就算落到外人手里，信札也便于隐蔽。胤禛在回信中大赞戴铎的谨慎，更抑制不住地对道士的话表示了强烈兴趣，让戴铎“不妨细细写来”。可见到康熙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前后，胤禛谋求储位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且不再避讳自己的亲信。

虽然已经有了自立之心，但不知道胤禛用了什么办法，能让允禩、允禟等照旧当他是自己人，以至于借良妃丧礼大肆招摇这样的事，也要拉着他一起，许多私密的言论对他也不避讳。从雍正帝即位后的表现来看，他确实有一种极强的迷惑对手的能力，能够一边对着本人甜言蜜语，一边杀心暗起周密布置，等到对方发现自己处境危险时，事情已经没有转圜余地了。处于绝对强势的君主地位尚且如此，何况如履薄冰的皇子时代。档案显示，康熙五十年前后，年长皇子们随驾巡幸塞外，或是留京办事，都是分班而行，其中胤禛、允禟分在一班，出入同行，往来较他人更为频繁。可惜没有留下足够的史料，透露他们的交流模式。

康熙五十五年底，允禩得了重病。为了继续维持与允禩集团的老关系，胤禛先是着急赶回北京探望，却因此见疑于康熙帝，认为他是允禩一党。胤禛赶紧匡救弥缝，率先建议将病危的允禩挪回城里，为圣驾避道，由此又遭到允禟的激烈反对，责备他巴结父皇而不顾兄弟死活。这件事，大概是胤禛与允禩一伙渐行渐远的标志性事件。当然，渐行渐远并非不相往来，康熙五十七年十四阿哥出任大将军王以前，他还多次邀请这位亲弟弟到圆明园宴饮聚会。康熙末年的夺嫡形势错综复杂，胜负成败不过一线之间，竭力隐藏自己的野心，而与各方做好表面功夫，应

是胤禛最终得以成功的最大法宝。

康熙五十六年以后，随着青藏战争形势的发展，作为大将军候选人的允禵行情看涨，成为朝野瞩望的夺嫡热门。对此，远在福建的戴铎比他的主子胤禛还要焦虑热衷，在信中公然申请调到台湾任职，为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俨然连基本的政治正确也顾不上，做好一击不中就去当乱臣贼子的打算。还是胤禛知深浅、稳得住，晓得戴铎如此心热，不说几句狠话压服住，怕是要坏大事，遂痛斥道：“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你比骂我还利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不出胤禛所料，康熙五十七年，戴铎果然自作主张，替他去拉福建籍大学士李光地的票。其时李光地奉旨带病进京，有传闻是为立储之事，戴铎赶忙去探听，听李光地说“目下诸王，八王最贤”之后，就沉不住气了，对李光地大赞胤禛如何好处，并说“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除了巴结李光地外，戴铎还打听到三阿哥允祉从福建请了异能之士杨道升，十四阿哥对李光地门生陈万策“待以高座，呼以先生”等事，一一报告胤禛知道。对这些小道消息，胤禛大不以为意，批曰：“杨道升在三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尽知”；“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臭屁当香闻之理！”自信刻薄之态，一时透纸而出。

要论识人、用人，无论当皇帝前后，胤禛确实很有一套。对于允禩在争位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的做派，他非常不屑。像戴铎这样胆大妄为、自诩诸葛亮的搅屎棍子，放在允禩身边，很可能被奉为上宾，最终受其连累。而胤禛则能较早识破他大言欺人的马谡成色，对他提出的那些三流权谋很是鄙夷，虽然也难以抑止地流露求仙问卜的私意，但大多数批复都冠冕堂皇，少着痕迹。雍正帝即位后，戴铎这位“国士”不但没如愿当上督抚，甚至被加以种种罪名，问成死罪。

胤禛虽然看不上允禩这样漫天撒网，逮着一个算一个的笼络人心之法，但他也并非全然不笼络人。对于确实有力量、有才干的关键人物，他是一定要不动声色，极力拉拢的。比如原属太子一党的允祥，不知怎么就成了他的核心支持者。此外，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底“毙鹰事件”后，康熙帝和允禩彻底决裂了，允禩集团中的一些成员也意识到，在不谋逆的前提下，八阿哥本人入主东宫的路已经堵死了，另

择明主以求日后富贵，恐怕是更现实的选择。因此西北之役，很多人将宝押在十四阿哥允禵身上，连允禩、允禟也给予他相当的支持。但也有人并不这么认为，比如那位著名的九门提督隆科多。

隆科多是佟国维第三子、佟皇后的亲兄弟，也是康熙皇帝的表弟兼内弟，和皇家亲缘最近。隆科多自幼在宫中长大，成年后担任侍卫、銮仪卫使等亲近差使，对宫中的情况非常熟悉。一废太子时，隆科多和其父兄一样，也被斥为允禩一党，但受到的冲击不大，反而在康熙五十年被任命为步军统领，一直到康熙帝驾崩，始终担任此职。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在清代是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兼具北京卫戍司令和公安局局长的职责，并且负责为皇帝搜集京师范围内的重要情报。在风云诡谲的康熙末年，胜任这一职务的人，务必机敏、精细、有决断，而最重要的，是要对皇帝绝对忠诚。隆科多的前任托合齐，也曾是著名的能臣、宠臣，却因为二废太子前的聚饮案，落得个身死名裂、挫骨扬灰的下场。隆科多吸取他的教训，上任以后尽量和允禩一党的旧关系保持距离，让康熙帝很是满意，对他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康熙皇帝晚年恋旧，中枢重臣多老迈衰朽之人，隆科多身兼亲贵、年富力强，又颇具军政才干，成为康熙末年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但奇怪的是，康熙五十八年，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病故，康熙帝将岳父大人的一等公爵位搁置起来，一直不让隆科多承袭。这或许是康熙帝效法唐太宗贬抑英国公李勣，为新君施恩留有余地的举措。

从雍正即位以后，立即任命隆科多为一等公、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尊封隆科多之妹小佟贵妃为皇贵妃，又极力渲染自己作为佟皇后唯一养子的举动来看，他对隆科多的拉拢是不遗余力且有所准备的。而隆科多选择胤禛，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毕竟支持允禩或允禵的王公大臣很多，和隆科多地位相当的亦复不少，如果他们坐了皇位，隆科多本人得到的酬答，是远到不了现在这样丰厚的，很可能尚不及他的堂兄鄂伦岱。

另外，和允禩不同，胤禛在自己的小阵营里恩威并施，拥有极强的指挥协调能力。按道理，胤禛夺位的主要支持者如允祥、隆科多、年羹尧等人，原本不属于他的阵营，且都颇有才干而个性强势，想把他们统一“领导”起来，使其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环境里不怀首鼠两端之心，特别

是能在关键时刻为己所用，难度相当之大。

拿年羹尧来说，他本是肃王府支派贝勒延寿的属人，且是明珠孙婿，与允禩一党的主要成员来往频繁。年羹尧少年得志，二十出头中进士，三十岁就做了封疆大吏，在拨入雍亲王府属之前，已经成为康熙帝的宠臣和各派势力都看好的政治新星。康熙五十七年清廷出兵青藏后，年羹尧以大军后勤负责人的身份成为大将军王允禵的主要助手，若想另择明主，投靠允禵，简直有水到渠成之便捷。凭借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年羹尧并不会像戴铎等人那样，完全依赖名分上的门主雍亲王，有时甚至会表现出一些应付的态度，不甚恭敬。胤禛对此极为敏感，大动肝火，写信痛斥年羹尧，要求他务必摆正位置、端正心态，且命他将成年子侄送回北京，以作挟制之用。胤禛即位伊始，年羹尧遥为呼应，在遏制允禵，确保西北军权顺利交接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二人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性格行事也不合拍，以致没过几年就反目成仇，但能够在夺嫡的最关键时刻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其沟通之灵便、行事之默契、个体的执行力之强，即是允禩、允禵及其同道诸王勋贵们无法企及的（关于年羹尧与雍正帝之间的恩怨情仇，可以参见拙作《年羹尧之死》）。允禩集团成员如鄂伦岱等，虽然对允禩的忠诚指数明显高于年羹尧之于胤禛，但协调互动的水准实在落后太多，常常一哄而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总而言之，到康熙末年，储位虚悬，皇子中最有竞争力的只剩下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和皇十四子允禵。其中允禵立有大功，支持者最众，朝野呼声最高，但年纪轻、爵位低，又身在万里之外，对京中的突发事件鞭长莫及。允祉年纪长、爵位高，依序当立，但书生气重，政治手腕不足。胤禛排行不及允祉，但年纪、爵位都在第一序列，表面虽作“富贵闲人”之状，却在暗暗积蓄力量。至于最终鹿死谁手，还要有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

[1]明珠一家于康熙六年（1667年）退出内务府包衣佐领，被抬入满洲正黄旗。

[2]雅尔江阿等满文奏折，康熙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五，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4]《李文贞公年谱》卷下，康熙四十七年十月条。

[5]雅尔江阿等满文奏折，康熙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允祉等奏满文奏折，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宗人府等奏满文奏折，无年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宗人府等奏满文奏折，无年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一，康熙五十一年十月一日。

[10]《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七日。

[11]雅尔江阿等满文奏折，康熙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值得注意的是，“富尔敦，着交予其父马齐，拴九条铁索，于家中圈禁”一句，后来被康熙帝用朱笔删去，其寓意为何，不得而知。

[12]康熙二十八年，内务府为两位新封的嫔一级后宫派出内管领，即皇八子允禩生母卫氏与皇十三子允祥生母章佳氏。内务府《口奏绿头牌白头本档案》，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条。

[13]《绿头牌白本档案》，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缩微胶卷。

[14]内务府《奏销档》，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5]胤祉等满文奏折，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安双成译《宗扎布案满文译稿》，第14页，《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17]雅尔江阿等满文奏折，康熙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步军统领托合齐奏报大阿哥图谋不轨折，无年月，第1653页。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帝谕旨一纸，无年月，第1653页；步军统领托合齐奏请取缔报恩寺集市等事折，无年月，第1654页。

[20]郭琇满文奏折，原本未写时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著录为康熙五十三年正月。

[21]康熙帝满文朱谕，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2]允祉等满文奏折，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3]《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九十七，康熙六十一年五月九日。

[24]《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25]《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六十一，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6]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署理湖广总督傅敏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727、728页。

[27]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刑部尚书宗室佛格等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292—297页。

[28]内务府《奏销档案》，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条、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9]尹德满文奏折，雍正四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0]内务府《口奏绿头牌白头本档案》，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初九日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1]《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一册，雍正四年正月初三日。

[32]《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

[33]《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

[34]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初二事。

[35]允祉等满文奏折，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6]《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37]《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康熙帝去世的那一天

上

夺嫡诸王的情况各自交代完毕后，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康熙到底将谁确立为继承人？康熙到底是用什么形式确定继承人的？

对于这两个问题，各方说法不一，我们先来看看反方。雍正帝即位后，火速清理反对派核心成员，三四年之内，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诸皇子都失去人身自由。雍正四年，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于数日之内先后死于囚禁之所，他们身边的太监、侍从等均被发配广西烟瘴之地。在发配路上，这些人向沿途百姓传播宫廷秘闻，从失败者的角度讲述雍正帝如何先弑父夺位，再屠戮兄弟。

湖南大山里一位单纯到有点可笑的小知识分子曾静就是通过这一渠道，听说了当今天子的“十大罪状”。当然，他本身就有比较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不承认清朝政权的合法性，这下又抓住了一个大把柄，仿佛看到推翻清朝政权的曙光。于是曾静派弟子张熙千里迢迢前往西安，劝说抗金英雄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当时的统兵汉将、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雍正帝为此亲自撰写了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开启了皇帝亲自做政治学、民族学、思想史、法理学等跨学科研究，皇帝亲自撰写对话录式学术专著，先皇著作在亲儿子即位后成为禁书等多个历史先河。

关于康熙之死，曾静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圣祖皇帝要传位给允禵，病重时，下令将允禵从甘肃召回，但圣旨被隆科多隐匿；圣祖驾崩时，隆科多矫诏立当今的雍正皇帝为帝。曾静案爆发后，湖南、广西等地督抚又再次寻访，发现流言的版本还有很多，比如：“圣祖原本要传位十四阿哥，今上皇帝将十改为于，就变成传位四阿哥了。”“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今上皇帝给圣祖进了一碗（毒）参汤，圣祖皇帝就驾崩

了。”“今上即位，将允禵召回囚禁，太后盛怒，撞柱而死。”事实上，这些言论自雍正即位后，就没有断过，只是此前多在京畿地区传播，随着落败诸皇子的太监、侍从被发配，才流传到大江南北，甚至僻远山乡的。直到现在，送毒参汤、改十为于，都是清宫小说、影视剧喜闻乐见的重要素材，想必读者、观众都久有耳闻了。

对于反对派这样的说法，雍正皇帝本人当然不予承认，一概斥之为诽谤诋毁。从当时的宫廷生活、谕旨写法来看，毒参汤、改十为于，可操作性不强，但很适合民间传播，所以影响深远。那么在“圣祖升遐之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当事人的范围极小，又涉及宫闱最高机密，所以外人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皇帝自己的说法，就是小道消息，几乎不可能有客观明白的第三方记述。小道消息中饱含失败者的怨愤和民众口口相传的戏剧化色彩，难免失真。那么皇帝的说法呢？如果皇帝自己的说法纯粹以官方公告的形式出现，一以贯之、铁板一块，当然也没什么看头。但幸好，雍正皇帝是个好辩的话唠，他不能接受任何对自己即位合法性的质疑，也不愿意使用强行封口这样简单粗暴的手段一禁了之。于是，在和反对者的论战中，他一次又一次提到那一天的情形，又因为时间间隔较长，针对的人、事侧重点有所不同，而难免言多语失，前后对不上茬。这正是后世研究者在原始史料被销毁、篡改的情况下，发现漏洞的最好机会。

雍正帝第一次系统讲述康熙去世当天的事情是在雍正六年十一月，当时曾静案发，岳钟琪把所谓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一股脑奏报上来，雍正皇帝怒不可遏，写下长篇大论的谕旨，针对“十大罪状”逐一反驳，这篇谕旨后来被收入《大义觉迷录》中。其中“谋父”一条，当然是针对康熙驾崩时的情势而言，是以雍正帝辩白说：

>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公允裪、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

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贝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郡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贴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除了这篇“谋父辩”外，清朝官修的逐日记录一朝大事的康熙、雍正两朝《实录》，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圣祖升遐之日”的叙述问题。我们先来看康熙《实录》的记载：

甲午（十三日）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着派公吴尔占恭代。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䄉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

雍正帝即位以后，因循旧制，开始编纂康熙朝《实录》，到雍正十年二月告成。与清代历朝《实录》相比，康熙《实录》纪事简、篇幅小、编纂时间长，对原始档案、文件的删改幅度大，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雍正皇帝刻意为之的结果。当然，其中一个最重要目的，无外乎掩盖康熙中后期皇子夺嫡中的部分事实，维护他的个人形象。“圣祖升遐之日”的记述，是关键中的关键，一定经过雍正帝本人反复修改确认，才能作为定稿流传。因为其定稿时间在雍正八年五月以后，[1]就一定会参照雍正六年十一月谕旨的说法，不能有明显的矛盾。所以我们看到，这段

文字和雍正六年十一月谕旨上的说法大体是吻合的，只有三处小差异。

第一，增加了时间点的记述：康熙帝病危，急召胤禛赴园的时间是丑刻，即夜里凌晨一点到三点；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听口传遗命的时间是寅刻，即凌晨三点到五点；胤禛到寝宫的时间是巳刻，即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康熙帝驾崩的时间是戌刻，即晚上七点到九点。第二，可能是出于行文从简的缘故，删去了关于四位年轻皇子在宫外等候，以及康熙帝驾崩后诸事的记载。第三，增加了胤禛到寝宫后，曾经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的记载。

我们再来看雍正《实录》对于这一天的记载。雍正《实录》告成于乾隆六年十二月，距离康熙帝去世已经相隔近二十年，亲历者大多已经故去，说法当然也以因循曾静案谕旨和康熙《实录》为主。但与以上两文本不同的是，雍正《实录》增加了康熙帝去世后，雍正帝对在场人员的任务分配情况。雍正《实录》记载：

> 甲午（十三日），圣祖仁皇帝宾天。先是，十月癸酉，圣祖自畅春园幸南苑行围，遂驻跸南苑。至是月戊子，圣躬不豫，因回驻畅春园。庚寅，以冬至届期，将大祀于南郊，命上恭代行礼。谕曰：“郊祀上帝，朕躬不能亲往，特命尔恭代。斋戒大典，必须诚敬严恪，尔为朕虔诚展祀可也。”上遵旨于斋所致斋，敬念圣躬，孝思笃切，每日三次遣护卫等恭请圣安。至甲午丑刻，圣祖疾大渐，遣官驰召上于斋所，且令速至。随召诚亲王允祉、淳郡王允祐、多罗贝勒允禩、固山贝子允禟、敦郡王允䄉、固山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登基，即皇帝位。”上闻召驰至，趋进寝宫，圣祖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上问安进见五次。戌刻，圣祖宾天，上哀痛号呼，擗踊不已。尚书隆科多进曰：“大行皇帝深惟大计，付授鸿基，宜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上恸哭仆地，良久乃起，趋至御榻前抚足大恸，亲为圣祖更衣，遵用孝庄文皇后制赐御服。上皆敬加于首，然后进御。时诸王大臣恭议殡殓大礼，宜奉大行皇帝还宫。于是命淳郡王允祐守卫畅春园，固山贝子允祹至乾清宫敷设几筵，十六阿哥允禄、世子弘昇肃护宫禁。十三阿哥允

祥、尚书隆科多备仪卫、清御道。上亲安奉大行皇帝于黄舆，攀依号哭，欲徒步扶辇随行。诸王大臣以大行皇帝付托至重，神器攸归，当此深夜，执事繁杂，请上前导以行。上乃前导，哭不停声。至隆宗门，跪接黄舆，亲扶而入，安奉大行皇帝于乾清宫。

这段记载把康熙《实录》中的胤禛受召和抵达寝宫的两个时间点删去，又把他三次面见康熙帝问安，改为五次。前者或许是行文方便，后者或许是抄写错误，但另有别故也未可知。

以上三处，是清代官方对于康熙去世当天情况的系统描述，这三段文字描述的主要信息有：

第一，康熙在临死前几天就已经感到身体严重不适，且无隐匿病情的举动，皇子、重臣、近侍们心里对他的去世是有一定准备的。在离世前的最后一天，康熙帝神志比较清醒，还能亲自下命令、和人说话，在这样的状态下去世，大概不能算是暴毙。

第二，康熙帝去世当天，大多数皇子都在畅春园附近居住，但胤禛因为在斋戒以备祭天，所以住在南郊天坛，离畅春园较远。胤禛抵达畅春园时，康熙帝已经向先到的其他皇子和隆科多说过继承人人选的事，此后却没有告诉他本人。康熙帝驾崩后，隆科多才向胤禛告知他是钦定的即位人选，建议他“先定大事，方可办理一切丧仪”，胤禛“闻之惊恸，昏仆于地”或是“恸哭仆地，良久乃起”。总之，情绪非常激动。

第三，胤禛尚未赶到畅春园时，亲耳聆听康熙帝传位谕旨的是三阿哥允祉、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十三阿哥允祥这七位年纪较长的皇子，以及异姓大臣、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当然不排除现场还有一些服侍病重皇帝的太监、宫女、医生或是其他人，因为没有实质作用，就不必赘述。而十五阿哥允禑、十六阿哥允禄、十七阿哥允礼、二十阿哥允祎，这四位年纪较轻的皇子虽然也在畅春园，但没能进入寝宫，是在寝宫外面等候。

第四，七位皇子和隆科多聆听的“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这句话，是以口谕的形式传达的，而无满汉

文本。雍正帝在元年秘密立储时也提到，康熙帝选择继承人，是“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当然，如果是口头传达，一定不会说得这么文绉绉，文字转述的只是个大致意思。

第五，新君确立后，诸皇子服帖叩首无异词，随后大家强忍悲痛，开始商量办理后续事宜，现场氛围比较和谐默契。

仅从以上文字来看，其实已经出现了四个逻辑、情理上的疑点。

首先，就算康熙帝此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大限在即，不想立储，那么在“症候日增”且神志比较清楚的这几天，为什么不抓紧写一份纸本的传位谕旨？就算力不能支，也可以像顺治、咸丰等皇帝那样，令亲信大臣在多人监督下执笔写就。像这样临死前口传遗命，不是风险太大了吗？

其次，按照康熙《实录》的说法，康熙皇帝在十三日丑时病危，急召在天坛斋戒的雍亲王。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简化为“下旨遣使——使者驰赴天坛——雍亲王接受命令，做简单交代——雍亲王速赴畅春园”，那么以畅春园到天坛二十来公里的距离，以使者骑马、雍亲王乘马车，均不行经内城计算，前后所用时间大致也能控制在四个小时之内。然而在《实录》的记述中，雍亲王直到上午巳时才到达寝宫见到康熙，耗时七八个小时，实在有些无法想象。难道他听说父皇病危这样的塌天大事，还坐着大轿摆谱，或迈着八字步遛弯儿吗？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康熙在当时实际是处在昏迷抢救状态，雍亲王就算早已赶到，也不能马上得到接见。可是，一个昏迷的危重病人，又如何清晰地向七位皇子和隆科多传达继承人是谁这样的重大信息呢？病危之人的喃喃呓语，能让心思各异的皇子们达成共识吗？

第三，康熙帝病危后，先告诉七位年长皇子和隆科多令胤禛即位一事，但胤禛到寝宫后，三次或是五次进内面见康熙皇帝，自然也见过待在寝宫内外的其他知情者，比如与他亲近的允祥、隆科多等人。但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所有人，竟都不告诉他即位大事，直到康熙帝驾崩之后，才由隆科多转告，令他“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不知是何道理？

第四，隆科多作为唯一异姓大臣聆听遗命，还在康熙帝去世后独自

向新君传达遗旨，未免太不合理。从亲缘上说，隆科多是佟皇后的亲兄弟、诸皇子的嫡母舅，由舅舅主持分家，这在皇家、民间都是普遍做法，无可厚非。但康熙帝的皇后有三位，赫舍里家族败落可以不论，仅第二任钮祜禄氏家族、第三任佟氏家族，能称得上“国舅”身份的尚有多人，怎么单就隆科多在此？再从职务上说，隆科多身兼文、武二职，文职是理藩院尚书，列在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之后；武职是步军统领，列在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之后。且隆科多此际并未袭爵，若以爵、秩通论，排在他前面的贵戚、文武大臣，人数着实不少。当然，康熙后期已经出现了御前大臣的雏形，即由皇帝特别亲信的王公大臣入值内廷，领导御前侍卫，贴身负责皇帝的个人安全，并与之商讨重要政务，只是尚未形成制度，人员也不确定。以隆科多的才干，以及和皇帝亲近的私人关系，他或许在康熙末年已经担当了御前大臣的职任（只是没有列作头衔），所以能够较自由地进入寝宫，出现在病危的老皇帝身边，而且由他传出的遗命，也显得较为可信。

不过无论如何，历代帝王颁末命时，除皇子外，都要安排多位大臣在场作为见证，互相牵制。顺治帝同样是临终立嗣，承旨者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学士麻勒吉二文臣，且有满有汉。雍正帝临终前，召见了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等七名亲王、满汉大臣，宣布新君人选。更有名的，当然是咸丰病重时的八大臣同承末命。政权交替的重要时刻，有多位重臣在场见证，既是君权授受正大光明的表现，也是对受命大臣本人的保护。康熙帝通晓历史，在提到立储问题时曾说：“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话说得如此明白，病重时却以隆科多一人独承末命，岂非自食其言？至于官方叙述中只称隆科多为“理藩院尚书”或“尚书”，而不提及他“步军统领”的职任，当有回避其执掌兵权之意。

第五，按照雍正《实录》的记载，新君为大行皇帝更衣后，和诸王一起讨论了后续丧仪，分工的结果是：允祐留守畅春园，允禌到乾清宫备办祭祀事宜，允禄和允祺的长子弘昇负责紫禁城的清理护卫，允祥和隆科多负责安排圣驾回城的随扈，以及沿途道路的肃清。新君本来要尽

孝子之道，扶棺而行，但被众人以“当此深夜，执事繁杂”为由劝止了，改为“前导以行”，和护送灵柩的大部队分开，先行入宫。至于允祉、允祺、允禟、允□这四个与新君具有竞争关系的皇子，所膺职事为何则不可知。

下

除了“谋父辩”和两《实录》的系统记述外，雍正帝还零散谈过康熙帝驾崩当天的情形，这些脱口而出的只言片语，都与“谋父辩”、两《实录》的叙述逻辑产生严重矛盾。

首先是诸皇子的表现。雍正四年夏天，为了给允禩、允禟两人凑罪名，雍正帝披露出他们在康熙帝驾崩当日的恶劣举动，即“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皇考升遐之日，朕正在哀痛之际，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傲慢而坐，意甚叵测。”可见圣祖宾天、新君即位的当口，并不是什么诸皇子“贴无一语，俯首臣伏”，至少有两个人不服不忿，乃至“意甚叵测”。

还有两个与官方系统记载有大矛盾的说法出现在雍正八年五月，当时怡亲王允祥刚刚去世，雍正帝精神恍惚，大量吐露心声。其中，在五月初九日追思回忆允祥的长篇上谕中，雍正帝提到一件旧事，他说：

> 又如果亲王在皇考时，朕不知其居心，闻其亦被阿其那等引诱入党。即朕御极后，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殡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皇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等语。朕闻之甚为疑讶，是以差往陵上暂住以远之。怡亲王在朕前极称果亲王居心端方，乃忠君亲上、深明大义之人，力为保奏。朕因王言，特加任用。果亲王之平和历练、临事通达虽不及怡亲王，而公忠为国、诚敬不欺之忱，皎然可对天日。是朕之信用果亲王，实赖王之陈奏也。似此密陈补助，为廷臣所不知者甚多。[2]

果亲王即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这一年二十五岁。这段文字中提到，圣祖宾天之日，允礼在宫内值班，这已经和“谋父辩”中所说的，允礼等四位年轻皇子在畅春园寝宫外等候，互相矛盾了。我们姑且认为“谋

父辩”中那些不太重要皇子的位置，雍正帝可能记忆不确，或是笔误多写了一个人，可以暂不深究，仅分析允礼确实是在宫中值班的情况。

所谓“闻大事出”，当然是听说康熙帝驾崩之事，随后本该值班的允礼惊慌失措，居然擅离职守跑出宫来，想必是要到畅春园去，却在西直门大街遇到隆科多。雍正《实录》中提到，允祥和隆科多的分工是“备仪卫、清御道”，隆科多作为掌管京师治安的步军统领，更侧重“清御道”，即负责沿途警戒之事的可能性较大。那么他比雍正帝提前一段时间回到城里，进城后遇到允礼的说法也就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当他告诉允礼即位的是雍亲王胤禛时，允礼非常恐慌——神色乖张，有类疯狂，并且既不在途中迎驾，也不回到宫中继续履行值班的岗位要求，竟然兀自跑回家去了。从雍正年间的表现来看，允礼办事精干，并不是个不懂章法礼数的糊涂人，在这一关键时刻表现得如此反常，只能有一个解释：他对父皇驾崩、四兄即位的消息太震惊了！然而如果按照“谋父辩”或两朝《实录》的说法，康熙帝“不豫”已经多日，去世当天的弥留状态也持续了将近二十个小时，以允礼的知识、能力和宫中值班所能获取的信息，他对父皇的驾崩，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和应对预案的，如此张皇的原因，恐怕更多不在老皇驾崩，而在新君人选。当然，对他的这个反常举动，回城后的雍正帝也没有客气，直接“差往陵上暂住以远之”，眼看就要打入另册。

第二件事发生在允祥去世三天以后的五月十二日，庄亲王允禄等主持丧事的人向雍正帝奏陈，说诚亲王允祉在允祥的丧礼上迟到早退，面无伤悼之情，引起雍正帝的雷霆震怒，他全然不顾及允祉是自己的兄长，在群臣面前对其破口大骂，其中又提到了康熙驾崩当天的事。他说：

> 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3]

如果以此论之，圣祖驾崩当天，允祉、允禩两个胤禛的重要竞争对手，又似被委任了很重要的任务，而为《实录》所隐晦。而允祉私自外出与允禩“密语”的行为，也被视为二人“党助”的表现，与“谋父辩”中允祉带头臣服的形象截然相反。

与深思熟虑、精心撰写的“谋父辩”和《实录》记述相比，这两段没头没脑的描述可信性更强。先说允礼夜奔西直门一段。

首先，允礼在康熙年间表现并不起眼，却是雍正朝后起的重要人物。前面提到，允礼是八王党核心成员阿灵阿的女婿，所以被胤禛默认为八王党成员，经允祥作保，免于被隔离清算。因为背景有“瑕疵”，允礼在雍正年间的表现就显得尤为激进，多次充当雍正帝打击反对派的急先锋，以此邀宠，获封亲王，允祥去世后，更成为权势最重的皇弟。所以他这段西直门夜奔的经历，虽然出自隆科多的小报告，但不会是凭空诬陷，否则早就在雍正五年被算作隆科多的罪状之一了——诬告过当红的皇弟，那还了得！

第二，这篇上谕的写作背景特殊。当时允祥刚刚去世，雍正帝自己亦在重病之中，连续多日亲临丧礼，不免神思恍惚。那段时间，雍正帝经常日作数千言怀念允祥，之所以把这段对允礼而言很不体面的旧事公之于众，绝没有揭允礼老底、令他难堪的用意，只是单纯为了突出允祥“密陈补助，为廷臣所不知”的功绩。这样未加修饰，甚至忽略了打击面的肺腑之言，忘了统一口径，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这是一篇很长的上谕，其中一部分被收入雍正《实录》，另一部分被删削，仅存于《起居注》中。允礼西直门夜奔一段，就在删削之列，可见其自有忌讳之处，不能为更多人知晓。

再说允祉一段。除了被圈禁的允禔、允礽之外，允祉作为最年长的皇子，在圣祖驾崩当日，一定是众目瞩望，不会毫无作为的。他和允禩等人本来关系一般，“党助”恐怕谈不上。但结合允禩“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的罪状，允祉不避嫌疑主动出来与他“密语”，或许是以兄长的身份，对他进行安抚、劝慰，要他“认命”，别做出难以收拾的事情；或许是商量后续的权力分配和互保策略，引出允禩保举允祉“可以大用”的说法。至于他

后来“天夺其魄”，自己向雍正帝“交代”，则是允禩获罪前后以邻为壑的自保行为，也反向证明了雍正帝的竞争对手们，当天夜里是隐而未发，而非俯首听命的。

除了诸皇子的动向有前后矛盾之处外，关键人物隆科多在那一天的行动也存在问题。雍正五年十月，群臣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参奏隆科多大罪四十一款，其中有“欺罔罪”一款，罪名是：“圣祖仁皇帝升遐之日，隆科多并未在御前，亦未派出近御之人，乃诡称伊身曾带匕首，以防不测。”所谓隆科多“未在御前”指代不明，可以是就康熙皇帝而言，也可以是指雍正皇帝。如系康熙皇帝，那简直就是颠覆性的说法，但通观全文，又不大像。因为隆科多的另一条“欺罔”之罪，就是“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此外，针对群臣对隆科多的拟罪，雍正皇帝紧跟着提出：“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重罪，实不容诛。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同一件事情上矛盾若此，未免过于糊涂轻率，不似雍正皇帝的行事风格。

如果“御”字是指雍正皇帝而言，这个罪名的可理解度就稍强一些，可以解释为：“隆科多当日未亲自，或是派人担负雍亲王的保卫工作，但假称随身带了匕首以保护雍亲王，以防有人当场作乱。”结合“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二罪，就是说隆科多在雍正改元以后，为了突出个人地位，特意把自己在“圣祖升遐”之日的作用说得大而神秘，是面承先帝遗诏与拥兵护卫新君，两项最重要的任务一肩挑。但雍正帝本人只认可前者一项，对后者不予承认，因为如果后者也成立的话，那雍正帝在“圣祖升遐之日”，简直可以说是靠刀把子武装夺权，合法性自然一塌糊涂。可惜，现在我们只能看到雍正帝的一家之言，而无法了解隆科多对自己的辩护，所以他究竟是“狂言”“诡称”以夸大影响，还是确实处在了这样至为关键的地位，甚至能突破宫廷禁卫的底线，在皇帝寝宫携带匕首，准备“一呼可聚二万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说了这么多，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雍正皇帝的即位并非像他所描述的那样顺理成章，他的表述里有太多漏洞可以供人指摘。许曾重、杨珍等学者，都曾质疑雍正帝关于七位皇子和隆科多聆听遗命

的真实性，认为七位皇子并没有在康熙帝死前亲耳听到传位雍亲王的旨意，康熙皇帝病危时很可能已经神志不清，丧失正常的语言功能，所有信息都是康熙帝死后从隆科多一个人口中转述出来的，而隆科多事前已与雍亲王串通，真正做到了“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谋父辩”发布时，八人中的允禩、允禟、允䄉、隆科多四人已经死的死、关的关，失去了话语权；允祉、允祐噤若寒蝉，不敢多言；允祥是雍正即位的重要受益者，也不会泄密，是以雍正帝无所顾忌，敢于公然说谎。当然，杨珍女史的说法，也是猜测，康熙皇帝驾崩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没有直接材料，无法重现其场景。但可以肯定的是：

第一，胤禛从雍亲王变成大清王朝的新君，并非顺理成章、众望所归，相反，是让很多人诧异，也让很多人不服气的。这些表现都是公然的，不加掩饰的，前者比如惊闻其信，落荒回府的十七阿哥允礼；后者比如箕踞于前，傲慢挑衅的九阿哥允禟。但这些震惊与不满，都很快被压制住了，没有转化为更激烈的对抗与冲突，更没有动武。

第二，胤禛即位的合法性弱。他既非乃父生前所立的太子，又无御笔亲书、多名中立大臣见证的遗诏。即便真如他自己所说，有口头的遗嘱传达给七位皇子与隆科多，也是发生在康熙皇帝病情垂危、气力衰竭之际。此时康熙的神志是否清晰、表达是否确切，聆听者和传话者的居心是否公正，都存在很大疑问。之前多次有媒体报道，在一些档案馆里发现了康熙传位雍正的诏书云云，证明雍正确系正常即位。实际上，这些所谓“传位诏书”，都是雍正帝即位以后，针对康熙去世事件对外公开发布的“新闻通稿”，总结先帝一生的功业，最后提到传位之事。既然是雍正即位后代父所拟，毫无疑问要写传位给自己，否则真是时空错乱了。

第三，老主驾崩、新君即位的过程，是胤禛事前主动参与谋划过的，而非被动接受。尤其是在争取隆科多的支持，并使这位掌握军权的国舅不合常理地成为唯一承旨异姓大臣的问题上，一定用力颇多。他即位之初那些缜密圆熟的人事安排，雷厉风行的政治手段，想必也已经在脑海中酝酿过多时，绝不是乍逢大变的临时决策。

第四，雍正帝即位后，屡屡在皇位合法性问题上受到质疑，甚至被

政敌说成谋父篡位、天地不容的无道昏君，这给他的统治造成了很大麻烦。他一方面通过标榜孝顺、勤政敬事挽回形象，一方面在即位的问题上极力辩驳，不惜和一个山野秀才对簿朝堂。然而辩驳，就得顺着对方的逻辑去辩，如果事实本身不是那样清楚明白，加上天长日久、记忆不确，就很容易前后矛盾、言多语失。对于这类高度敏感的问题，无论是怎样亲近的重臣，也很难给他提出实质性意见，只好由着他自己辩去。

当然，即位没有明确的说法，并不等于就是篡位，也可能是充分准备下的捡漏成功。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下一节继续分析。

[1]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去世。十五日，雍正帝下旨："凡告庙典礼所关有书王名之处，仍用原名，以志朕思念弗释之意。"康熙《实录》提到其人，有作胤祥之处（胤字缺一撇），亦有作允祥之处，或可以雍正八年五月为界，分别《实录》不同内容的定稿时间。《实录》所记康熙驾崩之日，诸皇子名上"胤"字俱作"允"，唯十三阿哥作"胤祥"，可知定稿当在雍正八年五月十五日以后。

[2]《雍正朝起居注册》第5册，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

[3]《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5册（上谕底册），第96页。

一代英主的立储拖延症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熙皇帝去世前储位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间段内，康熙帝诸子中还具有储位竞争力的主要有三个人：皇三子允祉、皇十四子允禵和皇四子胤禛。其中允祉爵位最高、年纪最长，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依次当立”，不过他虽然有争立之心，却有口钝之疾，且在朝中没有争取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支持力量，除了陈梦雷找了些异能术士在家求神问卜之外，其他的政治准备似乎不足。也就是说，在康熙病危之际，就算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没有得力支持者的允祉，也难以抓住机会“捡漏”成功。

十四阿哥允禵的功劳最大，呼声最高，他是八王党的后起之秀，是康熙帝晚年宠爱重用的年轻儿子，只是排行、爵位还处于劣势。他继承了允禩集团大部分的人脉资源，用朝鲜人的夸张说法叫作“军民皆属心于十四王”。如果康熙帝再多活几年，特别是活到允禵兵锋所指，直下乌鲁木齐的日子，那他即位的可能性无疑是最大的。但仅就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突发事件而言，远处边地的允禵不可能对京城发生的事做出迅速反应，虽然有允禩、允禟等兄长作为代理人，但与本人在场毕竟有本质差别。一旦陷入破釜沉舟才能取胜的局面，允禩等人肯定不会为了帮他登上皇位而孤注一掷，承担作为国家叛逆的风险。

四阿哥胤禛爵位尊崇，排行虽较允祉稍欠，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畴。一废太子后，他从未在政治上犯过错误，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他本是八王一党的近邻，或干脆可说是其边缘人物，即便渐生自立之心，也仍然依违其间，若即若离。如果说允禵获得了允禩集团的大部分政治资源，那么胤禛则获得了允禩集团的最重要政治资源——亲贵两兼、手握兵权的国舅隆科多。此外，胤禛又和前太子党的代表人物允祥兵合一处，默默积蓄力量，更在康熙帝病危离世的关键时刻抓住机会，打了允祉、允禩等人一个措手不及。

在三选一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先则捡漏成功、和平过渡，后则备受

质疑、疲于自洽。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他身上，而是出在康熙皇帝身上。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文治武功，可圈可点。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在对待政权交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似乎放弃了自己作为君主、父亲的责任，选择了最消极的处理方式——拖延。

康熙帝是个孤儿，八九岁就父母双亡，所以特别重视亲情，对自己的兄弟子侄、宗亲外戚，无不宽容厚待。虽然他熟悉中国历史，也知道至高无上的皇位激起过无数手足相残、萧墙祸起，但他自己的亲兄弟都是缺乏能力和野心之人，让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与经历。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于皇子们的夺位之争预估不足、处理失策，还是情有可原的。

在储位问题上，康熙帝二十二岁立太子，五十五岁一废太子，五十六岁再立太子，五十九岁再废太子，反复折腾、备受折磨，以致心力交瘁、多病倦勤。毕竟，这不是与外敌的军事斗争，不是与反对势力的政治较量，而是父子兄弟之间的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康熙帝在“帐殿夜警”事件被揭穿时，痛哭昏倒，当着群臣的面狠抽自己的双颊，可以想见，对一个至高无上、所向披靡的皇帝来说，这是一种何等程度的心理崩溃。一废太子前，他面对的是太子党的暴躁不安、蠢蠢欲动；而一废太子后，更糟糕的情形摆在他面前，众皇子间的群雄逐鹿、喊打喊杀，宗亲贵戚、满朝文武的结党串联、各怀鬼胎，都让他极度缺乏安全感。他甚至几次公开表示自己有无法善终之虞，所谓“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

康熙二废太子后，储位再次虚悬，朝中人心浮动，多有立储之议。比如康熙五十二年初，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以固国本；同年七月，福建巡抚满保上折请立；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大学士王掞请立；同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公疏请立；康熙五十七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保奏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同月，大学士、九卿等就王掞之议覆奏，请立太子；康熙六十年三月，王掞以康熙帝即位六十年庆典为词，再提建储之事，并请放出废太子，随后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联衔入奏，要求早定储位；此外，康熙帝还提到过，李光地等亲近大臣也向他私下建议，早立太子为是。请立者大多为汉人，满保、朱天保虽为满人，却是进士、翰林出身，是满人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批。他们深受汉族王朝“储

君不可一日或缺”观念的影响，对立储的要求是很迫切的。

这些人中，朱天保因为明确建议恢复废太子允礽的储位，而引起康熙帝的激烈反应，下旨将其处死；王掞在第二次建议立储时，提出要将废太子释放，也惹得康熙帝大发雷霆，将其子王奕清发配军前。杀人固然过于残暴，但康熙帝的抵触情绪倒也可以理解，凡事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性格要强些的普通人，尚且有不能触碰的自尊心，何况当了五六十年皇帝的人。

那么不立允礽，立其他皇子行不行呢？在康熙帝看来好像也不大行得通。康熙末年，诸皇子的矛盾已经彻底公开化了，一废太子后的“民主推荐”活动，也撕裂了皇帝本人和朝中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要不是康熙帝在位时间长，本身的威信和独裁程度确实很高，这种表面的和谐都很难继续维持下去。如果这时候别开局面，立一新太子，太子是允禩一党，则老皇帝被架空夺权；不是允禩一党，则新太子仍然要面对兄弟群臣虎视眈眈的局面，弄不好就会重蹈允礽的覆辙。有鉴于此，晚年的康熙帝，对再次公开立太子之事是比较抵触的，他算是看透了，汉族王朝那套立嫡立长、备位青宫的规矩，在满洲人的世界里，不大行得通。

康熙五十六年冬，针对王掞等人的建储提议，康熙帝再次就立储问题向诸皇子、满汉重臣征询意见，甚至把李光地从大老远的福建叫到北京。按照常理，既然再一次郑重提到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本人心里至少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但他似乎仍然按照一废太子后公开推举新太子的办法，要其他人先发表意见。雍正年间，允禟所获二十八款大罪中的第二款提到此事，说“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塞思黑陈奏之语背谬，圣祖仁皇帝面加切责。是夜三鼓时，圣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愤怒，中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即畏惧称病”。允禟有何背谬之处，罪名中并未提及，但无外乎与康熙帝所见不同罢了。或许是像允禟这样的异见者太多，难以达成共识，康熙帝最终没有向群臣透露自己预想的储君人选，或是立储方案。

不过，没有结论，不代表没有态度。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满汉重臣，进行了一次“面谕”，即所谓的“豫立遗诏”。面谕的话说得很重，以至于康熙帝下令将全文颁诏天下

时，大学士马齐、李光地等人不敢从命，先“乞请留中”，又“乞皇上裁去数语，以安臣民之心”。面谕的文字版最终没有公开颁布，但其中的一些内容，成为康熙帝“大行皇帝遗诏”的组成部分，在康熙帝驾崩后由雍正帝颁行天下。此外，康熙《实录》也收入了这次“面谕”的部分文字，虽然一定经过了删改、雕琢，但毕竟还能呈现出康熙帝本人的一些想法。

按照《实录》所载，康熙帝从满洲开国讲到自己兢兢业业的五十七年帝王生涯，坦言自己从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起，体力、精力就渐不及往日，近来更是身体虚惫，步履难行，而且怔忡健忘，心神恍惚，很怕哪一天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因为自己的缘故导致大清王朝的败坏乃至覆灭。他提到梁武帝、隋文帝、宋太祖这几位一世英明，但因为“辨之不早”，而不能善终的君主；又感慨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是“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的败笔。他说：现在大臣们建议朕确立储君，让储君为朕分理政务，是怕朕哪天有“猝然之变”，这是不需要讳言的。然而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所谓“分理”万不可行。但是神器至重，如果能够所托得人，朕也愿意优游安适，就是像宋高宗那样退位做个太上皇，也未可知。总之，只要是“终于无事”，就很满足了。你们这些做臣子的，念在朕是五十多年太平天子，又反复叮咛的份上，一定要让朕享“考终命”之福啊！这是朕准备了十年的肺腑之言，如果以后有所谓的遗诏，那这就是了。

这篇“面谕”说得极为恳切、伤感，说到最后，甚至颇有哀求之意。虽然经过《实录》纂修者的润色、删改，康熙帝当时的悲愤之情，仍旧跃然纸上。对于自己的衰老多病，康熙帝是焦虑痛苦的，但更让他恐惧的是自己英雄一世不能善终，甚至由此导致祖宗创立的大清王朝“万事隳坏”。那么怎样才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呢？当然是选择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尤其要吸取历史教训，慎重从容，及早分辨，不能受到个别权臣的胁迫，也不能出于“仓卒之际”。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谋父辩”中描述的临死前一言而定大计，以及由隆科多一个异姓大臣聆听、传达遗命，就显然违背了康熙帝的本来意志和既定方针。雍正帝后来颁布的，以“面谕”为蓝本的“大行皇帝遗诏”，特地将“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

肯容此辈乎”一句删去，自然也意识到个中的矛盾之处。

说到这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在此时的康熙帝心里，君、储已经不能并存了，“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并存即是“分理”，就一定会造成此前自己与太子允礽那样互相猜忌的局面。所以，一旦找到合适的继承人选，他就要把权力完全交给储君，学宋高宗去做太上皇了。可是，对于一个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掌握了五十年最高权力的雄主而言，难道会因为体弱多病，而心安理得地舍弃皇位和皇权去“优游安适”吗？漫说是皇帝，有几个名利场中的豪杰，能做到不嗜权恋栈，主动退隐的呢？他所举的宋高宗，就是个退而不休的典型。所以，这篇整体呈现惨淡基调的面谕，背后却透露出一个强势的信息：皇帝在位一天，就不立太子。至于“立了太子，皇帝退位”一说，听听而已，万万当不得真。

那么既要做到皇帝掌权时不立太子，避免君、储分庭抗礼，又要达到从容择储，不决大事于仓促之际的目标，什么办法最好呢？难道要向后退一步，恢复入关前的帝位（汗位）推举制吗？康熙五十二年，针对左都御史赵申乔请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曾提道：“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既然公开提到太祖、太宗旧制，想来康熙皇帝的心里，未必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但退回老路的前提，是皇帝在生前放弃择储的主动权，恢复满洲的部落军事民主旧制，但在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的康熙年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八旗上层的权力格局，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早就不是草创肇基、强敌环伺时的样子了，一旦出现最高权力真空，当朝皇子、五旗诸王，以及外戚勋贵，谁有资格参与推举，每个人的权力如何界定，都是难解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使大清王朝“万事隳坏”。

说来说去，雍正帝即位后给出的“秘密立储”方案，或许是兼顾康熙皇帝几重考量的最佳选择。可康熙帝本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好？还是没有来得及？没有明确的证据，是很难讲的。

不过，有个反例似乎可以做出一些解释。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将立储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当时的雍正帝只有四十五岁，身体也很健康。他在世

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一向不被父亲喜欢，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宣誓，并不在于确立储君本身，而在于另外两点。第一，当然是确立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就像康熙皇帝面对三藩之乱，马上立两岁的允礽为皇太子一样；第二，是“以备不虞”，也就是吸取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教训，早早把秘密立储的事让“诸王大臣咸宜知之”，公开的才是安全的，省得下一代野心家也浑水摸鱼，趁乱捡漏。在立储形式已经“正大光明”之后，具体储君人选变化与否，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从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将秘密立储方案公之于众的做法看，康熙帝品择诸子，迟疑未决，而突发重病、神志不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是康熙帝在病重的那短短几天，也写过一份立储手谕，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一命呜呼了，手谕中所立之人，并非雍亲王胤禛，所以被雍亲王一党如隆科多辈寻机销毁，而改传口谕。但是从允禩、允禟等人在康熙帝驾崩当天的表现看，他们对胤禛的即位只限于震惊、不满，并没有拿住把柄，指斥其矫旨篡位。而从各府亲信家奴前后传播的小道消息内容来看，他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是不明白的，所以说法花样百出，充满戏剧色彩。允禩、允禟在康熙帝身边的眼线很多，类似总管太监魏珠这样的人，都与八王党过从甚密，如果康熙帝真在立储问题上有何重要作为，就算未及公开，允禩等也会有所风闻，稍做准备，不至于表现得这样惊诧失措。雍正即位后，允禟在给允□的信中，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字样，表现出在竞争中没有把握住转瞬机会的懊丧。

事实上，对于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的现实，康熙帝是有心理准备的，也陆续留下一些类似遗嘱的文字。比如雍正帝即位后，很快发现乃父生前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说自己死后，后宫妃嫔如果年老有子，可以各随其子居住王府，阖家团圆；年轻的仍要居宫中，由新君奉养。连嫔妃们的寡居生活都照顾到的康熙皇帝，居然没有对谁是继承人留个纸面说法，看来是纠结异常，难于决断了。

康熙帝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打猎。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史料记载看，他凡是在北京的皇宫、畅春园生活，就免不了头疼脑热、手脚不灵，但一到塞外围场，立刻精神振奋，生龙活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帝从北京启程前往热河，这次他留下能力偏弱，但身兼管旗差事的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三位较年长皇子看家，却破天荒带上了二废太子以后从未随驾出京的十三阿哥允祥。八月初三，康熙帝带着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十三阿哥，以及几位年轻皇子赴围场行猎，九月初回到热河行宫。这段时间，是胤禛、允祥二人难得的交流机会，二人在雍正帝即位之初的默契配合，或许与此有关。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回到北京畅春园，此时距离世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了。大约正因为此，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产生了误判，认为自己虽然日渐衰老、百病缠身，但精力体力毕竟还能支持，没有马上到卧床不起的地步。还没想好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还有时间再想一想。

十月二十一日，自觉身体状况不错的康熙帝又到京郊南苑行围。此前十月，康熙帝曾派雍亲王胤禛、皇孙弘昇，以及辅国公延信、尚书隆科多、孙渣齐等王公大臣到通州查看粮仓，十一月初六日查仓完毕，胤禛等人到南苑面见康熙帝，汇报仓务，康熙帝虽然有些虚弱，但仍能正常议事，思路清楚。初七日，在南苑“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的康熙帝感到身体不适，于当天回到畅春园休养。初九日，雍亲王胤禛受命代行冬至祭天大典。初十日，延信等八旗大臣前去请安，得到的旨意是“尔等不要再来”。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之孙，康熙帝的堂侄，更是此前入藏之战的头号功臣，宗室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如果康熙帝处在病体沉重但又较为清醒的状态，似应接见延信，交代一下西北的军事部署，毕竟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国大政，还牵涉到储位候选人之一——十四阿哥允禵。但康熙帝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此时的他已经过于委顿，乃至意识恍惚，而并非像康熙《实录》描述的那样，还能连日安慰远在天坛的胤禛，说“朕体稍愈”。其时正值隆冬，是老年人的高危季节，康熙帝很可能因为呼吸道问题感染肺炎，触发旧有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很快陷入较危险的状态，无法清楚处置后事。

此际允禵远在甘肃，鞭长莫及；允祉未及准备，失去机会；而胤禛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利用老皇帝已经非常含糊的表达能力，以及各皇子

先后赶来的时间差，锁定大位。先帝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的明确说法，新君虽然没有大将军王十四阿哥那么炙手可热，但毕竟也算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候选人之一，再有手握重兵的国舅现场坐镇，那些事不关己的中立皇子、侍从，当然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异议可言。而允禩、允禟这样自有打算之人，事出仓促，缺乏准备，本人也早已被剔除候选行列，现场除了表达一下情绪上的不满，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传教士马国贤记载了他所看到的康熙帝驾崩之日，畅春园外发生的情况。他写道："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国舅别墅（即佟园，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在畅春园东邻）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父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原因，我登上所住的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互相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带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1]可见当时的武力威慑，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身在甘肃的允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但由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直接统辖，且战线拉得很广，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允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允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呢？至于跟随允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直接指挥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都留在北京，信息渠道也很复杂，北京大局一定，这些人的想法也未必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允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他的命

门。康熙帝驾崩第二天，雍正帝即下旨：

> 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着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着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2]

年羹尧作为川陕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允禵更具影响力。胤禛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制衡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允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允禵只身回京。

[1]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第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之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后夺嫡时代

一

康熙帝驾崩，雍正帝即位，皇子们十几年的夺嫡之争尘埃落定，但命运之局，尚未定论，如果全书就此收煞，则不免阙如，还应略做交代为是。

参与夺嫡的“九王”中，除皇四子胤禛在一片争议声中登上大宝，成为嗣位的雍正皇帝外，其余八人，唯一的获益者是皇十三子允祥。康熙帝驾崩次日，允祥即受命与允禩、马齐、隆科多一起总理事务，随后受封和硕怡亲王，总理户部三库，替雍正帝抓紧了朝廷的钱袋子；雍正元年又总理户部，以及新成立的会考府，总揽财政和审计大权；三年大丧之后，又担任议政大臣，成为雍正皇帝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中的代言人。此外，他还深度参与宫廷事务和内廷宿卫，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凌驾于内务府和侍卫处的特殊地位。朝鲜使臣和译官描述其在雍正朝的地位时说：“雍正以国事全付十三王，而十三王不为专弄，善做政治云矣。”“十三王，全管天下事，凡干机务，尽许裁决，各寺皆待令其第，胡人（朝鲜人心怀故明，称满洲人曰胡人）畏之，过于皇帝云矣。”[1]在大体清理完主要反对势力的雍正四年，雍正帝专门送给允祥一个阶段性评价。七月二十一日，他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做成匾额，赐给允祥，同时召见大学士、九卿、科道、翰林，当面解释这八个字的用意，说：

> 朕自即位以来，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至纯至恪，事事为朕实心办理，而朕委任之处甚多。约略举之，职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议政关系机密，户部掌领度支，三库总理出纳，兴修畿辅水利以厚民生，管领汉侍卫以育人材，至于诸皇子之事务、旧邸之事务，以及督领圆明园八旗守卫禁兵、养心殿监理制造，巨细事件，皆一人

经画料理。而怡亲王公尔忘私，视国事有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盖其尊君亲上之念肫恳笃挚，是其忠也；小心兢业，无纤毫之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无欺无伪，是其诚也；进言无隐，表里如一，是其直也；黾勉奉公，夙夜匪懈，即如目今王虽身抱痌瘝，而案牍纷纭，披阅不倦，朕闻之实至于不忍，是其勤也；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是其慎也；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是其廉也；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赐之。惟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觉此八字实不能尽其美善，亦无一毫过量之词。若有一字不确不切，是朕之颁赐非嘉奖之词，乃讥讽之语矣，朕不为也……[2]

谕旨所言，备极赞美之词，彰显了允祥在雍正初年的特殊地位。除了担任重要的职事外，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康熙皇帝是个“待不住”的人，一生亲征、南巡、西巡、木兰秋狝、巡视河工，足迹遍布南北，也以此为契机，加强对蒙古各部与江南汉人的统战工作。雍正帝与其父的性格本来不同，且即位后，外患压力已经远没有康熙年间那样严重，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搞垮身边的政敌和精密的制度调整，这样的工作显然更适于在安静的环境里完成，而不宜四处奔波。但父皇的榜样毕竟树在那里，如果完全抛弃，一定会引起反对派的非议。是以雍正帝往往将这些康熙帝曾经做过，他又不愿意亲自去做的事，交给允祥代他完成。比如雍正二年，他就让允祥和庄亲王允禄，带着他的几位年幼皇子，以及部分子侄、重臣、侍卫，到木兰围猎，并接见蒙古王公、额驸，替自己维系满洲皇室与蒙古各部的感情。另外，康熙皇帝重视京畿水利，经常带着皇子们巡视永定河等近京主要水系的堤工。雍正三年夏秋，直隶大涝，雍正帝命允祥亲自到京畿、直隶地区主持赈灾，并系统策划直隶水利营田工程，于是从雍正三年冬季起，允祥每年到北京东、西、南三个方向勘查河道、水利。从史料记载来看，允祥在直隶地区的活动，并非一事一办，专门针对农田水利，他常常在沿途阅视营伍、访察官吏，以及接受民间词讼，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替雍正帝效法其父、慎重京畿的作用。雍正四年，雍正帝又以办理水利工程为名，准备让允祥代他到江南巡视，后因筹备对准噶尔兵事过于繁忙作罢。可以想见，如

果真有江南之行，允祥的关注点也不会仅仅局限在水利事务，而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康熙帝南巡的延续。

前面提到，允祥早年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皇子之一，且与太子允礽关系密切，如果按照既定的路线，由允礽即位，允祥应当会获得辅政重臣的地位。然而命不由人，允祥二十二岁那年，太子被废，他成为被牵连最深的皇子，一蹶不振。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在允祥籍籍无名的十四年里，诸兄弟为了皇位争得不可开交，而一朝君臣分际，又只有允祥回到了命运预先设计的位置，得以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这很难不令人想到，除了脾气相投、政见相合之外，胤禛、允祥两人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信任与默契，还可能出于一种对最早的既定格局的强调。特别是对于胤禛而言，虽然他并非“名分早定”的太子元良，但即位以后，却用了康熙帝为太子预留的左膀右臂，这也不失为对自己合法性瑕疵的一个心理安慰。而对于允祥而言，一份荣耀失而复得，也会倍加珍视感激。

不过，可能是胤禛、允祥二人早年的派系属性并不一致，他们在雍正年间的过分友好，总让一些人觉得突兀而不够真诚。譬如允祥身体不佳，不时在京郊休养，是以雍正初年即有人传言：“怡王获罪，不准城内居住，驱逐至温泉。”另外，允祥在雍正年间负责打理胤禛旧邸雍和宫的各色事务，但雍邸旧人和他的关系并不融洽，除了权势熏天的年羹尧傲然自立，两人时有抵牾外，雍邸的一些主要人物，如戴铎、傅鼐、沈竹等，大多投在隆科多门下寻求庇护、提携，而与这位当权的亲王相远，甚至时有矛盾。这一点也可以间接说明，胤禛、允祥两人在康熙后期的交往是较为隐蔽的，连雍邸属人也没有明显感受，以至于他们的社交圈并未随着本主调整，仍然按照此前的惯性，和早年的允禩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已经当上皇帝的胤禛并不愿意给这些深知他老底的旧属们提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会，反而极力打压。雍邸旧人中，除了翰林出身，但在康熙年间从没做过官的弘历启蒙老师福敏仕途发达平顺外，其他人大多结局惨淡，空有个从龙之臣的虚名，境遇反而不及外人。

至于允祥对待允禩等反对派兄弟的态度，允祥去世后，雍正帝在回忆即位之初的政治格局时说：“辅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是；

隆科多作威作福、揽势招权。实赖王（允祥）一人挺然独立于其中，镇静刚方之气，俾奸宄不得肆其志。”雍正帝即位后，允禩管理工部，允祥管理户部三库和会考府，最有条件从拨款和审计两个方向对允禩进行限制。其中会考府在三年内驳回工部奏销案多达五十八件，占六部总数的五分之三，可以说工部是动辄得咎。当然，这些限制和压力尚限于日常政务层面，至于人身打击层面，有民国年间的笔记提到，允祥态度鲜明，极力主张雍正帝杀死允禩等人，以获得雍正帝的宠信。事实上，在关于是否处死允禩等人的问题上，允祉、隆科多等人都进行了表态，但允祥恰恰不需要这样做。作为曾经的太子党成员和雍正朝的第一宠臣，允祥和允禩等人从来都泾渭分明，不存在任何立场模糊的问题。相反，在雍正帝处理允禩等人最集中的雍正四年，允祥频繁到直隶地区勘查水利营田，至少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对允禩案的参与并不十分直接。这很可能也出于雍正帝对这位最亲信贤弟个人名誉的一种保护——迎合上意，对亲兄弟喊打喊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不是件体面事情。

允祥的身体一直不大好，这应该是在康熙后期受冷落时落下的病根，雍正年间的史料里经常出现他“小不爽”“身抱疴疾”的说法，传教士的信札里也时常见到他到京郊游猎、放松休养的记录。到雍正七年冬天，他的病情明显加重了，开始逐渐卸下各项兼差，专一养病。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允祥在北京的王府病逝，年仅四十五岁。当时的雍正皇帝也患有重病，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和允祥谁会死在前面，乃至希望这位贤弟能“辅弼于将来”“立周公之事业”，而允祥也提到过，自己愿意把生命进献给皇帝，以增其寿。最终的结果，是允祥先兄长而死，雍正帝心中遂生贤弟代朕而逝的感激，在亲自撰写的祭文中就“先死”一事发出长篇感慨：

> 修短之不齐者，数也；生死之难忘者，情也。得贤弟而中道弃捐，朕兄之凉德也；赖朕兄而遗徽表著，贤弟之厚福也。今者，朕兄以念弟之深，痛弟之切，大显其勋名，尊崇其典礼，凡经理于身后者，无不殚竭其心思。而贤弟生也荣，死也哀，名既不朽，寿且无疆，贤弟之福，不已全乎！假令克享大年，后朕而逝，朕之孝子顺孙善体朕心，亦未必能洞悉弟数十年之心迹，如今朕之经理周详，罔有遗憾。然则，贤弟洵有全福，而朕之怀忧抱恫，失所依

毗，其福不及贤弟远矣。[3]

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情，雍正帝虽然自己也在大病中，但他对允祥的后事极为重视，多次亲临祭奠，并且发布了大量上谕，或回忆其生平贡献，或对其丧礼、墓地、子嗣亲属叠加逾制的恩礼，不但举朝侧目，连朝鲜人也议论纷纷。

允祥去世时，在世的儿子还有三个，庶长子弘昌，雍正初年已封为贝子。两名嫡子中，年仅八岁的嫡幼子弘晓按照早在雍正元年就定下的“世袭罔替”之约，承袭了他的怡亲王爵位。允祥生前获得的特殊优待，比如亲王的俸禄、仪仗翻倍，增加佐领、属官人数，赏赐本属官办的盐课作为王府私用度，等等，也都统统由弘晓继承，且世代不得削减。弘晓的同母兄长弘晈则被另封为宁郡王，这个爵位是雍正三年允祥卸任总理王大臣时就要赏赐给他的，因其力辞而未成行，此时仍旧找补回来。允祥的嫡长子弘暾，在雍正六年去世，雍正帝命以贝勒礼治丧安葬。弘暾曾定亲大学士马齐的孙女富察氏，未及成婚而亡。雍正八年五月，雍正帝命富察氏入王府守节，以弘晈之子为弘暾之嗣，承袭贝勒爵位。也就是说，允祥去世后，怡王府出现了一门一亲王、一郡王、一贝勒、一贝子的局面，实在超过正常亲王袭封的规格太多了。此外，允祥最小的嫡女被雍正帝收养，封为和硕和惠公主，其他成年的女儿无论嫡庶，也都封为郡主。

当然，这个鼎盛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乾隆初年，允祥一系因为弘皙逆案受到打击，地位有所下降，这一点我们放到后面再来细说。

“九王”中，除了允祥地位有大幅提升外，废太子允礽和皇长子允禔的状况和康熙后期差别不大，仍然处在幽禁状态。其中大阿哥允禔在囚禁了二十六年之后，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病故，终年六十三岁。雍正皇帝下旨将他按照贝子的规格办理后事，并将其子弘昉封为镇国公，延续这一支的爵位。

废太子允礽的囚禁状况要比允禔复杂得多。因为当过近四十年太子的特殊地位，二次被废后，朝中仍然有复立允礽为储的呼声。作为父亲

的康熙帝舐犊情深，不忍心虐待被废的太子，仍然给予他较为优厚的生活条件，且宠爱其子弘晳，这也给大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朝野时有传言，认为康熙帝会复立允礽，或是像朱元璋那样隔代传位，直接立弘晳为嗣君。而允礽自己也没有死心，于是出现了借福晋生病，通过太医传递消息，请求保举其为大将军的矾书事件。

前面曾提到，皇三子允祉有争储之心，心腹陈梦雷曾替他找术士求神拜斗，其中一个计划，就是祈祷康熙帝不要把废太子和大阿哥放出来。允祉争储的优势在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依次当立"，如果允礽等人放出，他的优势就自动丧失了。至于胤禛，虽然二废太子后就有夺嫡之心，但他本人一直非常低调，尽力和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求击而不中，退身有术。他和允禩集团本来关系紧密，和允祉关系也不算坏，唯独和废太子允礽结下过撕破脸的矛盾。康熙末年，胤禛和前太子党成员允祥成为盟友，从最功利的政治投机角度讲，如果说允祥因为痛恨允祉，又无法融入允禩集团而必须支持胤禛，那么胤禛结好允祥，想必也有与太子党搞好关系，避免允礽再次复立的考量。

当然，朝野的猜测归猜测，康熙帝确实没有再次复立允礽的意思，且对太子党的残余势力防备甚严，甚至杀掉了建议复立允礽为太子的翰林朱天保。康熙五十七年，康熙皇帝在昌平州郑家庄（今郑各庄）一带修建行宫、王府、城墙和驻军营房，作为京北防御重镇，并准备在建好后派一名皇子移驻此地。雍正帝即位后透露，康熙帝此前有让二阿哥移居郑家庄之意，"因无明旨，朕未敢擅自办理"。诸皇子中，康熙帝对允礽感情最深，寄予的希望最大，挫败感也最强。康熙帝不愿意再度复立允礽为太子，让他继承皇位，但也不忍心以伤害他为代价，打消一些投机分子的觊觎之心，更怕自己身后他会被人利用搞出乱子，所以每每寓怜悯关照于疏离猜忌之中，并告诫其他皇子："二阿哥断不可放出。"

康熙帝驾崩后，允礽的希望和怨念都随之灰飞烟灭，身体也变得衰弱。雍正帝即位后，将允禩集团定位为主要斗争对象，碍于此前的名分和康熙帝生前的态度，对允礽一家则比较客气、优待。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病重，雍正帝派隆科多带领太医前往探视诊治，病故后追封为理亲王，谥号"密"。雍正帝亲往吊唁，又派弟侄辈多人穿孝，丧葬费用均由内府出资。

允礽去世时正值隆冬，又逢大雪，诸王大臣建议雍正帝不要亲自到五龙亭停灵处祭奠。雍正帝陈述了一番恺切之词后，告诉众人，允礽临终留有遗言：

> 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臣得罪皇考，系大不孝之人，应将臣弃置不问，乃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实感戴靡涯。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虚言。前若赐臣二寸白纸一条，岂能延至今日乎？识者自必知之。荷蒙圣恩，别无他愿，冀得生存而已。[4]

允礽的遗言，出自代表雍正帝去看望他的隆科多的转述，更多体现的是雍正帝试图让允礽表达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允礽的本意。此处所谓“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显然是针对一废太子前两人的矛盾而言，而后面的知恩感激之语，既表达了有罪的前太子对新君的臣服拥戴之意，又凸显出雍正帝大度、孝悌的君主美德。允礽临终的这番话，后来成为雍正帝驳斥曾静“弑兄”说的重要凭据。

雍正年间，允礽的子女也得到比较好的安置。雍正帝即位次日，即封康熙帝最喜爱的皇孙、允礽侧室所生之子弘皙为理郡王，命其居住郑家庄王府，雍正八年五月又晋封为理亲王。允礽的庶子弘曣、弘晀被封为公爵，一些年幼的子孙如弘□、弘晥、永璥等，则被雍正帝养育宫中，以减轻弘皙的经济负担。此外，允礽的第六女被雍正帝收为养女，出嫁时封为和硕淑慎公主，也较同侪享有更高的政治待遇。

二

雍正帝即位后，“九王”中允祉、允禩、允禟、允□、允禵五人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中允祉遭受打击的时间相对较晚，而允禩集团的四名成员则从雍正元年起即被列入政治清洗的目标。从康熙帝一废太子起，允禩集团就是朝中最大的“山头”，拥有数量最多、实力最强的支持者。在康熙皇帝的极力打压下，虽然允禩本人失去了夺嫡资格，但代之而起的允禵青出于蓝，以其显赫的军功，成为继统呼声最高的皇子，虽然一夜之间前功尽弃，但威望和能量仍旧不容小觑。

康熙帝驾崩当日，允禟在诸兄弟中表现得最为震惊、激烈，用雍正帝的话说：“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而身在甘肃的允禵接到消息后，也非常激动，虽然只能独自回京，却大有怒气冲冲、兴师问罪之意。有传教士记录，允禵回京后就严斥隆科多，并要求看先帝的遗嘱，经太后干预才作罢。此事虽然未必尽实，但也反映出当时宫廷中剑拔弩张的氛围。雍正帝后来历数允禵的罪行时说：

> 皇考宾天时，允禵从西宁来京，一路并不奏折请太后安，亦不请朕安，反先行文礼部，问其到京如何行礼仪注。及在寿皇殿叩谒梓宫后，凡一切外来诸臣，即蒙古札萨克王公等，皆前近朕，抱膝痛哭，而允禵远跪不前，毫无哀戚亲近之意。朕向前就伊，仍不为动。彼时拉锡在旁扶朕，令伊近前，伊出，遽将拉锡骂詈。到朕前大肆咆哮云：“我本恭敬尽礼，拉锡将我扯拽，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无不是之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其咆哮之状，无礼已极。[5]

总而言之，在雍正帝即位的前几个月里，北京城的政治气氛是很紧张的。作为九门提督的隆科多尤其绷紧了一根弦，雍正帝要去祭祀，他就声称怕是有刺客，要连供桌下面都搜查一遍；雍正帝去景陵送葬，他就奏称“诸王心变”，建议严加防备。隆科多此时的角色，颇有些白色恐怖状态下特务头子的意思，不能不令人恐惧、厌恶。雍正帝大权稳固

后，对他反戈一击，未必没有息众怒、借人头的意思。

对于自己即位而导致的诸王不服、朝野不靖局面，雍正帝在事前是有所预见的，即位后使用的策略也很有针对性。第一步：以稳为主，分而治之。

所以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用允禩，封他为亲王，令其成为总理事务王大臣之首，主持中枢。正向些揣测雍正帝的意图，大约是他想到允禩与自己一起长大，生母之间又颇有感情，允禩在康熙后期的处境并不好，本来已经没有了即位的可能，新君登基，骤获大用，说不定还有受到感化而改弦易辙的可能。另外，允禩的威望最高，性格也比允禟、允禵温和，由他参与中枢决策，新君政令的推行受到的阻力或许会小一些。可惜，对于这样的收买示好，允禩本人并不买账，他的妻子郭络罗氏也愤然对前来祝贺的娘家人说：“有何喜可贺？恐不能保此首领耳！”允禩夙有“惧内”之名，雍正帝后来对这位弟妇下手极辣，想必也是痛恨她对允禩立场的影响。

允禟、允□的利用价值没有允禩那样高，雍正帝对他们的处置策略自然也与对允禩不同。雍正元年上元节还没过，雍正帝就先给允禩集团中最不重要的十阿哥允□派了个远差。康熙皇帝去世后，年近九旬的外蒙古黄教领袖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前来奔丧，不幸在京圆寂。老活佛在外蒙古归附问题上立下头功，又和康熙皇帝有深厚渊源，所以清廷要派出高级别的治丧团队，将其灵柩送回喀尔喀草原。雍正皇帝借着这个正大光明的机会，将十阿哥派了出去。允□对新君的抵触情绪很重，竟然在这样维护“统一战线”的大是大非上公然抗命，刚走到张家口，就兀自停滞不前，给人留下口实。

也是在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帝又以允禵已经回京，按照惯例，军前不能没有宗室王公为由，准备派九阿哥允禟到西北去。允禟也是软磨硬泡，希望等康熙帝百日，或是入葬景陵后再走，但没有得到允许。随着西北局势的变化，雍正帝又密令新任大将军年羹尧，将允禟带到西宁附近的小城西大通居住，并对其严密监视，令其将家眷也随后搬去，无旨不得回京。

雍正元年三月，雍正帝带领众兄弟，将康熙帝的梓宫送到景陵安

葬，安葬过程中，允禵与雍正帝又爆发了冲突。据雍正帝说：

> 梓宫奉移山陵时，朕令拉锡、佛伦传旨，允禵倨傲不恭，且与拉锡、佛伦争闹，本不与允禩相干之事，而允禩从账房中出，劝之令跪，允禵即跪。可见伊以朕旨为轻，惟允禩之言是听，此即其明验也。[6]

看到允禵如此桀骜不驯，与允禩的关系又这样的坚固难解，雍正帝也顾不得一母同胞的特殊身份，直接告诉三兄允祉，准备将允禵留在景陵附近居住。不过因为雍正帝与允禵的生母皇太后驾崩，当年五月，雍正帝又将允禵召回北京，并勉强封其为郡王，但同时威胁说：“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终不悛，则国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总而言之，雍正帝即位后的半年内，虽然坊间也有他逼凌弟辈的传言，但坏人主要由隆科多充当，雍正自己还处在动心忍性、积蓄力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他将允禩以高爵厚禄留在中枢，把允禟、允□以较合理的理由派出京城，对允禵的坏脾气则以克制为主，试图软硬兼施，去其锋芒。另外，对于允禩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雍正帝也采取怀柔态度，甚至安排重要职务，比如让和允禩关系较好的堂弟裕亲王保泰管理理藩院，晋封苏努为贝勒，任命鄂伦岱为都统、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等等。

到雍正二年春夏，雍正帝对允禩等人的态度急转直下，由容忍中的小敲打，变得陡然严厉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三月初的青海大捷。雍正元年，青海地区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自立为汗，且向西宁城周边地区大举进兵，雍正帝任命旧邸门人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短时间内用较小代价就平定了叛乱，立竿见影地验证了——在青藏地区打仗，不是非十四阿哥允禵不可。

年羹尧青海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恰逢康熙帝安葬景陵后的第一个清明，雍正帝正带领王公大臣在景陵祭奠。得知这个消息的雍正帝欣喜若狂，立即向躺在陵寝里的乃父进行“汇报”，并以前所未有的礼节，“着黄布护履，躬自负土，膝行至宝顶，跪添土毕，匍匐退行”。即亲自在陵

丘上匍匐跪行，担送新土，为康熙帝行“敷土礼”。如此孝行、如此大功，昭示着雍正帝的皇位从此无可撼动。

被一场大捷撑硬了腰杆的雍正皇帝一回到北京，就开始狠狠敲打允禩，他直接提到了康熙五十三年的“毙鹰事件”，准备把康熙帝怒斥允禩谋逆，要和他恩断义绝的上谕“传示诸大臣”。经允禩一再哀求，恳请“免其宣示，以全颜面”，才予以作罢，但让宗人府和内阁将谕旨收藏起来，只要允禩有个风吹草动，就拿出来公开传阅。

四月，雍正帝将不肯前往外蒙古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灵柩，在张家口住了几个月的敦郡王允□革去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这使允□成为雍正朝第一个遭受重处的皇子。允□的囚徒生涯一直持续到雍正帝去世，乾隆帝即位后，他被解除圈禁，改为在家闲居，乾隆二年给予辅国公空衔。乾隆六年九月初九日，允□在家中病逝，按照贝子礼仪安葬。

七月，雍正帝不顾允禵福晋已经患病，执意派他到景陵守灵。至此为止，允禩、允禟、允□、允禵四兄弟，被各自隔绝起来，再也没有彼此见面的机会了。

在这一阶段内，雍正帝利用允禩等人分居异地、相互之间信息隔绝的便利，对其进行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允禩身居中枢的地位与较为柔懦的性格，点名让他主办关于允禟、允禵、允□等人的事务，以此降低他在团队中的威望。譬如康熙末年，虽然允禵的夺嫡呼声远远高过允禩，但他仍然奉允禩为“党首”，对允禩颇为信服、顺从。雍正帝即位之初，允禵每每在公开场合大吵大闹，而一经允禩劝说，就安静下来，让自己的亲哥哥雍正新君顶没面子。允禵被安置遵化守陵后，时时处在马兰峪总兵范时绎的监视之下，和允禩等人的沟通渠道被完全切断。雍正二年八月，允禵的福晋完颜氏病故，允禵本拟按照喇嘛教的办法，将福晋的骨灰安放在自建的木塔中，但被雍正帝以不合礼制否决，重新拟定丧葬标准，交给允禵阅看。允禵认为标准过低，大不满意。雍正帝即告诉允禵：现在这个安排是跟你关系最好的允禩和拉锡提议的，他们说你身为罪人，妻子身后的礼仪应该降低，这可不是朕的主意。随后就将允禩等人的奏折寄给允禵看，并自行提高了允禵福晋的丧葬等级。事实

上，按照当时的制度，哪怕允禩、拉锡作为丧葬标准安排的提议人，其意见也要上奏经雍正帝批准，才能成为定议，发给允禵。如果雍正帝认为所拟过低，上奏时即予指出、修改，才是顺理成章。显然，他是有意将允禩等人的“不够意思”告诉允禵，以收离间之效。当然，如果允禩等人一开始就拟以较高标准，而不留下“恩自上出”的余地，则必定要被指责为结党庇护允禵、施恩买好。总之，雍正皇帝占据信息最优位置左拉右打，让允禩等人洋相出尽，毫无还手之力。

雍正三年三月，新君为康熙帝守完了二十七个月丧期，这个节点在雍正帝处理允禩等人的问题上非常重要。第一，丧期结束，意味着皇帝可以完全独立地处理政务，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任期也就结束了。因为允禩没有像允祥一样被任命为议政大臣，他在权力中枢不再拥有位置，只剩下管理工部事务这项具体的差委。时值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卸任之际，雍正帝发布长篇谕旨，对他们二十七个月的工作进行评价，其中对允祥的评价最高，并想给予他“加封一子为郡王”的超规格奖励：经允祥极力请辞乃免；对隆科多、马齐也有所奖励：隆科多赏给世袭一等轻骑都尉，马齐赏给骑都尉；至于允禩，则斥其“诸事推诿，无一实心出力之处，无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怀挟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摇动众志，搅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有罪无功”，予以全面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丧期结束，意味着雍正帝打击兄弟、近亲属的道德压力减小了。儒家有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之说，父亲丧期之内就迫害手足，无论理由多么正当，道义上也说不过去；丧期之外，就要心安理得多了。

第三，在这一时间点前后，此前煊赫无比的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开始与雍正帝反恩为仇。雍正帝在京利用隆科多压制允禩，在西北利用年羹尧先挟制允禵、再监视允禟的策略发生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允禩集团给雍正帝带来的政治压力已经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可以凭借君主的权威轻松对付，而不再需要借力打力、假手于人。

所以大致从雍正三年夏秋起，雍正帝对允禩集团吹起总攻的号角。雍正三年七月，雍正帝先将允禟贝子革去；十二月，将允禵郡王革去，降为贝子。雍正四年正月，将允禩、允禟削宗籍，将允禩之妻革去福

晋，休回外家；二月，命将允禩高墙圈禁；三月，允禩自改名为阿其那，其子弘旺改名菩萨保；四月，允禟被从西宁押送回京，中途奉旨，留于保定禁锢；五月，将允禵革爵囚禁景山寿皇殿，允禟改名为塞思黑；六月，定允禩大罪四十款，允禟大罪二十八款，允禵大罪十四款；八月二十七日，允禟在保定监所内死亡；九月初十日，允禩在北京禁所内死亡。

在这段时间内，允禩、允禟二人也有一些挣扎反抗的迹象，但比起雍正帝的咄咄逼人，则显得非常微弱，近乎撒气、泄愤，而缺乏实质意义。比如允禟面对新的看管者都统楚宗，表现得傲慢而冷漠，并不出迎请安，并无忧惧之容，聆听谕旨也不叩头，还顶撞说：“谕旨皆是，我有何说，我已欲出家离世，有何乱行之处？”他在西宁和传教士穆经远偷偷往来，并且发明了一种用拉丁文转写满文的新文字，用以书写密信，和住在北京的儿子弘晹联络消息。但计划才刚刚施行，就被守卫京城的步军衙门官兵抓个正着，而后被雍正帝称之为“敌国奸细之行”，定以重罪。另外，允禟在西宁居住时，携带了很多现银，出手非常大方，在当地的商人、百姓中口碑很好，不少人对他的政治失意报以同情之心。允禟曾经救助过一个叫令狐士义的山西籍贫民，他被革爵软禁后，令狐士义到其住处投书，说要邀结山陕兵民造反，以救允禟。允禟对令狐士义采取保护态度，并未向看守之人报告，但同时也告诉他：“我们弟兄没有争天下的道理。”当然，从档案记录上看，无论这位令狐士义还是后来劝反允禵的蔡怀玺，其行为都并非寄托于军政实力，而颇多孤胆英雄式的妄诞，和曾静游说岳钟琪的性质相近，没有一点儿撼动现实政权的可能。

允禩在面对雍正帝的当面质问时，急火攻心，赌咒发誓，有“若有虚言，一家俱死”的说法，这就被雍正帝抓住了把柄。所谓“一家”，可大可小，稍微扩展一点儿，就把皇帝和其他宗室成员都牵扯在内。所以雍正帝说他是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为宗姓所不容。另外，允禩在受到重大打击，特别是被迫和妻子离散之后，心态非常颓废，每天在家里酗酒买醉，他的婢女白哥劝谏他，想让他到雍正帝面前认罪、乞求原谅，允禩拉不下面子，愤然说：“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眼看着主人走上不归路，对允禩颇有情意的白哥含恨自缢，这件内

宅私事后来也被人揭发出来，成了允禩的一桩罪过。

至于雍正帝给允禩等人所定的罪名，乍看起来，都颇能引发读者的想象，而一旦读到其供状原档，则会有另外的观感。允禟罪名中，有“既到西宁，寄书允□，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逆乱之语，公然形之纸笔”，给人的感觉是允禟、允□二人愤恨康熙帝驾崩之日事机不成，始终愤愤不平。而翻检其书信原文，体会其本意，则是二人互相宽慰劝说，表示当时的机会已经失去，后悔也没有用，以后不必再做无谓之争。[7]再者允禟罪名中有他的儿子弘晸把他的话称作“旨意”一条，仿佛弘晸背地里要拥戴允禟做皇帝似的。其实“旨意”一词出自弘晸给自己老师佟保的信，所谈不过家常事务，其中提到，“余尊敬师父，就似遵照阿玛之旨意一样”。[8]那封被雍正帝斥为“敌国奸细之行”的密码信，内容也是父子间关于琐碎家务的讨论，跟政治没有丝毫关系。

总而言之，允禟的所有罪证，在形式上或有诡秘、僭越之处，但在内容上并无违碍，更谈不上与雍正皇帝进行政治对抗。这表明，第一，在极端复杂、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允禟与亲属、同党的信息沟通，始终保持着康熙后期的地下、半地下状态，这一点和他的四哥胤禛并没有区别——胤禛做皇子时，也曾对属下人戴铎用特制双层夹板书匣子送密信的做法表示赞赏，即位以后，更是始终鼓励密折政治。第二，进入雍正年间后，允禟等皇子或高级宗室，仍保持着康熙年间的生活方式，他们之于亲人、府属旗人的权威，与皇帝之于臣民并无二致，这在他们本身不过惯性使然，在定罪时却成了小辫子，被雍正帝一抓一个准。而雍正帝在八旗内部“化家为国、化主为君”的改革过程，也正是与这些抓小辫子的手段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第三，值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际，允禩、允禟虽然兀自保持皇子的自尊，不愿做摇尾乞怜的奴相，但终究秉持了爱新觉罗家族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传统底线，抱定成王败寇的心态，不做殊死搏斗。这也是清初满洲上层虽然屡屡发生残酷的权力再分配，却总能在整体上保持团结，维持政权稳定性的重要原因。雍正帝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什么真正“谋逆”的行动和谋划，甚至远不如戴铎对自己说过的，跑去台湾“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这样的话露骨，所以只好从形式上加以责难，总归到了这个时候，也再没有人敢做仗马之鸣了。

雍正四年八月底、九月初，允禟、允禩二人先后瘐死狱中，雍正帝称之为“伏冥诛”，而后人则多怀疑二人是否正常死亡。关于这一点，雍正帝与直隶总督李绂就看守允禟一事的往来奏折、朱批上，有一些直观信息。李绂是康雍时期的名儒，雍正初年，他的地位上升很快，到雍正四年前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核心的政治圈子。李绂在奏折中提到，雍正四年四月，他进京陛见之余，与大学士张廷玉，尚书蔡珽、法海，都御史傅敏，总督高其倬等人首先倡议公疏纠参允禩、允禟等人，可见在对待允禟的问题上，李绂是立场坚定的急先锋。雍正帝没有把允禟押解京师，而是放在保定，交给李绂看管，是笃定李绂不会对允禟稍做“宽徇”的。作为一个与皇家没什么交集的汉臣，受命看守政治斗争落败的皇子，这在清代中前期的背景下，是很罕见的事情。所以李绂得到指示后，颇有些受宠若惊、用力过猛。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他在接到侍卫纳苏图传达的口谕后，立刻飞檄由陕西到京的沿途各州县，要求州县官们如果遇到允禟过境，就差人秘密送到保定。雍正帝看他这样大张旗鼓，自己就吓了一跳，又不便批评李绂，只好说是侍卫带错了话：允禟自然有专人押送到保定，你准备好看押地点就行了，不是让你把他“掳”来，赶紧把你派出去传话沿途各州县的那些人叫回来吧，太声张了！[9]

允禟到保定后，住在总督衙门前的小房子里，由专人看守，手脚上戴着铁索，吃的是罪人饮食，用可以转动的铁桶从小门送饭。其时正值盛夏，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允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李绂将这些安排向雍正帝细致汇报，雍正帝逐条给予批示。比如李绂提到，给允禟的饮食与牢狱重囚丝毫无异，雍正帝即批：“又太过矣，不过粗常茶饭，不必加意供奉就是了，总以折中，乃朕之意。”李绂说允禟中暑昏厥，家人用冷水喷渍，很长时间后才苏醒。雍正批曰：“此即汝被愚处，未闻死而复活者。”至李绂说看允禟现在的状况，恐怕难以久存。雍正帝则批道：“但从他，一点有为，万万使不得！使不得！”综合几次朱批的表述来看，雍正帝希望李绂对允禟严加看守，不要有丝毫怜悯，像囚犯一样对待是可以的，但也不必过于虐待，最好让他自生自灭。事实上，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特别是对从无看管宗室犯人经验的汉臣李绂而言。站在他的角度，宁严勿宽，恐怕是唯一的选择。根据李绂的系列奏报可知，允禟五月十五日到保定，其时饮食如常；七月十五

日开始有腹泻之症；八月初九以后饮食甚少，形容衰瘦，言语恍惚；八月二十五日病危，呼唤不应；二十七日身故。允禟在保定一共关押了近三个半月时间，终年四十四岁。

与允禟相比，允禩因为囚禁在京，所以留下的直接材料不多。按照其子弘旺的记载，他从雍正四年二月起被关押在一个叫姜家房的地方，最后死在那里。允禩被圈禁后，愤懑异常，曾向看守太监说："我向来在家，每餐止饭一碗，今饭加二碗。我断断不愿全尸以殁，必使见杀而后已。"到八月底，允禩患上呕症；九月初病势加剧，不能进食；九月初十日去世，终年四十六岁。

相对于允禩、允禟而言，允禵的结局稍好，这当然与他是雍正帝的一母同胞有关。雍正帝给允禵的朱批中，屡次提到"太后额涅"劝他戒酒，让自己予以关照、教导，雍正帝对允禵再戒备不满，也不能完全不顾及母亲的心意。而更重要的，是允禵的"认罪态度"甚好，雍正四年以后，几乎到了哀怜乞恩的地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有允禩、允禵等案的满汉文档案包，内里包括涉案奏折、供单，以及文字证据，如允禟创造的密码信等，其中仅允禵的认罪奏折，就有十余件之多，口气十分卑微。如其中一折有请求回京之意，称：

> 臣允禵谨奏，为请天恩事。臣从前愚昧，泯灭大道，一切所行非是之处，实不可胜数。因而主子（将臣）置之国法，治何等之罪，亦不及臣先前所行之罪。而主子似天一般包容，总将臣之罪宽免，还施深厚之恩，臣实感钦服，于主子恩典感戴不尽，何敢除此之外，再求殊恩。然，臣离开主子将近三年，即使人养一犬，（犬）尚知摇尾矣。臣受主子恩典，即使如何愚蠢，得无似犬一般待主、恋主之情乎。每每思及此处，实是睡不能安眠，食不能下咽，怎样做，才能感主子一向仁厚之情，得以改过，重见天日。反复思及，亦已全然不得一路。古人云："阿玛生身，主子养身，非阿玛不能生身，非主子不能养身。"现臣不得主子怜养，如何生于人世。惟万次叩首请求，主子将臣先前之罪抛却，洞悉（臣）似犬马一般恋主之情，赐臣一条新路，尚得于万岁圣诞之日、年节吉礼之时，无数次瞻仰主子圣容，得蒙学习，与众人一道于金阶下行礼，

> 得尽君臣之礼。若果如此，臣即使万死，于九泉之下亦领主子无穷之恩。若否，臣枉生于世，比之犬马亦不如矣。为此害怕畏惧，臣尽吐所思，谨奏以请天恩。所请之事，求圣主明断。[10]

允禵年轻时一向以刚强、直率著称，刚从西宁返回北京时，对新君的态度也最为强硬。但随后发生的事，让他一步步走向绝境。先是太后驾崩，允禵失去宫廷中最重要的倚仗，也失去了和四兄的共情基础与沟通渠道；紧接着年羹尧青海之战迅速告捷，自己在西北军事上的不可替代性荡然无存；再往后则是允禩、允禟、允□，乃至隆科多、年羹尧等势力纷纷遭到瓦解，多年的亲朋好友、老部下各自身败名裂，自己成了雍正帝有待攻克的“最后一块堡垒”，已经被逼到了四顾茫然、退无可退的境地，前半生顺风顺水的允禵再也撑不起大将军王的架子了。雍正四年三月，有旗人蔡怀玺到景陵附近允禵的住所求见、投书，信内有“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字样。允禵主动将书信交给了看守他的马兰峪总兵范时绎，做法与允禟之于令狐士义迥异。

堂堂大将军王，在雍正改元仅四年后，就被同母兄长的淫威、八九诸兄的惨况吓丢了魂，卑微乞怜以至于斯，旁观者不能不感慨叹息。至于雍正帝，则不能不志得意满，所以他虽然没有让允禵恢复自由，但在雍正四年五月把他从景陵带回北京，圈禁在景山寿皇殿，居所条件相对宽松、舒适。乾隆帝即位后，马上解除了允禵的圈禁状态，让他回家居住。乾隆二年给予公爵虚衔，乾隆十二年封为贝勒，照常上朝，次年晋封多罗恂郡王。乾隆二十年，允禵病逝，谥号恂勤郡王，享年六十八岁。“九王”中，寿命较长的允禵、允禔、允□三人，都经历了长期的囚徒生涯，却并没有过分影响身体健康。由此亦可知，允禩、允禟囚禁数月即死，当与格外糟糕的囚禁条件有密切关系。

除了允禩、允禟等四个亲兄弟外，雍正帝即位后的前四年里，还对允禩集团的主要成员，以及同情他们的王公大臣予以打击。宗室中如裕亲王保泰、简亲王雅尔江阿、平郡王纳尔苏均遭革爵；允禩福晋的外祖父安亲王一支停止袭爵；贝勒满都护降为镇国公；贝勒苏努和他的十几个儿子，以及家属，都被发配山西右卫或其他地方禁锢。苏努一家虔诚信奉天主教，是以他的政治活动与晚年遭遇，在传教士笔下往往被描述

成残酷的宗教迫害，且与雍正初年的禁教活动紧密相连，这种说法显然过于高估了天主教活动在当时雍正朝政治中的重要性。

康熙朝的两大外戚——佟氏家族的鄂伦岱和钮祜禄氏家族的阿尔松阿，都先被发配盛京，然后处以斩立决的极刑。允禟的岳父，雍正年间故去的都统七十，被戮尸扬灰，其子斩监候。而康熙年间就已经盖棺定论，给予美谥的阿灵阿、揆叙，则被翻出旧账，雍正帝自称与此二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他们极尽羞辱，将阿灵阿的墓碑改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墓碑改为“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再如允禩等人的老师、满人大学士徐元梦，也因为劝谏雍正帝顾念手足之情，而被革职折辱。当然，按照满洲上层约定俗成的传统，这些宗室、勋贵世家中的政治斗争失败者，大都罪止于身，最多累及本人的妻、子，对其家族整体地位的影响并不很大。

三

除了允禩集团的几个皇子外，作为康熙末年的皇位竞争者之一，允祉在雍正年间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过实力有轻重之别，矛盾有主次之分，雍正初年，雍正帝的主要精力是对付势力最大的允禩集团，对允祉采取小敲小打、避免正面冲突的策略，等到皇位稳固以后，再集中发难。

雍正帝即位后，马上任命允禩、允祥为总理王大臣，参与机务，另外，还陆续任用十二阿哥允祹、十六阿哥允禄、十七阿哥允礼、裕亲王保泰等兄弟、堂兄弟管理部务，但对在康熙年间已经有较充分参政经验的允祉未做安排。据雍正帝说，允禩曾经推荐允祉总理事务，被自己拒绝了。从政治倾向上看，雍正帝不喜欢允祉，不愿意让他参与政务，是显而易见的；从技术层面看，弟弟使唤哥哥做事，哪里不满意了，说也不好说，骂也不便骂，恐怕也在考虑之内。

除了不对允祉本人予以重用外，雍正帝即位伊始，还马上逮捕了允祉的心腹、替他求神问卜的大学者陈梦雷，将其父子发配黑龙江。雍正帝在针对此事的上谕中特别提到，“皇考遗命以敦睦为嘱，陈梦雷若在诚亲王处，将来必致有累”，并不避讳处置陈氏，即是针对允祉的动作。雍正二年十一月，雍正帝将允祉的嫡长子弘晟革去世子爵位，贬为闲散宗室，交给其父管束。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雍正帝看诸王嫡长子不顺眼，并非仅针对允祉一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在后文会具体讲到。总而言之，雍正初年，雍正帝对允祉本人尚属优容，但对他的左右近亲，已经着手翦除了。

然而从允祉的角度来看，雍正帝对允禩集团的酷烈打击，给他的刺激是很大的。允祉和允禩等人的感情原本泛泛，很大程度上也是竞争对手，但在雍正帝打击允禩集团的过程中，允祉一度流露出同情之意。譬如允祉与十阿哥允□本来关系不佳，雍正帝夸张地称其为“仇怨最深”，但是允祉奉旨搜查允禟给允□的书信时，发现内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之类违碍字眼时，就想隐匿起来，对二人稍加保护；再如允禵被革去

郡王爵位时，允祉亦当众叹息流涕，有兔死狐悲之叹。雍正四年二月初七日，雍正帝命诸王就如何处置允禩的问题现场表态时，作为宗室中年辈、爵位最显赫者，允祉的态度又有所迟疑，这让雍正帝疑心顿起。不过，用雍正帝的话说，允祉终归是个“心胆尚小”之人，他很怕被扣上允禩一党的帽子，事后赶紧到圆明园请求面见雍正帝，被拒后写下两份密奏，发誓自己绝无与允禩串通之事，绝非允禩、允禟同党，绝对忠于皇帝，又特别强调：

> 允禩所犯之罪，应予正法，削除宗籍。主子如此决断以来，未曾降旨，是以允祉并不知晓。今将杀允禩之过落于我身，我情愿承受，主子说我是允禩同党，我也接受。主子圣明，且有上苍为鉴，我若捞取声名，与外人胡言乱语，即让我如允禩一样承受苦难。臣允祉乃一奴才，忝为人兄，竟敢如同主子之手足。主子如何想，谕旨如何言，我就如何遵照而行。此外再无他言。伏乞主子阅讫批还。若无主子圣明奇恩，我岂能存活至今。

雍正帝见此，志得意满，回复说：

> 朕含泪阅之，大为赞赏。阿哥诚能如是，朕有负尔矣！皇考在天之灵，必有明鉴。此是朕一片苦心。只是阿哥原本善于说谎哄人，容忍一切异端，朕稔知此情，怀疑憎恶是实。朕若即称相信，实为欺骗上苍，尔若执意骗朕，即是悖逆于皇考。日月长久，试（拭）目以待！阿哥果能如此，不仅多有尔主子弟弟的好日子，朕之福份（分）也才全备。身为亲兄，宜倍加谨恪。又，允禩之心及其所行，皇考神灵与上苍俱已睿鉴。或杀或养，朕未降旨，亦无必行正法或必予宽恕之念，岂有靠尔阿哥之名杀弟之理？阿哥惟须持大体，恪守为臣之道，朕或有措置。欣喜阅之，畅快之至，感激不尽！[11]

可见在雍正帝意中，允禩杀与不杀，需出己断，但允祉作为众兄弟之长，明确表态要杀，是必须的，模棱两可就是党同包庇，后果自负。但是到雍正八年允祉获罪时，雍正帝却说：“（允祉）密折奏称：‘阿其

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12]翻云覆雨，以至于斯。

除了允禩等人的事让允祉提心吊胆外，雍正初年的清理国库亏空事件也涉及他。雍正帝即位以后，委托允祥把户部、会考府一肩挑，在中央地方各级衙门大搞清理亏空运动，整顿财政与整肃官吏相结合。康熙年间，允祉主持过很多重大文化活动，花钱不少，其中不乏账目混乱、经费腾挪之类的事。雍正帝即位之初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允禩集团，并不想太与允祉为难，所以分两次给予了他十五万两白银，做弥补亏空之用。但允祥与允祉本来矛盾很深，是以允祉三天两头受到户部或是本旗催债官员的骚扰，今天几百两，明天几千两，想必态度也不会十分恭敬。允祉对此很是不满，多次向雍正帝抱怨，后来也成为他“怨忿不平”的罪证。事实上，允祉与允祥的矛盾在雍正年间是比较公开化的。允祥在雍正朝是个大忙人，过于劳累以至于常常生病，雍正帝总是把这些事告诉允祉，念叨允祥如何辛苦，在家赋闲的允祉就表现得淡漠而不屑，“置若罔闻，总未一答”。失意者对得意者这样的态度，几乎是人的本能反应。得意者忙碌本是求仁得仁，硬要失意者由衷赞美，恐怕有些强人所难。

到雍正六年（1728年），允禩集团，以及年羹尧、隆科多等重要势力都被清算完毕，雍正皇帝大权独揽，对允祉这样二线竞争者的容忍度就变得越来越低了。当年二月，允祥领衔参奏允祉：“将伊应追诈赃之项妄渎圣聪，支离强辩。自称皇上之兄，狂肆无礼。又将办理公务之王、大臣痛加诃诋，毫无忌惮。悖理营私，罔顾大义，请敕下宗人府严加议处。”[13]事情的起因是允祉勒索王府属人苏克济银两，康熙年间这在诸皇子王公中是常态，雍正帝即位后，极力剥离诸王与所属外八旗旗人的主属关系，更不准许有要钱要物等勒索之事。是以这件事被管理镶蓝旗旗务的果郡王允礼抓住参奏，搞得允祉很是难堪，甚至当着雍正帝的面大骂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弟弟允礼，并自称“皇上之兄”，责难允礼办事刻薄，目无兄长。于是就有了允祥等人参劾之事。前面提到，雍正帝处理允禩集团时，允祥甚至没有公开表态，但在打击允祉时却亲自出马，足

见其力度之大。当年六月，经过宗人府议奏，允祉被从亲王降为郡王，撤去四个佐领，取消朝会入班的资格，其嫡长子弘晟更是被拿交宗人府，严行锁禁。在此期间，允礼被从果郡王晋封为果亲王，成为宗室中权势仅次于允祥的人物，这其中当有打击允祉有功的因素。

就在允祉被降爵的前几天，他和陈梦雷花费二十年心血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刻印完毕，进呈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按用纸的不同分为两个档次，高级的是棉纸书，共十九部；差一些的是竹纸书，共四十五部。棉纸书分别赏赐给了雍正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福惠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钟琪每人一部。竹纸书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诚亲王、恒亲王、咸福宫阿哥（康熙帝幼子）、元寿阿哥（弘历）、天申阿哥（弘昼）、励廷仪、史贻直、田文镜、孔毓珣、高其倬、李卫、王国栋、杨文乾、朱纲、嵇曾筠每人一部。雍正帝任命的总纂官蒋廷锡得到棉纸本，而允祉只得到竹纸本，已经获罪的陈梦雷更是无从谈及。两件事情叠加，对允祉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雍正六年九月，雍正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福惠夭折，雍正帝为之大办丧事，以亲王礼葬，而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未尝不是一时怨气所致。

雍正六年十一月，曾静案发，受到“弑兄屠弟”指责的雍正帝顾虑舆论影响，暂停了对允祉的打击，并于雍正八年二月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位。不过形势在当年夏天发生陡转。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去世，雍正帝本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到了非常糟糕的程度，允祥的丧仪规格远远超过一般的亲王，最重要的是，雍正帝专门派人到丧礼现场监督，用朝鲜人的话说：“皇帝于十三王之丧，哀恸非常。吊其丧，哀哭者增官，哭不哀者罚之云。”在身患重病到了要留遗嘱地步的雍正帝看来，敢在允祥的丧礼上表现出不恭敬、不哀痛的人，怕是自己死后也敢翻“变天账”吧。

其时正值炎夏，天气酷热，繁复的礼仪活动难免令人懈怠叫苦。但监督者的耳目无处不在，丧礼上王公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向雍正帝做出汇报，包括某人在聚集处躺卧、某人坐姿不雅、某人用帽子扇风、某人用了有花的垫子、某人迟到早退、某人违例剃头、某人送灵时没有步行而是骑了马，等等。[14]其中表现尤为怠慢的，像贝勒满都护等，都

被雍正帝公开点名痛斥。到五月十二日，总理丧仪的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抓到一条大鱼——联名参奏诚亲王允祉，说他“当皇上亲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迨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涕，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

雍正帝就此发布长篇上谕，历数允祉的罪过，不但包括他在允祥病逝一事上“以弟兄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深为庆幸”，还涉及此前数十年的种种“历史问题”，包括他在康熙年间如何觊觎储位，在雍正年间对允禩、允禟等人如何包庇纵容，对自己喜爱的皇子、大臣如何冷漠无礼，甚至连他从小被父皇养在宫外，“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这样不着边际的陈年旧事也牵扯出来。雍正帝在谕旨最后说：“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切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随后让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会议范围达到最高标准，拉开了对允祉进行彻底清算的架势。五月二十四日，诸王大臣议定允祉大罪十款，建议将其革退宗室，即行正法。雍正帝“从宽”改为革去亲王，拘禁景山永安亭。

允祉的罪名中，有许多条都和丧礼有关，包括年轻时在允祥生母敏妃丧期内剃头；雍正三年，在雍正帝宠妃、敦肃皇贵妃年氏治丧时推诿不到；雍正六年，在雍正帝爱子福惠夭亡后欣喜之色倍于平时；雍正八年，在怡亲王允祥的丧礼上迟到早退，无伤悼之情。除了敏妃一事时间较早外，其他三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第一，都与雍正帝最喜爱、看重的人有关。第二，三场丧礼都办得过于隆重，大大逾制。第三，去世的三个人无论政治地位如何，从儒家伦理角度讲，行辈都较允祉更低，让允祉以尊长身份披麻戴孝、哭天抢地，很是别扭。第四，三场丧礼的时间点都很敏感：年妃去世时，正是雍正帝大刀阔斧处理允禩集团的时节，亦是年妃之兄年羹尧解京受审之时；福惠去世，正值允祉自己获罪降爵，嫡子弘晟圈禁宗人府；而允祥病逝的前一个月，与允祉感情最好的康熙帝第七子淳亲王允祐刚刚病故，同为亲兄弟，身后礼遇差距过大，对允祉有很大触动。所以允祉的“习惯性临丧无状”，一则出于他对

雍正帝不满、对自身现状不满的自然流露；二则是雍正帝在这类人物丧礼上的监视尤为严密，异见者的一举一动会被随时报告。允祉在康熙帝、皇太后、废太子允礽，或是雍正年间其他高层人物的丧礼上未见类似举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雍正十年闰五月，允祉在景山永安亭病故，雍正帝的恻隐之心有所触动，命以郡王礼葬，封其庶子弘景为贝子，承继家业。雍正帝在解释圈禁理由时说："（允祉）自朕即位以来，屡次加恩，不知感激，时为开导，不知省悟，朕皆优容之。近年则强悍难制，渐无忌惮。"可见他以临丧无状为借口，不顾伦常和舆论压力，重处兄长允祉，与雍正八年允祥病逝、他自己病重的状态有很大关系。如果雍正帝本人身体健康，正常执政，政治手腕远不及他的允祉完全在可控范围内，实在谈不上什么"强悍难制"，而一旦考虑到自己年命不永，允祥已经去世，秘密储君弘历年仅二十岁、毫无政治经验等现实问题，允祉作为前皇位竞争者的"强悍难制"就被严重放大了，竟到了不圈禁不能安心的地步。

乾隆二年十二月，乾隆皇帝恢复了允祉"诚"字王号，赐谥"隐"，故史籍中称其为"多罗诚隐郡王"。

四

除了同辈兄弟外，雍正帝的打击范围还下移到年纪较大的子侄辈。康熙帝舐犊情深，对孙辈也颇为照顾，把许多皇孙养在宫中，待成年后亲自为他们张罗婚嫁事宜。像废太子的所有儿子，允禔之子弘昉，允祉之子弘晟、弘曦，胤禛之子弘时，允祺之子弘昇、弘晊、弘昂，允祐之子弘曙、弘晫，允禩之子弘旺，允禟之子弘晸，允禵之子弘明、弘春等，都曾“幼侍内廷御前”，经常见到祖父。乾隆帝即位后特别喜欢强调，自己在康熙六十一年受到皇祖父接见，并被带到宫中，交给宫妃照顾的光荣历史。其实这在皇孙当中实在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待遇，相反，他获得这一待遇的时间比许多堂兄弟都要晚，作为皇孙在宫中居住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而已。至于康熙帝因为喜欢弘历这个孙子，而传位其父雍亲王，恐怕就更谈不上了。乾隆帝将这件事作为自己即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广为传布，差可与雍正帝强调自己是孝懿皇后所养，却对众多兄弟都是孝懿皇后所养避而不谈一事相当。

康熙末年，几位年纪较长的皇孙已经有了爵位、职位或差事。如康熙五十七年允禵出征时，随行的有弘曙（允祐长子）、弘晊（允祺第二子）、弘曦（允祉第六子）三位皇孙，其中年纪最大的弘曙被任命为前锋统领；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允祉、允祺的继承人弘晟、弘昇，被封为亲王世子；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世子弘昇随雍亲王赴通州查看仓储，等等。

雍正帝即位之初，为了表现友爱之情，在尚未给自己皇子封爵的情况下，就给一些侄子封了爵位。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帝封废太子长子弘皙为理郡王，另外，允禩独子弘旺虽然年仅十四岁，没到封爵年龄，但也被给予贝勒头衔，以示优待；雍正元年正月，弘曙被封为淳郡王长子、允禵之子弘春被封为贝子；雍正元年四月，允祥之子弘昌被封为贝子。

清初的宗室爵位继承比较灵活，并不机械执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到康熙末雍正初，大多数王府已经开始自觉实践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以

上有爵皇孙中，弘晟、弘昇、弘曙、弘旺，都是本支大宗，即其父默认的爵位继承人，其中弘晟为嫡长子；弘晳、弘昇、弘曙、弘旺为侧室所生的庶长子，但其父并无嫡子在世。至于弘昌、弘春虽是长子，但其父另有嫡子，爵位是轮不上他们承袭的，所以另封贝子，单独立宗，而非封以亲王世子、郡王长子，作为父爵的候选人。

住在内廷的皇孙们人数众多、盘根错节，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既与父辈的亲疏远近有关，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康熙末年，这些人大多已经成年，对父辈的党争活动不但知根知底，且不少人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随着雍正年间政治形势的变化，皇孙们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些天然具有父爵继承权的皇孙们因为对宫廷斗争参与更深，且注定与自己父亲站在同一立场，而遭到雍正帝的厌恶，先后失去应有的政治地位。

最早被剥夺本支继承人身份的是允祉之子弘晟。雍正二年十一月，他因为讹诈银两而被革去世子，交其父看管；雍正六年，允祉被降为郡王，雍正帝认为允祉的罪行都是因为溺爱弘晟，听其拨弄所致，于是将弘晟改交宗人府拘禁；到雍正八年允祉获罪圈禁，弘晟也等而下之，改在宗人府严加拘禁。至于允祉一支，则改由对雍正帝“深为感激”的第七子弘景做继承人，封以贝子。

雍正四年，允禩、允禟被革除宗籍，其诸子也受到连累，一起从玉牒中除名。允禵待遇稍宽，保留宗籍，囚禁景山，其嫡子弘明和父亲关押在一起，没有人身自由；而屈从于雍正帝意旨，对父亲多有揭发的庶长子弘春则在雍正二年被革爵后，又于雍正四年被封为镇国公，回家居住。雍正六年，弘春晋封贝子，后又晋封贝勒、泰郡王，成为允禵一支的继承人。

雍正五年，在夺嫡斗争中一直保持中立的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两家飞来横祸。当年闰三月，一向较受重用的恒亲王允祺世子弘昇不知哪里得罪了他的四伯父，突然遭到雍正帝痛斥，说他“人甚下贱无耻，屡次教训不改”，不但免去了他办理旗务的差事，还将他的亲王世子爵位革去，交给其父严加管教。雍正十年，允祺病逝后，爵位改由次子弘晊承袭。雍正五年四月，允祐家的郡王长子弘曙（此时允祐已晋封亲王，然

而弘曙并未随父晋封，其爵位仍为郡王长子）也遭到“人甚愚昧，行止卑贱无耻”的斥责，随即被革去爵位，取而代之的是他年仅十六岁的六弟弘暻。对于继承人的骤然更换，允祺、允祐两个做父亲的，不但没有一点发言权，且不敢表露出丝毫不满，生怕像允祉那样，招来更严酷的打击。

与这些堂兄弟情形相似但命运更惨的，是雍正帝的皇三子弘时。雍正帝的嫡长子早夭，所余诸子中，侧妃李氏所生的第三子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是实际上的长子。康熙五十九年，同为亲王的允祉、允祺家都有一子被封为亲王世子，而弘时并未获封。这大概是因为他虽已超过十五岁的最低封爵年龄，但终究比弘晟、弘昇小很多的缘故。当然，也可能是不受祖父的喜欢，所以无封。雍正帝即位后，弘时升格为皇子，被分配了属人，但并未获得爵位。从雍正初年皇子们获得的待遇、赏赐来看，雍正帝对这个当时唯一成年的长子是比较冷落的，更没有立他为储君的意思。即便如此，这一阶段弘时的生活倒还平顺，偶尔也有“奉差”的机会，不出意外，平平安安做个王公，还是有指望的。

雍正三年以后，弘时的处境陡然糟糕起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作为长子的他，竟被子嗣并不充裕的父亲舍弃，过继给地位岌岌可危的八叔允禩为子。过继的时间节点和原因不见于雍正朝的官方文献，是事后被弟弟弘历说出来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下达谕旨，说：“从前三阿哥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皇考特加严惩，以教导朕兄弟等，使知儆戒。今三阿哥已故多年，朕念兄弟之谊，似应仍收入谱牒之内。着总理事务王大臣酌议具奏。”而以庄亲王允禄为首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回奏说：“查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庭，是以令为允禩之子。今允禩缘罪撤去黄带，玉牒内已除其名，弘时岂可不撤黄带？着即撤其黄带，交与允祹，令其约束养赡。”[15]可知弘时不但过继允禩为子，还跟着允禩一起被开除了宗籍，住在十二叔允祹家里。

弘时作为一个无权无爵的年轻皇子，能做出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到了要被剥夺宗室身份的程度？从一些残存的档案看，弘时当时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是向年羹尧借了一万两白银，后被乃父发觉。[16]皇子与身为统兵大将的外戚有金钱交易，当然是很忌讳的事，一定会惹得雍正帝大发雷霆，但这与过继允禩为子却没有什么逻辑关系。相对而言，学者

杨珍的推测就显得更为合理。她认为，弘时在雍正初年，一方面对自己受到的冷遇不满，一方面对八叔允禩等人的遭遇较为同情，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胸无城府，就不免要将这些情绪表露出来，引起父亲的厌恶。雍正三年春夏之间，雍正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允禩之子，这不仅是为“教导”其他皇子，更是为了警告仍“以允禩为屈抑”的王公大臣们：我连亲儿子都豁得出去，何况其他人呢？

我们在专讲胤禛的一节提到，胤禛与允禩从小一起长大，私人关系是很密切的，且府邸、别苑均为近邻，两家之间的走动自然要比别人更频繁。另外，胤禛子嗣凋零，弘时在自己家长期作为独子，八岁时才先后有了异母弟弘历、弘昼。相对而言，他和允禩、允禟的儿子弘旺、弘晸年龄更为接近，不论在宫中还是王府，都更适宜做童年的玩伴。二废太子后，胤禛因为有自立之心，而与允禩等人渐行渐远，但表面上是不动声色、一切如常的。对于胤禛的这些变化，身边多少老于宦海的成年人尚且不能体察，何况年少的弘时。所以当雍正帝骤然即位，又对允禩等人步步紧逼时，同样受到父亲冷待的弘时对时局迷惑不满，或是对叔父、堂兄弟报以朴素的同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虽然儒家有亲亲尊尊的要求，父子君臣之间的伦常大于一切，但人的感情毕竟是复杂且有惯性的，并非全受意识形态和现实权力的左右。弘时因为同情允禩等人而被乃父树成了靶子，不但过继给允禩为子，且将其逐出宗室，这在逻辑和情理上都是说得通的。

作为皇子，弘时原本在宫中领有月例银，本人及妻妾子女的生活开支有基本保障，被开除宗籍后，则丧失了生活来源，于是雍正帝命令十二阿哥允祹把他养在府中，进行约束。这样的做法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则允祹政治态度中立，虽然不讨雍正帝喜欢，被从郡王降成了公爵，但也并非允禩集团成员，且为人老实心态好，弘时交到他手上，既不会受到苛待，也不再有什么机会，大约可以过上平淡不受关注的生活。二则允祹当年已经四十来岁，但膝下无儿无女，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再有成年后代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了，把弘时交给他照顾，如果有一天能够“改过迁善”，恢复宗籍，或许还有将其出继允祹的可能，这对弘时来说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归宿。

然而开除宗籍的严厉处罚给弘时的刺激太过强烈，一年半后的雍正

五年八月，年仅二十四岁的弘时没有等到什么后续的“恩典”，就郁郁而终了。截至此时，包括雍正帝自己在内的康熙帝年长皇子，他们的嫡子、长子几乎都被“掐尖儿”，看起来只剩下允礽和允祥两支没有受到打击。

事实上，就连风光无尽的允祥，在这个问题上也敏感而谨慎。乾隆四年十月，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以“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被逮，其同党中有允祥两个儿子：贝勒弘昌和宁郡王弘晈。乾隆对涉案的堂兄弟们逐一痛斥，在提到弘昌时说：“弘昌秉性愚蠢，向来不知率教，伊父怡贤亲王奏请圈禁在家。后因伊父薨逝，蒙皇考降旨释放，及朕即位之初，加封贝勒，冀其自新。乃伊私与庄亲王允禄、弘皙、弘昇等交结往来，不守本分，情罪甚属可恶。”

允祥的嫡妃兆佳氏生育了很多子女，但长子弘昌却是侧妃所出，没有继承怡亲王爵位的可能。不过雍正帝即位之初，对弘昌很是看重，除了将他从优封为贝子外，还给他安排了不少祭祀、办事的机会，让他学习政务。雍正二年夏天，雍正帝让允祥带着自己的皇子弘历、弘昼、福惠前往木兰行猎，弘昌也随同前往。作为唯一的侄辈王公，弘昌沿途并未随父一起上折，而是率领同行的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侍卫等人上折请安，这或许是他正在侍卫处担任差事的缘故。雍正帝给弘昌等人的朱批语气亲切，勉励他们“为一群强健男儿，奋发向前”云云。[17]雍正元年，雍正帝破例把弘昌妻子的娘家从下五旗之一的镶白旗抬入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雍正三年七月，又额外赏赐弘昌包衣佐领、管领披甲。种种特恩，都是其他侄辈所没有的。可见直到允禩等人穷途末路之际，弘昌仍然处在明显的上升状态，二者之间应无关系。至于乾隆帝所说的，弘昌被允祥“奏请圈禁在家”，究竟发生在什么时间，圈禁原因是不见爱于雍正帝，还是父子之间的私人矛盾，目前未见明确记载，我们也很难揣测。允祥去世后，弘昌被雍正帝恢复了自由，乾隆初年由贝子晋封贝勒。

允祥去世时，还有两个嫡子在世，年纪较大的弘晈已经成婚有子，年纪较小的弘晓才八岁，能否长大成人尚未可知。虽然当时的爵位承袭还遗留了一些满洲传统，对嫡长子继承制执行并不特别严格，但允祥把赋予了很多政治内涵的世袭罔替爵位交给幼子承袭，恐怕还是出于一些

特殊的考虑——对年纪较大，与康熙末年宫廷生活有联系的儿子要求格外严格，不希望继承人过快接续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可能是允祥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出发点，也和雍正帝打击各府原定继承人的思路一脉相承。

如果把弘昌的在家圈禁也算进去，雍正年间完全没有受到压抑的年长皇孙，就剩下废太子允礽的继承人弘皙。也正是由于康熙、雍正两代君主的格外优容，总有人对弘皙的皇帝梦抱有幻想，认为清朝的皇位继承终将回到嫡长子继承制的“正途”。

乾隆帝即位之初，对雍正年间被打压的叔伯、兄弟表现出较宽容的姿态，如将允禩、允禟、弘时收入玉牒，允□、允禵恢复部分自由，允祉、弘明、弘昇等赐谥、复爵、复官。另外对雍正朝受益较多的允祥、允禄、允礼各支，乾隆帝也有进一步优待。这种宽容持续到乾隆四年，就被一场严重的政治大案打破了。这桩被称为“弘皙逆案”的政治事件，是康熙年间“九王夺嫡”掀起的最后波澜。

乾隆帝即位不久，重新起用被雍正帝剥夺了继承权的恒亲王长子弘昇，任命他为正黄旗都统。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弘昇被人告发夤缘结党，交宗人府审讯。随后，宗人府查出庄亲王允禄、理亲王弘皙、宁郡王弘晈、贝勒弘昌、贝子弘普几个重要近支王公，都与弘昇“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建议对他们分别予以惩处。针对宗人府的上奏，乾隆帝特别提到，在这几个人中，理亲王弘皙不但和几个堂弟结党、谄媚皇叔允禄，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但是考虑到他不轨的言行尚未暴露，所以暂且从轻处理，将他革去亲王爵位，仍在郑家庄居住。不过，一些重要证据很快被呈递给乾隆皇帝，一个名叫安泰的巫师供称，弘皙曾向他询问一些具有强烈谋逆意图的问题，比如：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等。同时宗人府还查出，弘皙在郑家庄的府邸仿照内务府规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有另立宫廷之意。所以在短短一个月内，弘皙的罪名就发生了质变，乾隆帝认为他的大逆之迹已经非常明显，比当年允禩、允禟的罪行还要恶劣，是以惩罚措施也仿照二人，给予圈禁景山、削除宗籍和更改本名的重处。

至于庄亲王等人，乾隆帝并没有把他们和谋逆的事情关联在一起，只是治以“私相交结”之罪。其中弘昇定罪最重，拟永远圈禁，但过几年又放了出来，乾隆十八年还担任了领侍卫内大臣一职，去世时以贝勒品级殡葬，赐谥恭恪。相比弘昇，乾隆帝对允祥长子弘昌的反感更长久。弘皙案中，弘昌被革去贝勒爵位，处分不如弘昇的圈禁重，但终其一生都只是闲散宗室身份，乾隆三十六年去世时，也没有获得追赠的爵位和谥号。庄亲王允禄和其子弘普的处罚则相对较轻：允禄被免去亲王双俸的优待，并免去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的差遣；弘普是允禄长子，他虽然因为弘皙案被革去了贝子爵位，但当月就被复封为镇国公，相当于只降一级，去世后追封世子，谥恭勤。至于弘晈，考虑到他的郡王爵位是先帝特赐，不便降革，所以只是停发俸禄，几年后予以恢复。按照雍正帝在允祥去世时的说法，弘晈的宁郡王爵位本应作世袭罔替，而乾隆二十九年弘晈去世后，其子永福仅以贝勒降袭，这一安排虽未必与弘皙案直接相关，但乾隆帝对允祥一系的芥蒂之心亦可概见。

弘皙案中，允禄是唯一的皇叔辈宗室成员，作为康熙帝诸子中排行较为靠后的十六皇子，他不但没有参与康熙朝的夺嫡斗争，还与四哥胤禛有较融洽的私人关系。雍正帝即位后，将允禄出继给世袭罔替的庄亲王支系，使其不但获得铁帽子亲王的高爵，还继承了一大笔王府家产，实惠得令人嫉妒。不过允禄其人虽然精数学、通乐律，又擅长骑射，但行政能力较弱，为人也胆小怕事，所以他虽然年纪、爵位，特别是与雍正帝的旧交都优于弟弟允礼，实际的权势却始终不及。雍正帝病危时，命允禄、允礼为嗣君总理事务。乾隆三年初，体弱多病的允礼去世，允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了近支宗室第一人，故此暂把谨小慎微的性格放在一边，开始享受子侄们的围绕奉承，利用掌管宗人府、内务府的身份，替他们行些办事的方便。弘皙案中所谓众人对允禄的“群相趋奉”“谄媚为事”，也就仅限于此。允禄的长子弘普，则因为做了父亲和堂兄弟们交往的联络人，受到案件牵连。

至于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人的结党，很大程度上与雍正年间各王府嫡、长继承人被刻意压制的历史积怨有关，此外允祥与废太子允礽原本的特殊关系，也对下一代的社交选择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乾隆初年，年轻的新君解除了雍正年间的高压控制，对叔伯、堂兄弟们示以

柔仁，这让许多引而不发的矛盾重新暴露出来。事实上，康熙年间的九王夺嫡，以及雍正年间的伦常惨变，都可以归结为汉家嫡长子继承制与满洲传统择贤推举制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洲上层汉化程度的深入，嫡长子应具有优先继承权这一观念的认同度变得越来越高，乾隆皇帝虽然只是雍正帝的庶子，但他本人对此亦有强烈的执念。乾隆三年十月，乾隆帝嫡子永琏夭折，他即向允禄等人告知，自己已从正大光明匾后撤出立储密旨，储位宣告空虚，这让一向以“旧东宫嫡子”自居的弘晳再次看到“升腾”的曙光。只是当时的乾隆皇帝正值英年，身体也很强健，弘晳的想法未免过于空中楼阁了。

随着弘晳案的迅速平息，这场持续三十多年，涉及两代皇室成员的夺嫡斗争终于烟消云散了。作为与祖父同样子女众多、得享高寿的君主，乾隆帝充分吸取祖父在皇子教育、择立储君方面的教训，一方面秘密立储，取消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储权；一方面对皇子、皇孙施以严格的儒家教育，极力压制他们的政治追求，并切断其结交王公百官的一切途径，严防大权旁落。残酷的储位竞争就此终结，当然，清初宫廷中固有的锐意进取、野心勃勃的皇室精神，也随之消失了。

[1]朝鲜《承政院日记》，乙巳十月初五日条，即雍正三年十月初五日。

[2]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上谕，《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1册，第188页、189页。

[3]胤禛：《和硕怡贤亲王祭文》，《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

[4]《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5]《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6]《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7]允禟满文书信，雍正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弘旸满文书信，雍正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文献丛编》第2辑，允禩允禟案（李绂奏），第53、54页。

[10]允禵满文奏折，雍正朝（无具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转引自杨珍《满文密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版。

[12]《雍正朝起居注册》第5册，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

[13]《雍正朝起居注册》第3册，雍正六年二月初二日。

[14]《赛音图等奏参失礼王大臣等事折》，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二十二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79页、1980页。

[15]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6辑，第291—292页。

[16]杭州将军年羹尧奏遵旨回明馈送三阿哥银两情形折，雍正三年八月初三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第673页。

[17]贝子弘昌等奏，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885页。

雍正王朝的压力与动力

最后，我们来说说后夺嫡时代的雍正王朝与雍正皇帝。四十五岁的雍正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秩序大体稳定但内部矛盾重重的政权。秩序的稳定当然是相对顺治和康熙中前期而言，换言之，这时候的清王朝已经步入承平之世，大规模的战争杀伐不在雍正帝的议事日程上。当然，和康熙皇帝一样，作为满洲君主，关于清王朝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仍然时常萦绕在雍正帝心里，不过在他即位之初，这种焦虑暂时退到了第二位，“夺嫡后遗症”才是他的心头大患——他在宗室、八旗上层的支持者太少、反对派太多了。雍正帝对诸王大臣表示：“昔圣祖尝言满洲、蒙古易治，惟汉人众广，似稍难治。至朕今日观之，汉人虽众广，犹属易治，惟朕之兄弟中数人，实最为难治也。”可见其矛盾之最核心者。

为了尽快确立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以示后继有人，特别是吸取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教训，打击允禩等人伺机再起的野心，雍正帝在即位不到一年，身体还非常健康的情况下，就明确了新的立储方式，并公之于众。这一天是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恰好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遗体运往景陵安葬的前一天。按照常理，太后梓宫发引这样的大事，一定要做非常复杂的准备工作，临行前一天，包括皇帝在内的各色人等都处在忙碌筹备的状态。挑选这一看似仓促的时间点，召集群臣面谕立储大事，很可能有一个非事情本身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或许跟太后的去世或遗愿有关，也可能是次日前往景陵送葬的活动有一定风险性——为了防止皇帝出京期间“诸王心变”，不如提前密立储君为是。康熙年间的很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皇帝离京巡行途中，雍正初年政治诡谲、人心浮动，雍正帝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其预事周备、密不透风的表现。

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八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帝把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还有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一干人等，召到乾清宫西暖阁，说：先帝选中朕克承大统，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宾天当日“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

计”，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这样的智识和福气是朕远远不能企及的……当年因为二阿哥的事，圣祖心力交瘁，朕的皇子们都还年幼，按理说立储这件事应该审慎办理，不适宜现在就举行。但是既然圣祖把大位交给朕，朕就不能不预先为之筹划。所以“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就是说：皇子们都还年幼，本来不宜立储，但为了防止意外，我姑且先写一个名字放在里面，让大家都知道，行不行可以慢慢再考察。

雍正帝发表了这一通感言后，很客气地让“诸王大臣共议之”，仿佛还有讨论可行性的余地似的。但未等旁人开口，隆科多即率众表态说：“圣祖皇帝恩待群臣如子若孙，皇上缵承大统，诸臣莫不以事圣祖之心事皇上。圣虑周详，为国家大计发明旨，臣下但知天经地义者，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哪个人还敢“共议之”？于是“诸王、大臣、九卿等皆免冠叩首”，诺诺应声而已。事实上，隆科多在总理事务王大臣中仅排名第四，在这样的重大政务场合中，他越过排名靠前的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抢先发言，按照当时的说法，被称为“越次奏对”，是很不符合朝廷礼仪的，想必现场也令人侧目。隆科多之所以敢于如此，是他行事跋扈，遇事逞强，而不把允禩放在眼里，还是事先与雍正帝有所沟通，专门要在现场起带头作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群臣在隆科多的带领下俯首称是，雍正即表示“朕心深为悦慰”。他随即命群臣退出，只留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现场监督，而后让人将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皇位继承制度改革，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完成了，所谓独裁君主的“乾纲独断”，莫过于此。

单以清初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以康熙中后期尖锐的君储矛盾引发诸王夺嫡、政局混乱这一具体背景看，雍正帝的秘密立储设计，确实为解决现实困境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案。首先，不公开确立太子，使群臣不必有效忠今上还是效忠储君的困惑，有利于实现权不分理，君主独裁。第二，调和了立嫡长与立贤能之间的矛盾，嫡长子虽然在继承次序上仍具有优势，但已非天然的皇位继承人，皇帝可以根据诸子的实际情况予

以选择。第三，择储之权全在皇帝，群臣不再有参与表达意见的机会，众多皇子想要争取储位，只需取悦父皇，而不必各自争取王公百官宦寺等群体的支持，由皇位继承引起的兄弟相残和派系党争可以熄灭。第四，被密立的储君如果中途去世，抑或出现身体、精神、品行、才智上的变化，不再宜于储位，或是有更合适的人选胜过前者，皇帝一旨密诏，就可不动声色地更换储君人选，而不至于引起舆论争议乃至朝局动荡。第五，储君人选虽不公开，但将密立诏书之事提前公开，万一当朝皇帝死得突然，其遗愿的贯彻具有制度保障，避免出现“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或是权臣一手遮天拥立新君的状况。

虽然确实有助于解决现实困境，但秘密立储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将作为“天下之公”的储副之位与择储大事，完全置于皇帝一人之手，行于密室之中，藏于匾额之后，而彻底脱离公开的讨论与监督，这样的储君人选不但合法性有待考量，其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如果当朝皇帝执迷于私心私情，或是为人所挟制，而秘密择立不适合即位的皇子为储君，那么群臣甚至连“争国本”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面对既成事实。其代价与群雄逐鹿、诸子党争相比，孰轻孰重，也未可知。当然，一代人先要解决一代人的问题，雍正帝面临的状况如此，我们作为后来的旁观者，亦不能求全责备。

除了完成皇位继承制度改革之外，面对后夺嫡时代的压力，雍正帝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巩固皇位。其中，他自己最看重的一点是用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治天下，莫大于用人、理财二端。理财一事自应付之臣下，至用人之权不可旁落。”为了稳住允禩集团，雍正帝即位之初，尚对那些康熙年间的既得利益者委以重任，不过他显然不甘心如此，局面稍稳后，即开始通过肃清朋党、清理库帑等政治、经济手段打击先朝旧臣，其中涉及的主要是八旗上层，特别是满人大臣、官员，以及内务府系统的实权官员。以当时人，特别是康熙朝旧人的感官来看，除了允祥、隆科多等极少数新君亲信外，传统的宗室、满洲势力，在雍正初年大有弱化、边缘化的趋势，代之而起的是年羹尧这样的汉军旗人，或是张廷玉、蒋廷锡、岳钟琪等汉人文武。譬如允禵任大将军时的属下、将军宗扎布就对人抱怨：“而今之世，满洲、蒙古断难兴盛。凡辅政大臣，皆为汉军、汉人，故汉军、汉人必兴盛。”[1]对于这样的说法，雍正帝

断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在私下里也曾对亲信坦言：“近日廊庙中颇乏卿贰满臣。”

在会考府和户部大搞清查审计的怡亲王允祥多次秘密建议雍正帝收缩打击范围，不要动不动对亏空官员“着落家产赔补”，另外那些赔不出钱的死硬分子“俱系在旗满洲”，即便把他们从重治罪，对国家财政也于事无补，不如用户部原有的灰色收入替他们顶上，这些人革职回家也就罢了。雍正帝毫无通融余地，恶狠狠批曰：“老人亦不知羞”“欠朕二三百万两银子，奏请欲以将来余平饭银分十五年陆续代为完补，先前那些大臣官员的亏空还未清楚，若令伊等脱然事外，国法安在？断乎不可！”[2]态度之强硬，让具体做事的允祥很是难办，多次提醒他：“皇上用法稍觉严厉。”

除了康熙朝的“满洲旧人”外，正如前面也提到的，雍正帝对自己的藩邸旧人如戴铎等，也大多不予重用，甚至刻意压制，转而破格提拔一些在康熙朝名位不显，与自己和各皇子势力都无关系的中青年才俊。当然，这样的人总要通过一定途径才能进入皇帝的视野，在雍正初年，这样的途径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大兴举荐，即命令诸王大臣、文武官员都上折推荐人才，哪怕是亲戚朋友也无不可。当然，同样是举荐人才，举荐人的身份格外关键。雍正初年，允祥、隆科多、年羹尧是雍正帝最重用亲信之人，他们所举荐的人，往往会得到格外重用，譬如雍正朝三大总督中的两位：鄂尔泰、李卫。其中鄂尔泰是满洲人，举人出身，在康熙年间沉沦下僚到四十几岁，雍正帝即位后，经年羹尧、隆科多分别举荐，从内务府员外郎，直接升任赋税之薮的苏州布政使，三四年间即开府西南，成为后来“改土归流”大政的实际主持者。李卫来自徐州豪族，捐纳出身，康熙末年任户部郎中。允祥接手户部后，对李卫大加赏识，并推荐给雍正帝，李卫随即被任命为云南驿传道，雍正三年升任浙江巡抚。当然，被允祥推荐的也就罢了，如果是年羹尧、隆科多所荐，到二人背运时，就要及时与之划清界限，否则难免忽显忽败的结局，像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诺敏，就都是如此。

第二是从科举考试中迅速提拔新人。清代中期名臣如尹继善、陈宏

谋、汪由敦、刘统勋等，均出自雍正元年、二年会试，并在雍正年间得到快速升迁。其中尹继善作为满洲才俊，尤其受到雍正帝的特殊提拔，雍正元年中进士后，先以翰林身份被派到允祥身边学习政务，随后扶摇直上，六年成巡抚，八年成总督。雍正帝向年轻的尹继善感慨：满臣中人才太少，你应该时时自勉，成为千万年第一等人物。

第三是通过一些特殊的事件、机缘，了解中下级官员。比如三大总督中的田文镜，是汉军旗人，监生出身，雍正帝即位时他已经六十出头，尚任内阁侍读学士。因为奉命前往西岳祭祀的途中，揭发了匿灾不报的山西巡抚德音，仕途已经望到头的田文镜忽然博得新君赏识，直接被提拔为山西布政使，次年升任河南巡抚，而后虽然屡遭弹劾，始终屹立不倒。此外，像乾隆年间的重臣孙嘉淦，在雍正初年任翰林时，曾有“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之奏，雍正帝欣赏他的耿直大胆，很快任以卿贰之职。

总而言之，在潜邸时寡于结交、缺乏支持者的雍正帝，即位后反而没有什么人情包袱。他一面通过强权手段打击康熙旧臣，特别是宗室王公、外戚权贵；一面不遗余力提拔新生力量，培植亲信。特别是在八旗、满洲内部，他迅速重用像鄂尔泰、尹继善这样出身并非显贵，而汉化程度极高的科举精英，令其取代老牌的外戚、勋贵，掌握内外实权。如果说八旗组织在康熙年间尚有君主与贵族共治的味道，那么雍正皇帝则彻底将清王朝改造成为君主独裁下的官僚政治，诸王、外戚、勋贵人等，如果没有职官头衔，就只能坐享大俸，对政治全无影响；如果出任职官，或者承担差遣，所具有的身份也几乎与一般满汉臣僚无异了。

雍正帝用人除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外，另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凡是他特别倚重或寄予厚望的大臣、官员，无论满汉，都着力与之培养私人感情，希望在君臣关系之外，营造亦家人亦师友的相处模式，甚至时常表现得过于亲昵轻佻，毫不顾忌身为君主的权威性与神秘感。如果一朝反目，又视若寇仇，实在令人难以琢磨。另外，雍正帝对“朋党”极为反感，无论早期的皇子朋党、还是中期的科甲朋党，都让他难以容忍。不过，打击科甲朋党并非由于讨厌科举出身的人，雍正帝本人的汉文化水平很高，亦崇尚文治，中枢汉臣大多科甲高第。

当然，我们说满汉矛盾的暂时淡化，是在夺嫡背景下而言，要让满洲统治者把小民族统治大国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放下，也实在没那么容易。朝鲜使清译官曾记下一段雍正六年的清宫议政场景：

> 皇上大笑云："人岂有千百岁在生之理。今年仓（昌）平州掘碑一座，碑上诗语，朕甚不解，未知是何应兆。欲将明年七月起，不必写出年号，只写己酉、庚戌、辛亥。尔等详议，传示各衙门知之。"钦此。十三王等回奏："皇上以孝治天下，仁德化民心，虽古圣贤君，无以复加。况我朝定鼎以来，四民咸服，五谷丰登，皆天赋久祚于大清。碑文解语，何足凭信。若据碑上之诗，不写年号，一若外扬，反为惶惑。若有借俸一二年者，可只写年分，不写年号。其现年历日文书稿案，仍照旧例。至于各衙门启奏事内有字眼不好者，请为改正。即如'年终尽数'四字，以臣愚见，改为'岁底全数'，未知可否，伏乞圣裁。"奉旨："甚是。'年终'改为'岁底'，'尽数'改为'全数'，传示各衙门知道。"钦此。[3]

是说雍正六年在北京附近的昌平州发掘出一块石碑，上有谶语。雍正帝因此心生疑窦，欲在正规文件中停用雍正年号，改以干支纪年。其事可在雍正朝《起居注》中找到对应内容，当非朝鲜人虚谤。所谓碑文谶语，是为雍正帝陵寝选址的官员偶然发现的，传为刘伯温所立，上有八句联语："红花落尽放黄花，遍地胡儿乱似麻。东来西去归藏土，南上北下返牛家。七九之年虎哺兔，一人骑马踢双猢。八六家鸡夜宿粮，十个孩儿九哭娘。"所示无外乎"胡无百年运"之类。这样的事情在康熙年间也多次出现，如康熙帝见《推背图》有"胡人二八秋"之语，就求仙问卜，得到的解释是："不用修来不用修，谁识胡人二八秋。红花落尽黄花发，五月干戈八月休。"康熙帝为求心安，只好颁布了一系列省刑薄税的惠政，听从天命而已。因为谶语而停用年号是一件大事，关系到政权正统性的象征，雍正帝虽然有此意愿，但允祥等亲信重臣都不赞同，认为"一若外扬，反为惶惑"。雍正帝最终俯从众意，没有把这件事闹大，但他对这一问题的焦虑，和父亲康熙帝是一以贯之的。

同样是在雍正六年，著名的曾静案爆发，一个一文不名的湖南山野书生，竟然想到派学生到西安策反世代在清朝担任高官的大将岳钟琪，

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曾静对政权的认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坚信“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清政权以夷变夏，翻覆乾坤，应该将其推翻，岳钟琪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后人，应该担当起这样的大任；二是听了允禩等人的流放侍从的话，认为当今皇帝是谋父逼母的暴君，对岳钟琪等人也一定很坏，清王朝由他统治，是末运将至，可以将其推翻。

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让雍正帝对统治合法性的双重压力变得更为敏感，加上自尊好辩的性格，促使他必须对此有所表示，那部著名的《大义觉迷录》就此诞生。另外，雍正帝不但不杀曾静，还让他到各地巡回演讲，现身说法宣传《大义觉迷录》，以求获得汉人士子百姓的同情与认可。

除了亲自进行意识形态解说与宣传外，雍正帝也和乃父一样，在省刑薄赋上做文章，力求在一些普通民众特别关心的问题上表现得更好，来抵消自己在合法性上的先天劣势。所以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把赋税的均平、司法的公正，都拔到很高的位置，不仅仅视其为技术性的政府职能，而是直接和政权合法性挂钩。不过就康、雍两代君主相比较而言，康熙皇帝整体来说是一个不太善于搞内政建设的君主，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稳定战乱之后的社会秩序，以及处理民族关系，巩固边疆等方面；就性格而言，也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人，带有北方民族雄主中多见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承平之世的国家内政，特别是制度建设这样的精细工作，他是不大耐烦做的。

比如在慎刑问题上，康熙和雍正两个皇帝都非常重视，认为这是一个宣扬清朝仁政形象的重要切入点，但是两个人的做法很不一样。康熙皇帝的做法是长期不举行秋审勾决，并经常搞大赦，从绝对数量上少杀人。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确实应该免死，他基本不予考虑。于是康熙年间就有很多按照律例应该处死的重刑犯被一直关在监狱里，各地监狱人满为患，在当时的监狱管理和卫生条件下，霸凌或传染病丛生，一些轻刑犯反而枉死。康熙帝的举措，可谓有善的初衷却没有得到善的结果。

雍正皇帝在内政方面并不推崇他的父亲，甚至有些轻视，比如他多次向大臣说“朕并非八岁登基之主”，以示自己社会经验丰富，并非乃父那样自幼高居九重，容易被臣下蒙蔽。当然，在制度建设上，雍正帝确

实比他父亲高明得多。对慎刑一事，雍正帝也极为重视，他说，“刑名关系民命最为要紧，较吏部、户部更甚。吏部误用一人，不过以应得官之人略早用几日耳。户部之误在于钱粮，一经知觉即可改正。至于刑部之误，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把司法公正置于很高的地位。不过雍正帝同时意识到，过多的赦典，不举行秋审，或是秋审尺度过宽，都不能帮助政府和君主在百姓的朴素正义观中树立起“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正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负面作用。

所以在慎刑问题上，雍正帝更看重刑部的体制、机制改革。他即位伊始就不满意刑部作为“天下刑名之总汇”的工作水准——当然，这很可能跟当时的刑部满尚书是允禩党主要成员阿尔松阿有关。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帝连续三次召集刑部所有的堂、司官员到养心殿，听他当面训话，随后让这些人各写一份奏折，自述履历，针对本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刑部的中低级官员，平时没机会单独给皇帝上奏折，要他们每个人轮番上折，征求意见的范围不可谓不广。雍正十一年，刑部着了一场大火，管理京城治安的九门提督带人救火，却发现当时虽然已经到了工作时间，但刑部大小官员大多都还没到岗，所以内部没人组织救火，火势蔓延，把档房都给烧毁了。雍正帝再次对刑部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刑部各官以及都察院科道官，都要对该部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随班据实陈奏”。这两次征集的各方意见，有一部分被雍正皇帝接纳并实践起来，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其中如优化刑部官员来源，延长司官任职时间，改变堂司、官吏权力结构，改革监狱管理制度等措施，都为刑部官员积极读律、执法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学习氛围，对乾嘉时期刑部突飞猛进的专业化进程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清人说：“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在“刑狱平”问题上，雍正帝应推首功。

至于轻徭薄赋、加惠民生方面，雍正时期也有不少具有可持续价值的善政出台，比如降低“苏松重赋”，限制火耗加派，兴修农田水利，制定水旱灾害分等勘察、救济的实施细则，等等。与权力斗争中的翻云覆雨、酷烈多疑不同，制度建设中的雍正皇帝是较为理性、务实，而能接受不同意见的。比如鄂尔泰在担任苏州布政使时，针对苏南地区的特殊情况，对统一实施耗羡归公有所异议，雍正帝并没有因此给他扣上拒不

执行朝廷大政方针的帽子，反而更加赏识、重用。

支持“篡位说”的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这样评价雍正皇帝：“惟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意思是说雍正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很有天赋，爱好美名，励精图治，于国家是有功绩的。老天爷厚爱清王朝，让皇位落到此人手中。虽然他即位的合法性很可疑，但也不失为像唐太宗那样靠非法手段获取皇位，却能遵循道义治理国家的君主。

雍正皇帝到底算不算“逆取”，学者们的理解始终有较大差别，但对其“顺守”的看法，近几十年来则日趋一致。雍正皇帝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政治天赋和政治追求的君主，在某些领域还超过他的父亲。他执政的时间不太长，只有十三年，但治绩是可圈可点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大可不必为专制君主的勤勉与辛劳唱赞歌，那不过是伴随着成王败寇剧情的、无尽权欲下的求仁得仁。

[1]安双成译：《宗扎布案满文译稿》，第14页。

[2]雍正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和硕怡亲王允祥奏请展限以完部积陈案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4页。雍正二年四月十四日，《总理户部三库事务和硕怡亲王允祥奏》，《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789页。

[3]《同文会考补编》卷四，《使臣别单·宪书赍咨官卞昌和手本》，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后记
众说纷纭论夺嫡

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以来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分为矫诏篡位和合法继位两种看法。

其中，矫诏篡位说的奠基之作是孟森先生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该文辨析了《清实录》《东华录》《大义觉迷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等史料对雍正帝承统情形记录中的抵牾，指出官方记述中的疑点，继而对年羹尧、隆科多二人在雍正继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二人获罪过程进行分析，指出允禵才是简在帝心的皇储人选，再以《大义觉迷录》中所载之民间传闻作为旁证，提出雍正帝之承统，实出于矫诏。

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继承发展，后来者如王锺翰先生认为康熙帝一废太子后，曾有意立允禩为储君，但马齐、佟国维等大臣为支持允禩而极力铺谋设计，令康熙帝深为忧惧，唯恐允禩与其支持者结成党羽而导致皇权旁落，甚至兴兵构难，逼迫逊位，因此放弃立允禩为储的想法。皇四子胤禛在潜邸时即“潜萌希冀，预谋攘夺”，为此暗中结党邀名，特别是其与隆科多、年羹尧二人交结。隆科多榻前受命，口衔天宪，且身膺禁卫；年羹尧则凭借手中兵权在西北挟制允禵，使雍正得以安然绍承大宝。雍正帝继位后篡改遗诏，诛戮诸弟及年、隆等人，以此掩盖其图谋篡夺帝位的真相。按照王锺翰的观点，康熙在二废太子后虽未再度立储，而实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令允禵西征是欲其仿效“重耳在外而安”故事，建立勋业，树立权威，以便来日继承大统。不料允禵受制于年羹尧，最终错失大位。目前所见的康熙遗诏实是胤禛根据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增删改写而成，非但不能作为其合法继位的证据，反而是雍正伪造遗诏并借此篡位的历史文献物证。

金承艺认为皇十四子允禵受到父皇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实是康熙

帝属意的继承人。且康熙帝曾在去世前急诏允禵返京以托付后事，唯允禵未能赶及，而铸成大错。金承艺还提出，雍正帝原名不叫胤禛，他通过霸占皇十四子胤祯的名讳，篡改原本传位于胤祯的遗诏而继位。继位后，为掩盖真相、毁灭证据，特意将胤祯改名允禵，并有收缴内外文武大臣官员所留圣祖朱批谕旨、磨毁载有胤祯事迹的西征纪功碑文等举动。雍正年间，隆科多因私藏玉牒获罪，即是其欲留下自己协助雍正帝篡夺大统的证据而遭灭口。

杨珍认为康熙帝选中的继承人实是皇十四子允禵，而被胤禛矫诏篡立，因此《实录》等官书及雍正帝本人关于康熙末命情形的叙述多有出入，无法自圆其说。杨珍更进一步指出，康熙帝晚年曾有秘密建储的打算，并已选定允禵为继承人，但由于对秘密建储的想法和理解存在不断发展的渐进过程，故而犹豫而未及施行。康熙帝的猝死，导致允禵未能成功继位，皇位被胤禛串通隆科多、伪造遗命夺得。

持篡位说的学者人数较多，除以上四位学者外，还有戴逸、许曾重、梁希哲、陈捷先、庄吉发、罗冬阳、金恒源、林乾等。

与矫诏篡位说相对，也有一些学者持合法继位说，代表人物如冯尔康、杨启樵、史松、吴秀良、白新良、郭成康、董建中等，他们认为雍正帝确系康熙帝选中的皇位继承人。如冯尔康、杨启樵二位均以批驳立论，对“篡位说”学者的观点、论据进行反驳，如提出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令其西征，虽体现了对允禵的重视，但并不能将之与选定他为储君挂钩；从现存《玉牒》等档案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盗名改诏的可能，传位诏书非由老皇帝亲书而是由嗣皇帝制作乃是惯常做法等。至于年羹尧、隆科多二人之获罪，与他们协助雍正篡位无关，也并非杀人灭口，只是由于他们跋扈擅权、妨碍皇权的缘故。

主张合法继位说的学者在论述胤禛被康熙帝选中作为皇位继承人时，多从其自身才能与康熙帝晚年对他的态度着手，看法较为一致，但在分析康熙是否属意于允禵的问题上则观点不一：史松认为康熙帝令允禵出征是为了分化允禩党人，进而为嗣君胤禛顺利继位提供有利条件；杨启樵则认为康熙帝对胤禛、允禵二人都很赏识，并期望允禵能在胤禛继统后担任辅弼重任；郭成康认为康熙帝属意胤禛所生的皇孙弘历，爱

屋及乌，遂立胤禛为嗣；等等。

在学界争论以外，康熙末年皇子夺嫡的话题也通过文学、影视作品走进大众视野。尤其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雍正王朝》走红后，衍生出一系列“九王夺嫡”题材的穿越小说与影视作品。已经去世两百多年的“康熙皇帝的儿子们”，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忽然迎来无数跨越时空的“粉丝”，粉丝们各执一词，就这一话题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探讨与争论。

粉丝们先通过小说和影视剧接触历史，因为对某一个或几个人物产生兴趣，而加入互联网讨论。兴致盎然且具有一定文献搜集能力的粉丝在加入讨论后，往往通过查阅史料和辨析学者观点，对康雍史事，特别是康熙末、雍正初的宫廷斗争做进一步了解，最后在互联网公共媒体上形成并阐发个人观点。与专业领域的问题导向和学术批判不同，粉丝们大多以人物为着眼点，形成话题圈子，进而在圈子内部形成问题关注、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共识。比如雍正皇帝的粉丝大多主张他是承康熙旨意合法继位，而允禩、允禵等人的粉丝则认为雍正继位的过程疑点重重，皇位极有可能是篡夺而来的；废太子允礽退出政治舞台较早，他的粉丝对雍正如何即位也兴趣不大，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允礽与康熙帝的父子关系、与其他皇子的兄弟关系，以及两废太子的原因与经过；允祥的粉丝则更多讨论其在康熙朝的处境变化、与雍正帝的关系，以及在雍正朝的地位、政绩等等。

完全基于个人爱好与情感投射的“粉丝式研究”中不乏高手，特别是在挖地三尺找材料方面，往往不输于学院派研究者。是以专业学者如杨启樵等，亦对相关网络讨论予以关注，并在个人专著中做出回应与肯定。不过，“粉丝式研究”在史料挖掘和问题选取方面，有较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且以个人好恶为出发点，致力于从反对者的表述中寻找漏洞，推翻其观点，对所用史料的原始性、可靠性论证相对缺乏，有时亦难免情绪化的倾向。

总而言之，有关康熙末年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问题已经跨出学界范畴，成为高热度、开放性的社会话题。因此，本书的撰写，除了从专业视角加以考量，寓学术问题的辨析、批评于行文叙事之中，还加入了

对文学、影视剧流行说法的解读，以及对人物“粉丝”、普通读者兴趣点的反馈，希望借此架起学术研究与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

附录1
夺嫡大事记

康熙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皇长子允禔生。

康熙十三年五月三日，皇次子允礽生，皇后赫舍里氏崩于坤宁宫。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册立皇次子允礽为皇太子。

康熙十六年二月二十日，皇三子允祉生。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皇四子胤禛生。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日，皇八子允禩生。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皇九子允禟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皇十子允□生。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皇十三子允祥生。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允禵生。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初二，以噶尔丹深入乌珠穆沁地，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为副将军，出古北口。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参赞军务。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以皇长子允禔与大将军福全不相和谐，命其撤回京师。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皇帝亲征准部，皇子允禔、允祉、胤禛、允祺、允祐从征。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亲征期间，命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

奏，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亲征回銮，命皇长子允禔于大军后沿途稽查。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以膳房人花喇、额楚、哈哈珠子德住、茶房人雅头等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将花喇、德住、雅头处死，额楚圈禁。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册封皇长子允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允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俱为多罗贝勒。

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命直郡王允禔带领八旗官兵挑浚永定河河工。

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以敏妃丧满未百日，诚郡王允祉并不请旨即行剃头，降为贝勒。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初五日，皇太子允礽于南巡途中患病，住德州行宫，召索额图前来侍奉。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初七日，命皇十三子允祥祭泰山。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以索额图心怀怨尤，结党妄行，交宗人府拘禁，后被处死。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召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齐集行宫前，称允礽荼毒在廷诸王大臣，专擅威权，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将允礽即行拘执，由直郡王允禔看管，回京后即将其废斥；皇十三子允祥另有处置。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七日，命贝勒允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事。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谕大臣官员等，近观允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似有鬼附体。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到京后命贝勒胤禛与直郡王允禔一同看守允礽。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十八日，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废皇太子允礽，幽禁咸安宫。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以废皇太子允礽颁诏天下。内称其：自诸王以及大臣官员悉被非礼凌辱，横加捶挞。向因索额图、常泰交通设谋，朕洞觉其情，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忿于心。近复有逼近幔城，裂缝窥伺，中怀叵测之状。凡此举动，类为鬼物所凭，狂易成疾。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因拘禁允礽时，允禔奏“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贵。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斥允禔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洵为乱臣贼子，天理国法皆所不容。当日命刑部、都察院大臣捉拿张明德审办。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谕诸皇子安静守分，各属下人勿令生事。同日，责八贝勒允禩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故人皆称之。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诸皇子，以八阿哥允禩邀结党羽，谋害允礽，着将允禩锁拿，交议政处审理。皇十四子允禵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上出所佩刀欲斩之。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二日，以允禩闻张明德妄言不奏闻，革去贝勒，张明德凌迟处死。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初四日，上谕诸皇子、大臣、侍卫，责允禩性奸心妄，纠合党类，妄行作乱。命众阿哥遵行君父之言，以免日后束甲相争。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允祉告发直郡王允禔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用术镇魇废太子允礽。

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以直郡王允禔魇咒亲弟及杀人之事，将其严加看守。次日革去王爵，幽禁其府。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上谕领侍卫内大臣等，允礽之疾渐已清爽，可知确系被魇魅无疑。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令满汉文武大臣推举一名皇子为太子，众人推举皇八子允禩。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满汉大臣等，因废太子事梦见孝庄文皇后、皇后赫舍里氏为之不乐，并称允礽今已痊愈，保其日后断不报复。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释放废太子允礽，令其改过迁善，不得报复；免去皇四子胤禛“喜怒不定”之考语。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圣体违和，命允祉、胤禛、允祺、允禩四皇子检视药方。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称赞皇四子胤禛性量过人，深知大义，曾为废太子保奏。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复封允禩为多罗贝勒。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召满汉大臣述去冬群臣保举允禩为皇太子事，领侍卫内大臣等称实系公同保奏，并无倡首之人。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责大学士马齐图谋专擅，欲立允禩为皇太子，将马齐及其弟马武、李荣保，并子侄等俱革职，马齐交允禩拘禁，李荣保枷责。

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责国舅佟国维倡造大言，惊骇众心，且欲立八阿哥为皇太子，将其训斥罢职。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复立允礽为皇太子，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授太子、太子妃册宝。

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传旨于八旗派护军参领八员、护军校八员、护军八十名严加看守大阿哥允禔，以防其趁皇帝出行之机，指称皇太后懿旨或皇帝密旨肆行杀人，猖狂妄动。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册封皇三子多罗贝勒允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多罗贝勒允祺为和硕恒亲王；皇七子多罗贝勒允祐为多罗淳郡王，皇十子允□为多罗敦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允祹、皇十四子允禵俱为固山贝子。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宗人府等衙门遵旨将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齐世武、耿额等结党会饮一案审结，奉旨此等事俱因允礽所致。后将托合齐、齐世武、耿额俱处死。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诸皇子等：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将允礽拘执看守。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下旨废黜皇太子允礽，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

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九日，禁锢废太子允礽于咸安宫。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谕以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赵申乔所奏折着发还。

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将二阿哥允礽侍从得麟凌迟处死，其父阿哈占开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因八阿哥允禩以将毙之鹰两架遣人请安，圣躬愤怒，心悸几危，称允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此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八阿哥允禩将奉旨发遣之奶公雅齐布潜匿在京，现已将雅齐布正法。并称允禩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将贝勒允禩俸银俸米，及伊属下护卫、官员俸银俸米，执事人等银米俱着停止。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三十日，召诚亲王允祉、雍亲王胤禛商讨西边兵

事。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八贝勒允禩患伤寒，遣医调治，后命雍亲王胤禛料理。

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初五日，上命将所停允禩之俸银俸米俱照前支给。

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赵弘燮疏报孟光祖假称诚亲王允祉之命游行五省，诈骗钱财事。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大学士王掞密奏，请立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公疏请立皇太子。

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乾清宫召集诸皇子、满汉重臣“豫立遗诏”，称“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人”，由储君“分理”万不可行。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翰林院检讨朱天保，请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坐斩，其父朱都讷，及常赉、金宝、齐世、萃泰等，并逮讯议罪。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征策妄阿拉布坦。降旨青海蒙古王公：“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将军王允禵疏报，平逆将军延信已由青海护送达赖喇嘛进藏，沿途屡次大胜。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和硕诚亲王允祉子弘晟、和硕恒亲王允祺子弘昇俱为世子，班次俸禄照贝子品级。

康熙六十年三月，大学士王掞、御史陶彝等复请建储。

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日，命大将军王允禵来京，指授来年大举进剿方略。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抚远大将军允禵至南苑陛见。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命抚远大将军允禵复往军前。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九日，命和硕雍亲王胤禛带领弘昇、孙渣齐、隆科多等人前往通州查勘仓廒。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命和硕雍亲王代行南郊祭天大典。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畅春园驾崩，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皇帝位，安奉大行皇帝于乾清宫。（胤禛即位后，诸兄弟避“胤”字讳，名上一字改为“允”；十四阿哥胤祯两字全避，改为允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命大将军王允禵、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公延信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封贝勒允禩为和硕廉亲王，十三阿哥允祥为和硕怡亲王，贝子允祹为多罗履郡王，弘皙为多罗理郡王。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以理藩院尚书舅舅隆科多为吏部尚书，仍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廉亲王允禩为理藩院尚书。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命怡亲王允祥总理户部三库事务。

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设立会考府准核各省钱粮奏销，命怡亲王、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左都御史朱轼会同办理。

雍正元年正月十六日，因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此前在京拜谒梓宫时圆寂，命敦郡王允□、世子弘晟赴蒙古赍赐印册奠仪。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封多罗淳郡王允祐子弘曙为长子，贝子允禵子弘春为固山贝子。

雍正元年二月十日，将贝子允禟派往军前，驻扎西宁，苏努之子勒

什亨革职，随允禟效力。又谕外间匪类捏造流言，妄生议论，称朕凌逼弟辈，报复旧怨。

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命廉亲王允禩办理工部事务，裕亲王保泰办理理藩院事务。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命贝子允禵留陵寝附近汤泉居住。

雍正元年四月初七日，命怡亲王允祥总理户部事务。

雍正元年四月十二日，封怡亲王允祥子弘昌为固山贝子。

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谕贝子允禵原属无知狂悖，气傲心高……着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终不悛，则国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雍正元年八月初三日，上谕自怡亲王办理户部事务，于展限四十日之内一切积弊剔除殆尽，奖劝属员，清理数千案件，甚属可嘉。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将立储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虞。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者欲赐怡亲王允祥分家银二十三万两，允祥力辞，改将现在其所兼管之佐领俱令为其属下；赏给一等护卫四员、二等护卫四员、三等护卫十二员；加赐豹尾枪二、长杆刀二；每佐领下添给亲军二名。

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斥允禩等于康熙末年固结党援，希图侥幸，并及遥亭毙鹰等事。允祉等请将圣祖斥责允禩各上谕传示诸王大臣，经允禩恳求，暂免宣示，收贮内阁。

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兵部参奏允□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称有旨令其进口，竟在张家口居住，应得何罪交诸王大臣议奏。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日，宗人府参奏贝子允禟差往西宁居住，擅自遣人往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抗违军法，肆行边地。

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将允□革去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

雍正二年五月十四日，将苏努革去贝勒，佐领撤回，其本人及在京诸子于十日内带往山西右卫居住。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日，以世子弘晟讹诈银两革为闲散宗室，令伊父和硕诚亲王允祉严加约束。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责廉亲王允禩所办之事皆邀结人心，欲以恶名加之朕躬。

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裕亲王保泰迎合廉亲王允禩，昧于君臣大义，革去王爵。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二阿哥允礽薨，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谥曰密。

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责允禩、允禟、允□、允禵，及其党阿灵阿、鄂伦岱等人罪，将鄂伦岱革领侍卫内大臣职，发往奉天居住。

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守丧三年服满，议总理事务王大臣功过：怡亲王允祥极其敬慎，遵守臣节，凡朕所交事件竭尽忠诚，勤劳办理，着赏一郡王，听王于诸子中指名奏请受封；隆科多着赏给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马齐着赏给拜他喇布勒哈番；廉亲王允禩有罪无功，不应议叙。

雍正三年四月初十日，怡亲王允祥奏辞议叙。奉旨王具疏恳辞，及见朕时复再三陈奏，情词谆切出于至诚，朕亦难强，姑允其请，以成谦让之美。

雍正三年四月十六日，召诸王、贝勒、公、大学士、九卿及工部官员，称廉亲王允禩之于朕则情如水火，势如敌国，并言康熙五十三年圣祖所降与允禩父子之义断绝诸事。

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奏贝子允禟护卫乌雅图等在平定州地方擅行殴打生员，应请按律治罪。有旨此事仍着伊都立将

太监李大成提往晋省，明白对质，将实情审出具奏。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以怡亲王允祥实心为国，凡所交之事尽心竭力办理，操守亦甚清廉，着加怡亲王俸银一万两。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廉亲王允禩奏裁内务府披甲人数，交其办理后，又改拟增添，致内务府人等至王府嚷闹。命廉亲王将为首五人指名具奏，后称其所举并非确实，着内大臣、大学士、议政大臣、九卿等公同详确会议。

雍正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宗人府参奏多罗郡王允禵任大将军时，任意妄为，苦累兵丁，侵扰地方，靡费军需。得旨允禵革去多罗郡王，授为固山贝子。

雍正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宗人府参奏廉亲王允禩因护军九十六不遵伊之指使，（令太监三人将九十六）立毙杖下。奉旨将九十六之宗族佐领不可留于允禩属下，着撤入公中。

雍正四年正月初四日，责允禟在西宁“造作字样，暗通书信”，其中有“事机已失”之语，将其门下亲信毛太、佟保等严加审讯。

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日，召入诸王、贝勒、贝子、公、满汉文武大臣等，告以廉亲王允禩烧毁圣祖谕旨，设誓有一家俱死之言，连及圣躬；允禟造作字样，密传信息，行同奸细，视朝廷为敌国；苏努等结党构逆，靡恶不为。今撰文祭告奉先殿，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革去黄带子，并令宗人府将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名字除去。同日，将允禩迎养府中的惠妃接回宫中。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以允禩之妻恶迹昭著，降旨革去福晋，休回外家。

雍正四年二月初七日，诸王大臣合辞奏请将允禩即行正法，奉旨朕本意断不将允禩治罪，此所奏知道了。

雍正四年二月初十日，命将允禩在宗人府看守，圈禁高墙，着总管太监派老成太监二名在内随侍。

雍正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以简亲王雅尔江阿专惧允禩、苏努等悖逆之徒，甚忝厥职，着革去王爵。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令允禩、允禟并其子之名自行更改，分别编入佐领。

雍正四年三月十二日，允禩自改名为阿其那，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

雍正四年五月初二日，因蔡怀玺投书允禵，称其可以为皇帝事，将允禵从景陵撤回京师，禁锢景山寿皇殿，其子弘明一并禁锢。

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改允禟之名为塞思黑。

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召入诸王、大臣、九卿等，再次历数允禩、允禟、允禵等罪过。命将此旨录出，传于京城内外八旗军民人等一体知之。

雍正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将附逆阿其那之苏努、七十等抄没家产，挫骨扬灰，其子孙等分别发遣、禁锢。

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定阿其那大罪四十款、塞思黑大罪二十八款、允禵大罪十四款，颁示中外。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以贝勒满都护包庇塞思黑，革去贝勒，降为贝子。

雍正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御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榜赐怡亲王允祥，又称王之当年侍奉皇考极尽诚孝，深蒙皇考之慈爱，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宽厚，遇下之仁惠，种种善行，笔不胜书。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绂奏报，塞思黑患腹泻之疾，于八月二十四日病故。

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顺承郡王锡保奏阿其那染患呕症，不进饮食，是日病故。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诸王大臣合辞奏请将允禩、允□正法。奉旨免其正法。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诸王大臣奏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奉旨其妻、子从宽免其正法。塞思黑之妻逐回其家，严加禁锢。阿其那、塞思黑之眷属交与内务府总管，给与住居养赡。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议贝勒延信与阿其那、塞思黑结党等罪共二十款。得旨延信从宽免死，着与隆科多在一处监禁。

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宗人府议奏诚亲王允祉勒索苏克济银两，询问之际愤怒怨望，在上前喝责王大臣等，毫无臣礼，应革去王爵，禁锢私第。奉旨，允祉免其褫爵拘禁，着降亲王为郡王，撤去佐领四个。其子弘晟拿交宗人府严行锁禁。嗣后一应交与诸王公等会议之处，允祉不必入班。

雍正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以怡亲王允祥协赞朕躬，忠诚宣猷，为国家办理政务勤慎奉职，甚属可嘉，加仪仗一倍。

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晋封诚郡王允祉为和硕诚亲王。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怡亲王允祥病故，上亲临视，悲恸不已，辍朝三日。后屡次亲往祭祀，迭加恩遇。如赐谥曰“贤”，加“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于谥号之上；令配享太庙；改名上一字为“胤”；其爵位世袭罔替；另封一子为宁郡王亦世袭罔替；增加园寝规制；在直隶等地建祠祭祀。

雍正八年五月十二日，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诚亲王允祉于怡亲王丧事迟到早归，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得旨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诸王大臣议诚亲王允祉罪，奉旨将允祉革去亲王拘禁，其子弘晟从前散禁于宗人府，今着严加拘禁。

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允礽之子理郡王弘晳晋封亲王，允祉之子

弘景晋封贝子。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宗人府以允祉病故奏闻。一切殡葬之礼着照郡王例行，赏内库银五千两料理丧事。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大阿哥允禔病逝，照贝子之例办理。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驾崩，以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

乾隆二年四月十九日，赐给允□、允禵公爵空衔，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

乾隆二年十月十七日，追予多罗郡王允祉谥“隐”，并复原封诚郡王字号。

乾隆四年十月十六日，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晳、弘昇、弘昌、弘晈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奉旨庄亲王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俱着革退；弘晳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着革去亲王，不必在高墙圈禁，仍准其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弘昇照宗人府议永远圈禁；弘昌亦照所议革去贝勒，弘普革去贝子并管理銮仪卫事；弘晈王爵系皇考特旨令其永远承袭者，着从宽仍留王号，永远住俸，以观后效。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以弘晳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其罪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现于东果园永远圈禁，弘晳及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革去宗室，给与红带之例。

乾隆六年九月初九日，公爵允□病逝，以贝子礼葬。

乾隆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十四叔允禵赐以公爵家居十数年来，安静循分，并未生事，着封为贝勒，照常上朝。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六日，恂郡王允禵病逝，谥号“勤”。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将允禩、允禟、弘晳复其原名，收入玉牒，子孙等一并叙入。

附录2
康熙序齿皇子情况表

姓名	序齿	生年	生母	封爵谥号	卒年	寿命
允禔	一	康熙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惠妃乌拉纳喇氏	康熙三十七年封多罗直郡王，康熙四十七年革爵圈禁。雍正十二年十一月照贝子例治丧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63岁
允礽	二	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康熙十四年六月立为皇太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废，翌年三月复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圈禁。雍正二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理亲王，谥号“密”	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51岁

（续下表）

（接上表）

允祉	三	康熙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荣妃马佳氏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多罗诚郡王，翌年九月降为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封诚亲王。雍正六年六月降为诚郡王，雍正八年二月，复封亲王，同年五月革爵圈禁，雍正十年闰五月照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十二月，复原封号诚郡王，谥号“隐”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	56岁
胤禛	四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为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封和硕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即皇帝位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58岁
允祺	五	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	宜妃郭络罗氏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封和硕恒亲王。谥号“温”	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	54岁

允祚	六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五日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无封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6 岁
允祐	七	康熙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成妃戴佳氏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晋封多罗淳郡王。雍正元年四月封和硕淳亲王。谥号“度”	雍正八年四月初二日	51 岁
允禩（阿其那）	八	康熙二十年二月初十日	良妃卫氏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多罗贝勒，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封廉亲王。雍正四年二月革爵圈禁，黜宗室，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收入红带子。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复宗籍	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	46 岁
允禟（塞思黑）	九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宜妃郭络罗氏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固山贝子。雍正三年七月革爵圈禁，雍正四年正月黜宗室，	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44 岁

（续下表）

（接上表）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收入红带子。乾隆四十三年正月复宗籍		
允䄉	十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温僖贵妃钮祜禄氏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多罗敦郡王。雍正二年四月革爵圈禁。乾隆二年二月封奉恩辅国公品级，乾隆六年九月以贝子品级治丧	乾隆六年九月初九日	59岁
允禌	十一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七日	宜妃郭络罗氏	无封	康熙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2岁
允祹	十二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定妃万琉哈氏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为固山贝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封为履郡王。雍正元年十二月降为固山贝子，雍正二年六月降为镇国公，雍正八年五月复封履郡王，	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79岁

				雍正十三年十月晋封和硕履亲王。谥号“懿”		
允祥	十三	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敬敏皇贵妃章佳氏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封为和硕怡亲王。谥号“贤”，加“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于谥号上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	45岁
允禵	十四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	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封为固山贝子。雍正元年五月晋封郡王，雍正三年十二月降为固山贝子，雍正四年四月革爵圈禁。乾隆二年三月封奉恩辅国公，乾隆十二年六月晋封多罗贝勒，乾隆十三年正月晋封多罗恂郡王。谥号“勤”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六日	68岁
允禑	十五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顺懿密妃王氏	雍正四年五月封为贝勒，雍正八年二月，晋封多	雍正九年二月初二日	39岁

（续下表）

（接上表）

		二十八日		罗愉郡王。谥号“恪”		
允禄	十六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顺懿密妃王氏	雍正元年二月过继和硕庄靖亲王博果铎为嗣，袭封庄亲王。谥号“恪”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73岁
允礼	十七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纯裕勤妃陈氏	雍正元年四月封为多罗果郡王，雍正六年二月晋封和硕果亲王。谥号“毅”	乾隆三年二月初二日	42岁
允祄	十八	康熙四十年八月初八日	顺懿密妃王氏	无封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	8岁
允禝	十九	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初五日	襄嫔高氏	无封	康熙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3岁
允祎	二十	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襄嫔高氏	雍正四年五月封为贝子，雍正八年二月晋为贝勒，雍正十二年八月降为镇国	乾隆二十年正月初九日	50岁

				公，雍正十三年九月晋封贝勒。谥号“简靖”		
允禧	二十一	康熙五十年正月十一日	熙嫔陈氏	雍正八年二月封固山贝子，同年五月晋贝勒，雍正十三年十月封慎郡王。谥号“靖”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48岁
允祜	二十二	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初三日	谨嫔色赫图氏	雍正八年二月封为固山贝子，雍正十二年晋多罗贝勒。谥“恭勤”	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33岁
允祁	二十三	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静嫔石氏	雍正八年二月封镇国公，雍正十三年十月晋贝勒。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降贝子，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降镇国公，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授贝子，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晋贝勒。赐祭如郡王例，谥号“诚”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73岁

（续下表）

（接上表）

允祕	二十四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十六日	穆嫔陈氏	雍正十一年二月封和硕諴亲王。谥号“恪”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58岁

附录3
阿其那（允禩）大罪四十款

1．康熙四十七年冬，圣祖仁皇帝圣体违和，奉旨检视方药。阿其那毫无忧色，医药之事，漠不关心，惟与塞思黑、允禵等促坐密语，情状叵测。及圣躬平复，毫无喜色，反有“目前虽愈，将来之事奈何”等语，惊骇听闻，众所共知者一也。

2．素蓄异志，听信相士张明德诳言，遂欲谋杀二阿哥，希图储位。又与大阿哥暗蓄刺客，谋为不轨，众所共知者一也。

3．趋奉裕亲王福全，令其保荐。及二阿哥既废，揆叙与廷臣暗通消息，各人手心俱写一八字，众所共知者一也。

4．诡托矫廉，而凡有用财收买人心之处，皆取之于塞思黑。托人重价购书，夸其好学。九流术士，招至家中，藏之密室，厚加赏给，俾各处称扬，众所共知者一也。

5．　平日受制于妻，一日与何焯共谈，任听伊妻门外大笑，不知省避。又将何焯之幼女私养宅中，以为己女，众所共知者一也。

6．二阿哥初废时，希冀储位，邪谋日炽，结党钻营，及事情泄漏，圣祖仁皇帝震怒，提拿发审，问所犯情由，俱已显著。圣祖仁皇帝召集诸王大臣等细数其奸恶，降旨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众所共知者一也。

7．康熙五十三年冬，圣祖仁皇帝驻跸遥亭，阿其那遣人以将毙之鹰进献，又称伊在汤山等候进京，并不请旨，行止自由。圣祖仁皇帝愤怒，严讯伊之护卫及太监等，朋党奸谋尽行显露。其太监冯进朝供称鄂伦岱、阿灵阿系伊逆党，彼时鄂伦岱、阿灵阿理屈词穷，仓皇退避。圣祖仁皇帝降旨云：朕与伊父子之情绝矣，众所共知者一也。

8.　是日，圣祖仁皇帝又降旨谕众阿哥云：“八阿哥允禩大背臣道，觅人谋杀皇子，竟未念及朕躬也。前朕患病，诸大臣公保八阿哥，朕甚无奈，只得将不可册立之允礽放出，五载之内，极其郁闷。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与，密行奸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众人所保，谁敢争执，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殁已耳。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为子臣之理。允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与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此圣祖仁皇帝之谕旨，众所共知者一也。

9. 又因伊乳公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礼，与御史永泰同出关差，永泰所给银两不多，阿其那不顾国体，将永泰私行棰楚。圣祖仁皇帝将雅齐布赏与公主，阿其那背旨潜留雅齐布在京，致将雅齐布夫妇正法。嗣后圣祖仁皇帝曾降谕旨云：“允禩因朕将雅齐布正法，遂欲为伊乳公报复，与朕结仇愈深矣。”为臣子者，竟敢与君父结怨成雠，逆乱已极，众所共知者一也。

10.　又自知种种不法，惟恐搜其字迹，家中恶党书札悉行焚烧，将圣祖仁皇帝朱批折子一并销毁，悖逆不敬，众所共知者一也。

11. 二阿哥复行拿禁之后，阿其那径到圣祖仁皇帝御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圣祖仁皇帝知其志望非分，作此试探之语，降旨切责，众所共知者一也。

12. 见储位未定，与塞思黑、允禟、允□交结弥固，必欲遂其大志，谲诈万端，致圣祖仁皇帝愤恨感伤，时为不豫。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众所共知者一也。

13.　既革贝勒之后，暗以银马等物要结汝福等人入党，又密同太监李玉擅革膳房行走之厄穆克托，又与翰林何焯固结匪党，盗取名誉，潜蓄异心，众所共知者一也。

14.　阿其那母妃丧时，凡事逾礼，沽取孝名。已及百日，尚令人扶掖而行，而受塞思黑、允□、允禟等每日轮班送饭，豕羊狼藉，筵席喧

器。脱孝后面貌愈加丰硕，圣祖仁皇帝降旨切责云虚伪不孝，实属奸诡，众所共知者一也。

15. 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伤寒，正值圣祖仁皇帝自热河回銮，冀以病症幸邀宽宥，故托大病，恳求魏珠谎奏，将所停俸米赏给。病愈仍称病重，魏珠往看，乃下炕迎接，在地叩谢，奸伪无耻，众所共知者一也。

16. 康熙五十六年春，阿其那病痊，圣祖俯垂慈悯，将赐食物，遣人降旨云："尔病初愈，不知何物相宜，故未敢送去。"而阿其那忽起疑端，谓"未敢"二字承受不起，即往宫中叩恳。圣祖仁皇帝复降旨切责，僭分妄疑，大亏孝道，众所共知者一也。

17. 外作矫廉，内多贪鄙，数遣护卫太监等私向赫寿、吴存礼、满丕索要银两，众所共知者一也。

18. 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众所共知者一也。

19. 皇上龙飞御极，情敦同气，冀其改过自新，念其尚有才干，晋封亲王，俾同总理事务。阿其那全无感激，受恩之日，出口怨诽，众所共知者一也。

20. 自蒙恩委任后，挟私怀诈，遇事播弄，冀以归过主上，摇惑众心。如奉移圣祖仁皇帝梓宫，诳请裁减人夫一半，意欲迟误山陵大事，众所共知者一也。

21. 皇上孝思罔极，特命莽鹄立恭写圣祖仁皇帝御容，供奉瞻仰，阿其那乃奏称不当供奉，语言狂谬，众所共知者一也。

22. 任理藩院时，科尔沁蒙古乃累朝近亲，蒙圣祖仁皇帝六十年厚恩，其台吉等叩谒梓宫，阿其那令人于边口拦阻，致蒙古呼天号泣，众所共知者一也。

23. 任上驷院时，心怀叵测，请减内厩历来所蓄马匹，众所共知者一也。

24. 任工部时，盛京陵寝所用红土旧例自京采买运送，阿其那奏请折银就彼采买，借节省脚价之名，轻慢陵工，众所共知者一也。

25. 监造列祖神牌，漆流金驳全不经心，实大不敬，众所共知者一也。

26. 预备祝版之案朽烂不堪，制造军前之器钝敝无用，众所共知者一也。

27. 雍正元年春桃汛将发，耍儿渡等处河工关系紧要，地方官正值办理陵工大事，乃奏请将河工交与地方官，不令监督看守，欲使彼此交代耽误，堤岸冲决，殃害百姓，众所共知者一也。

28. 皇上乘舆法物以断钉薄板为之，更衣幄次以污油恶漆涂之，众所共知者一也。

29. 清查工部钱粮，于应追者反与蠲免，于应免者反令严追，颠倒是非，使人怨望，众所共知者一也。

30. 工部说堂之稿将伊抬写，伊看过并不改正，径用印而行，妄自尊大，众所共知者一也。

31. 庇护私人，谋集党与，以私财数千金代岳周完公补项，继又以典铺数万金助其作奸犯科，众所共知者一也。

32. 包衣披甲额数在御前密奏之时则请裁减，在公廷议覆之日则请增添，及至奸伪败露，众怨沸腾，争闹其门。皇上降旨察讯，伊又枉陷无辜，以乱国法，众所共知者一也。

33. 阿其那之妻不守妇道，圣祖仁皇帝谕旨甚明，皇上降旨遣回母家。伊女婢白哥劝伊于皇上前谢罪奏恳，乃愤然曰：我丈夫也，岂因妻室之故而求人乎？白哥见伊日在醉乡，屡次劝谏不从，遂愤恨自缢而死，众所共知者一也。

34. 门下太监闫进代伊隐瞒所行不法之事，则厚赏银币。护军九十六据实供吐，违其本意，则立毙杖下。长史胡什吞以直言触怒，痛加棰

楚，推入冰内，几致殒命。身为人臣，敢操赏罚生杀之柄，众所共知者一也。

35. 清查太常寺奏销黄册，迟至一年之久尚不查奏，违圣旨而轻祀典，众所共知者一也。

36. 门上佐领系管理事务之员，阿其那所用哈升乃掳来之厄鲁特，用为头等护卫佐领，众所共知者一也。

37. 捏称工部郎中三泰亏欠银两，寻隙参奏，众所共知者一也。

38. 皇上所交利益旗下银十万两内，擅自动用五六万两，私买人口，益张羽翼，众所共知者一也。

39. 奉旨谕令悛改，乃含刀发誓云：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显行诅咒，众所共知者一也。

40. 奉旨拘禁宗人府，全无恐惧，反有不愿全尸之语，凶恶之性，古今罕闻，众所共知者一也。

附录4
塞思黑（允禟）大罪二十八款

1. 塞思黑行止恶乱，谋望非常，暗以赀财买结人心，且使门下之人广为延誉，收西洋人穆经远为腹心，夸称其善，希图储位，众所共知者一也。

2. 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塞思黑陈奏之语悖谬，圣祖仁皇帝面加切责。是夜三鼓时，圣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愤怒，中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即畏惧称病。平日结交近侍，密行伺察探听，众所共知者一也。

3. 诈称有疾，私向穆经远云：皇父欲立我为皇太子，是以诈病回避。僭妄无耻，众所共知者一也。

4. 圣祖仁皇帝稍加教训即生怨恚。每云：不过革此微末贝子耳。又每云：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快乐。出言悖逆，众所共知者一也。

5. 因封贝子，未遂其望，令秦道然各处称其宽宏大量，慈祥恺悌，图买人心，以谋大位。又密结何图，令其姑赴同知之任，如有用处，即速来京。不轨之情，公然出口无忌，众所共知者一也。

6. 康熙四十七年圣祖仁皇帝降旨：凡非本王门上之人，俱不许在别王子阿哥处行走。而塞思黑抗不遵奉，仍复招集私人，往来无忌，众所共知者一也。

7. 圣祖仁皇帝将阿其那锁拿发审，塞思黑与允禵怀藏毒药，愿与同死。又令人携带锁铐从行，以示同患之意。及阿其那蒙恩宽免，塞思黑当众取出毒药，与众人看毕而弃之。固结死党，凶暴悖乱，众所共知者一也。

8.　向秦道然言生有异征，又言曾患病，见金甲神满屋梁。诡诈妖言，欲惑人以图非分，众所共知者一也。

9. 将伊子弘晸认内侍魏珠等为伯叔，窥探宫禁信息，行事卑污，众所共知者一也。

10.　允禵往军前时，塞思黑私与密约：若圣祖仁皇帝圣躬欠安，即遣人驰信军前，以便计议，众所共知者一也。

11.　伊女聘与明珠之孙永福，索取赀财累百万金，夺据各处贸易，贪婪无厌，众所共知者一也。

12.　圣祖仁皇帝宾天时，皇上正在哀痛哭泣，塞思黑突至上前，对坐箕踞无人臣礼，其情叵测，众所共知者一也。

13.　梓宫前上食举哀，塞思黑全无滴泪。皇上降旨询问，即出帕忿争，情状不逊，众所共知者一也。

14.　允禵往军前时，塞思黑遣太监随从，复差人往来寄信。允禵回京时，又差人迎过大同，暗筹私事，众所共知者一也。

15. 又私与允□、允禵相约，彼此往来密信看后即行烧毁，图谋不法之处显然，众所共知者一也。

16.　圣慈曲加保全，发往西宁居住。伊屡次延挨日期，既到西宁，寄书允□，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逆乱之语，公然形之纸笔，众所共知者一也。

17.　初到西宁时，向穆经远云越远越好。心怀悖乱，众所共知者一也。

18.　伊妻路经山右，纵容手下人骚扰百姓，殴打生员，公行不法，众所共知者一也。

19.　应赔钱粮抗不还项，乃将诈取明珠家财数百万两带往西宁，凡市买物件，听人索价，如数给与，图买人心。又越礼犯规，僭称王号，众所共知者一也。

20. 纵容属下人在地方生事，皇上特遣都统楚宗往行约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不出迎接，亦不叩头谢罪，口称我已出家离世之人，种种怨望，众所共知者一也。

21. 寄与伊子及所属官员人等字，俱用朱批。伊子称塞思黑之言为旨，僭逆已极，众所共知者一也。

22. 别造字样，巧编格式，令伊子学习，打听内中信息，缝于骡夫衣袜之内，传递往来，阴谋诡计，俨同敌国，众所共知者一也。

23. 太祖高皇帝钦定国书，臣民所共遵守，塞思黑径敢添造七字头，私行刊刻，变乱祖制，众所共知者一也。

24. 在西宁时于所居后墙潜开窗户，密与穆经远往来计议，行踪诡秘，众所共知者一也。

25. 又将资财藏匿穆经远处，令其觅人开铺。京中信息，从铺中密送，诡秘若此，众所共知者一也。

26. 又向穆经远云："前日有人送字来，上写山陕百姓说我好，又说我狠（很）苦的话。我随着人向伊说：'我们兄弟没有争天下的道理。'"穆经远劝将此人拿交楚宗，塞思黑纵之使去，身在拘禁，尚为此悖逆之语，众所共知者一也。

27. 具折请安称奴才弟，折请皇后安，亦有弟字，悖谬已极，众所共知者一也。

28. 自康熙元年以来，并无民人投充旗下之例，塞思黑不遵法度，隐匿私置民人一百四十七名，又有投充入档者五名，不入档者二十五名，引诱民户，纠合恶党，众所共知者一也。

附录5
允禵大罪十四款

1．允禵性质狂悖，与阿其那尤相亲密，圣祖仁皇帝于二阿哥之案将阿其那拿问时，召入众阿哥，谕以阿其那谋夺东宫之罪，现交议政究审。允禵与塞思黑同向圣祖仁皇帝之前，允禵奏云：“阿其那并无此心，若将阿其那问罪，我等愿与同罪。”圣祖仁皇帝震怒，拔佩刀欲杀允禵，经允祺力劝稍解，将允禵重加责惩，与塞思黑一并逐出，众所共知者一也。

2．康熙四十八年夏，圣祖仁皇帝避暑口外，恐伊等聚党生事，止令阿其那跟随行走。允禵敝帽故衣，坐小车，装作贩卖之人，私送出口，日则潜踪而随，夜则至阿其那帐房歇宿，密语通宵，踪迹诡异，众所共知者一也。

3．圣祖仁皇帝知允禵昏愚狂妄，必生事端，因遣往军前，使不得朋匪为恶。而允禵与阿其那、塞思黑密信往来，曾无间断，机计莫测，众所共知者一也。

4．在西边时取青海台吉等女子，日夜纵酒淫乱，不恤军政，修造房屋，劳民费帑，众所共知者一也。

5．指称杂项名色，靡费国帑三四十万，而进兵止到穆鲁乌苏，将所运粮饷迟误。身未到藏，乃于无用之处伤损官兵千余、马驼死者数千，众所共知者一也。

6．私受哲尔金银六万六千两，将疲瘦马匹留与白讷喂养，令其买办驼只。信用蓝翎铁柱，任其招摇撞骗。向噶什图等索银十二万两，又惧铁柱举发，始终庇护，众所共知者一也。

7．在西宁时张瞎子为之算命，诡称此命定有九五之尊，允禵大喜称

善，赏银二十两，众所共知者一也。

8.　将到京师，一切礼仪并不奏请皇上指示，及到京后不请皇太后安，亦不请皇上安，大亏臣子之义，众所共知者一也。

9.　叩谒梓宫并不哀痛，至皇上向伊哭泣相见，伊并不向前抱膝痛哭。拉锡微加扶携，令请上安，反肆咆哮，奏称“拉锡侮慢我，求连我交与宗人府”等语。皇上降旨开谕，伊愈加忿怒，退出将拉锡痛骂，众所共知者一也。

10.　孝恭仁皇后上宾，皇上仰体慈恩，将允禵晋封郡王，并无感恩之意，反有忿怒之色，众所共知者一也。

11.　皇上谒陵回跸，遣拉锡等降旨训诫。允禵并不下跪，反使气抗奏良久。阿其那见众人共议允禵之非，乃向允禵云：“汝应下跪。”便寂然无声而跪。不遵皇上谕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结党背君，公然无忌，众所共知者一也。

12.　允禵之妻病故，皇上厚加恩恤，乃伊奏折中有我今已到尽头，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语。怨望非理，众所共知者一也。

13.　不以礼葬其妻，乃于居室之后、幽僻之处私造两金塔，一为伊妻葬地，一备己身葬地。不遵国制，反从番僧之教，悖理不经，众所共知者一也。

14.　奸民蔡怀玺造出大逆之言，明指允禵为皇帝，塞思黑之母为太后。用黄纸书写，隔墙抛入允禵院内。允禵不即奏闻，私自裁去二行，交与把总，送至总兵衙门，令其酌量完结。及钦差审问，始理屈词穷，悖乱之心显然，众所共知者一也。

附录6
允禩大罪十款

1.　　允禩事圣祖仁皇帝，诸事违逆，罔知爱敬。圣祖仁皇帝圣躬违和，允禩毫无忧戚，且怀冀幸之意。又如恭谒陵寝，允禩并不早集行礼，使诸王大臣候至巳时始至昭西陵，午时方至景陵，任意怠忽，有乖典礼。其于母妃也肆行忤逆。又敬敏皇贵妃薨逝，允禩服制未满即行剃头。此其不孝之罪一也。

2.　　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禩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

3. 允禩素日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禩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迨后在皇上之前抗傲无礼，诸王大臣合词参劾，宗人府议以禁锢，复蒙皇上从宽，止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畏惧。今年又蒙特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仍不知感戴。此其狂悖之罪一也。

4. 允禩向日与阿其那、塞思黑、允禵等交相党附，时切觊觎，比昵匪类，肆无忌惮。及至阿其那、塞思黑逆迹败露，允禩乃密请交伊暗置死地，意在归过皇上。此其党逆之罪一也。

5. 我皇上宵旰勤劳，每于允禩进见之时赐座优礼，谕以勤政忧民诸事，而允禩漫不乐闻，但以伊闲居散适之乐娓娓陈述。此其欺罔不敬之罪一也。

6. 满汉文武大臣皆受圣祖仁皇帝教养深恩，又蒙皇上加意委任，而允禩视抒诚宣力者如仇敌，憸邪不轨者为腹心。此其奸邪之罪一也。

7. 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禩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

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此其恶逆之罪一也。

8. 允祉之子弘晟凶顽放纵，助父为恶，荷蒙皇上鸿恩，从宽禁锢。允祉反以此衔恨于心，时行怨望。此怨怼不敬之罪一也。

9. 允祉在圣祖仁皇帝时侵帑婪赃，盈千累万，又恣意需索所属，仍复逋欠累累。皇上深用体恤，特赐帑金，俾其饶裕。而允祉毫不感激，每以催追之项怨忿渎奏。此其贪黩负恩之罪一也。

10. 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允祉心怀妒忌，值怡亲王薨逝，并不恳请成服，又不躬请皇上圣安，且于怡亲王府齐集之所每日迟至早散，当举哀时全无悲泣之情，反有庆幸之意。此其背理蔑伦之罪一也。

参考文献

一、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文未刊档案史料。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华书局，2008年。

《康熙起居注》，中华书局，1984年。

《雍正朝起居注册》，中华书局，1993年。

《明清档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1998年。

《文献丛编》第一辑，北京：故宫博物院印行，1936年。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

《同文会考补编》，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

《李文贞公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

马国贤：《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二、学者论著

1. 篡位说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

王锺翰：《清世宗夺嫡考实》，《清史杂考》，中华书局，1957年。

王锺翰：《胤祯西征纪实》，《清史杂考》，中华书局，1957年。

王锺翰：《清圣祖遗诏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01期。

杨珍：《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

杨珍：《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年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杨珍：《允禟：品性·遭际·时代》，《清史论丛》2009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杨珍：《满文密折所见诚亲王允祉与雍正帝胤禛》，《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9年。

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2009年。

金承艺：《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中华书局，2010年。

戴逸：《雍正继位的历史疑谜》，《清代人物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年。

梁希哲：《小议雍正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06期。

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允禵始末》，台湾《大陆杂志》49卷2期。

陈捷先：《雍正写真》，商务印书馆，2011年。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

许曾重：《雍正得位前后》，《文史知识》1983年03期。

罗冬阳：《雍正帝矫诏召回抚远大将军王允禵考——附论康雍之际西北军权的转移》，《明清论丛》2012年01期。

罗冬阳：《朝鲜使臣见闻记述之康雍史事考评——以争储及雍正继位为核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2期。

金恒源：《雍正帝篡位说新证》，《史林》2004年03期。

金恒源：《雍正继位疑案辨析——读冯尔康〈二百年疑案再断〉质疑》，《清史研究》2011年02期。

金恒源：《正本清源说雍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金恒源：《雍正称帝与其对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林乾：《雍正十三年》，中信出版社，2017年。

2. 继位说

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冯尔康：《雍正继位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冯尔康：《清代人物三十题》，岳麓书社，2012年。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杨启樵：《雍正篡位说驳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李宪庆、白新良：《康雍之际继嗣制度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2期。

吴秀良：《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史松：《雍正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

郭成康：《传闻、官书与信史：乾隆皇帝之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Table of Contents

- 九王夺嫡
- 书名页
- 版权页
- 序言
- 目录
- 皇位继承是个历史难题
- 康熙时代的后宫格局
- 康熙皇帝的教子误区
- 夺嫡者群像
  - 允礽
    - 上
    - 下
  - 允祥
  - 允禔
  - 允禩
  - 允禟与允□
  - 允禵
  - 允祉
  - 胤禛
    - 上
    - 下
- 康熙帝去世的那一天
  - 上
  - 下
- 一代英主的立储拖延症
- 后夺嫡时代
  - 一
  - 二
  - 三
  - 四
- 雍正王朝的压力与动力
- 后记 众说纷纭论夺嫡
- 附录1 夺嫡大事记
- 附录2 康熙序齿皇子情况表
- 附录3 阿其那（允禩）大罪四十款
- 附录4 塞思黑（允禟）大罪二十八款
- 附录5 允禵大罪十四款
- 附录6 允祉大罪十款
- 参考文献